

介绍古都名城历史
展现当代都市风貌

南京史志

国内外发行



陈慕华、陈香梅与金庆民看南极画册



李涌、张联分获江苏公关礼仪营销大赛男女全能冠军



杰出的女地质学家金庆民
江浙财阀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
裕仁天皇与“七七”事变
江南考古的重大收获
——南京汤山发现猿人头骨

桃叶桃根桃叶渡
杜月笙和他的五房妻妾

公关、礼仪、营销女子单项冠军

地方志

ng. gov. cn

NANJING LOCAL HISTORY

1993年第四期



观灯

街边书摊



捏面人

卖野菜(芦蒿、马兰头)



售乌饭



炸春卷、老卤干



爆米花



卖旺鸡蛋



霁明丁卫供稿

南京市雨花台区城乡建设局

强化组织指挥 当好开路先锋



局领导及有关人员研究纬七路工程

局长:杨炎平



局、所及有关人员学习“环卫”条例



雨花台区赛虹桥农民新村一景

地址:南京共青团路五村四幢
电话:623800; 邮码:210012



雨花西路竣工

南京市雨花台区交通局



由雨花台区公路管理站养护的赛小公路

局长贺福荣

地址:雨花西路 258 号

电话:626673、629654

邮码:210021



雨花台区西善桥交管所办公楼

雨花联运公司油运船队



竣工后的宁丹公路

市、区、局领导查看宁丹公路施工情况



雨花大件起重运输公司承运大件货物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南京

一九九三年第四期
(总第六十一期)

史志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办

主 编 王能伟
常务副主编 陈济民

顾 问 郑凤翔 张治宗
汪正生

杰出的女地质学家金庆民	董克信	2
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李国鼎	崔之清 张黎宏	10
为国际数学竞赛获奖者		
甘当人梯的单士博教授	邱志强	16
• 人物春秋 • 风靡世界的美国加州		
“牛肉面”大王李北祺	施善莘	14
记图书馆学家李小缘	王可权 寿魁成	19
太平天国国医李俊良	许自强	58
裕仁天皇与“七七”事变	王俯民	21
“四一二”政变前夕		
• 神州风云 • 蒋介石的南京之行	刘才赋	24
江浙财阀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	陆仰渊	25
“文革”中的改名风潮	白 丁	57
• 今日南京 • 南京造飞机了		30
南京小姐珠海折桂		30
• 江东文物 • 南京汤山发现猿人头骨	综合消息	35
刘宋“二铢钱”考	吴大林	31
国礼《百寿图》创作始末	董宁宁	33
• 白下艺文 • 桃叶桃根桃叶渡	高国藩	37
复制《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经过	程苏元	39

地址 南京市人民政府大院
发 行 李哲民 胡星侠 卢海鸣 董宁宁 庄淑玉
责任编辑 编辑部主任
邮 码 全年订价 广告许可证 印 刷 国内发行 国外代号
210008 1993.7.10 出版 7.80元 本期定价 1.30元 宁广字第五六号 国际经济信息中心 本刊发行部 BNM 四一八六

• 方志研究 • 喜读《当代南京电力工业》	王能伟 马伯伦	44
长江第三大岛		
——南京八卦洲开垦记	王长喜	41
高淳烙器走出国门争风流	魏希德	59
• 南京经济 • 改革大潮中的鼓楼区工商局	黄星仁	45
以法治税 利国利民	陈义海	46
建设新雨花 繁荣南大门	杨炎平	9
发挥基础作用 推进经济发展	雨花交通局	47
改革中前进的下关市政工程管理所	金 华	40
• 秦淮杂忆 • 杜月笙和他的五房妻妾	黄建远	48
戴笠的情妇忆戴笠	李 佳	53
• 白门掌故 • 钟山才女与“金陵墨池”	都君萍	60
话说孙权的妹妹	李光斗	56
南京举办《东方巨人毛泽东》展览	善 莘	13
纪念太平天国定都		
• 志苑信息 • 140周年研讨会召开	太博文	60
《金陵胜迹大全》一书出版	计哈珏	20



杰出的女地质学家

民

庆

金

金庆民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南极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地质大学兼职教授。她曾在新疆从事地质工作二十年。后在西北、西南及东部地区开展金属矿床研究。1986—1991年间曾三次赴南极进行科学考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瞩目。

勤学奋进 献身地质事业

金庆民 1939 年出生在南京,父亲原是一位大学教授。后来鬼使神差的当上了国民党联勤总部南京供应局少将局长。当时他虽身居要职,但却对现实不满。在革命的影响之下,参加了地下民革。然而,由于

政治运动,1954 年却被当成反革命给镇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平反)。

其父死后不久,母亲忧病交加也跟着去世。那时她哥哥在外地读书,姐姐又远嫁他乡。只剩下她孤苦伶仃的一人住进学校——南京六中(原安徽中学),从此以校为家。在学校她依靠每月 7 元的助学金生活。多亏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照,不时送给一些衣物,逢年过节 还请她回家吃饭。当时,她的生活相当艰苦,没有穿过一件新衣,甚至冬天也没有穿过一件棉袄。她没有钱买钢笔,甚至连一支蘸水钢笔也买不起,她只能买一只笔尖,将它绑在筷子上,当蘸水笔使用。

艰苦的生活给了她坚强意志的磨练。她发愤图

强,刻苦攻读,决心为将来攀登科学高峰打下基础。金庆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她的少年时代是在课桌旁度过的。

功夫不负苦心人。初中阶段,她每学期都考第一,升入高中仍保持在前三名,她不偏科,不仅数理好,文科也好。她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金庆民学习好,但绝不死读书,而注意全面发展。她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在初中先是担任少先队中队委,以后又一直担任班级学习委员。她深知身体是学习和未来工作的本钱,所以又积极锻炼身体,还是学校体操队的主力队员,并曾代表学校参加南京市的体操比赛并荣获亚军。

高中毕业,由于她成绩优异,在填报高考志愿时,老师指导她报考清华大学。由于当时她受到一部描写勘探队员生活的影片——《深山探宝》的影响,被那些年轻地质工作者的火热生活所吸引,同时也考虑到自己的境况,于是毅然改报一般女同学不愿报考的地质学院地质专业。

由于她有了在中学时打下的良好学习基础,进入大学,更是如鱼得水。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她不但能全部吸收而且还感到吃不饱。她如饥似渴地进一步请老师“开小灶”,上图书馆、上书店。有时看书竟然忘记了吃饭。

在大学她仍然是文娱、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她是学院舞蹈队队员、体操队队员,又是广播电台播音员,还参加了国家登山队,攀登上6282米的青海阿尼玛卿峰。

因为她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大学五年,她都被评为优秀学生。毕业时,著名地质学家程裕琪、王国伦听了她的论文答辩,给予极高的评价。

1961年,大学毕业了,按她的成绩本可以继续深造,攻读硕士研究生。但她想到新疆这块占祖国面积六分之一、有着丰富宝藏的广袤土地,正等着大批有为的青年去开发。于是毅然在毕业分配志愿表的六个空格里全部填上了新疆。

志在新疆 天山南北二十载

金庆民来到新疆,在自治区地质局里,领导对她说:“你是女同志,就去研究所工作吧!”

“不,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分到了哈密地质大队。队长说:“你是女同志,就留在队里做室内工作吧!”

“不,我要去野外勘探。”

“干野外,从来没有女的。”

“那就从我开始吧!”

就这样,她与男队友们一起背着地质包、骑上骆驼或马跋涉在戈壁沙滩和崇山峻岭之间。

勘探队员的生活是艰苦的,甚至是危险的。然而,她以苦为荣,以险为乐。甚至觉得苦中有乐,险中有趣。那塞外风光,那大自然中的千姿百态,常常使她陶醉。而当勘探中有了新的发现,更使她欣喜若狂,这时候她便放开喉咙唱起了那首《勘探队员之歌》: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驱散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

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歌声在戈壁上升扬。

金庆民深深扎根在新疆这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她不仅自己扎下了根,而且还把她的爱人从江南——人称天堂的杭州,带到了新疆。

她的爱人巫怀仁,原来是她大学时的同学。这是一个为了别人忘了自己的人。由于在实习时让别人睡床,自己睡地上,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毕业分配被照顾分到了杭州。

1964年,他俩结婚了。俗话说:“嫁鸡随鸡”。本来她爱人单位已答应将金庆民调到杭州。结果巫怀仁却“娶妻随妻”,跟着她调到了新疆。

此后,夫妻俩虽同在新疆,但却不同在一地。而各人都以事业为重,在疆16年,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加



在南极乔治王岛海军湾与荷兰学家讨论

起来不超过 16 个月。

1966 年,金庆民怀着大肚子,还在野外探矿,直到预产期临近,她才打点行装赶往绍兴婆家去生产。结果列车开到徐州附近,腹痛发作,一个女婴在途中诞生了。孩子来得太快,因此取名巫捷。小捷刚满月,金庆民就将她托付给婆母和姑姑,匆匆返回新疆。后来,他们的两个儿女也都是出生不久就寄养在姑妈家中。孩子们懂事后风趣地说:“我们是吃牛妈妈的奶长大的。”

为了事业,无怨无悔。她说:“我的青春虽然没有那么多鲜花,但我感到我的青春是美好的。天山、阿尔泰山到处都留下我的足迹。我的青春的火焰是在大戈壁上燃烧的。”

在新疆,金庆民度过二十个春秋,踏遍天山南北,行程十几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走了好几圈。她参加了十多个大、中型矿床的普查、勘探及地质研究。在塔里木盆地巴楚瓦吉塔格地区发现金伯利矿(角砾云母橄榄岩),一种原生金刚石母岩,被列为国家地质新发现,为开采钻石作出贡献。她参与编制的天山综合考察地质图与矿产图,获得了自治区的奖励。实践出真知,她先后发表了 18 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两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受到国外同行专家的高度称赞。

锐意进取 环球科学考察

1981 年,金庆民和巫怀仁被调到地矿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长年与他们阔别的儿女这才回到了父母身边。

家团圆。虽然这时她已人到中年,但并没有沉湎于天伦之乐。刚在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坐下不久,她又主动联系到边疆的科研项目。只身离家,跋涉在云贵高原、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之间,考察了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地区的矿藏,行程一万五千多公里,采集了数百公斤的矿石标本,记录了上百万字的地质资料,完成了《中国矿床·铅锌矿分册》的编写任务。

1986 年,中国第三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将作中国首次环球科学考察。当时地质科学院有一个名额。金庆民闻风而动,积极争取,终于成为这次科学考察队的唯一一名女科学工作者。

10 月 31 日,“极地”号科学考察船从青岛起锚。这次活动历时 199 天,环球航行 30921 海里,他们穿越太平洋到南极,然后又横渡大西洋,经好望角,过印度洋。由南中国海,返回青岛。



在新疆阿尔泰山考察地质。

在波涛汹涌的大洋中,“极地”号如一片扁舟。当船进入西风带,台风肆虐,风力达 10 级以上,狂风巨浪使甲板上装载的设备器材开始松动,为了保护这些器材,金庆民和其他几位男士一起冲上甲板。这时一个大浪打来,将他们摔得老远。但金庆民毫不退缩,爬起来再冲上去,将器材重新捆紧。

当船穿越德雷克海峡,向南极挺进时,“极地”号考察船被众多的冰山所包围,最近的相距只有 10 米。如果碰上它,就会造成船翻人亡的惨剧。这时大家都十分紧张。而金庆民则觉得这正是观察冰山活动的绝好机会。她站在甲板上仔细地观察。那冰山在阳光下闪着幽蓝的寒光,如一座座晶莹的玉雕漂浮在海上。海浪撞击着冰山,融蚀出无数孔洞裂隙,不断有冰山崩塌到海里,发出轰然巨响,令人惊心动魄。而那些经过风化融蚀的冰山形态各异,有的如巍峨壮观的城堡;有的如玲珑剔透的水晶宫;有的如黄山绮丽的山峰。令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创造出如此美妙的人间仙境。她频频按动着照相机的快门,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好在这里入夜后阳光仍毫不吝啬的普照大海。

经过五十余天的海上航行,12 月 28 日考察队登上了南极北部的乔治岛,我国的“长城”科学考察站就设在这里。

南极是人类发现的世界第七大洲。由于它是全球最寒冷的地方,又被称为“寒极”。这是一个冰雪的世界。然而它却是一块万宝之地。蕴藏着金、铜、铀等

二百多种矿产资源,有世界最大的煤田;有足够全世界用二百年的铁;石油储量相当于目前世界年产量的二、三倍。因此,它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地质科学工作者。

考察队到达南极后,首先投入了紧张的扩建长城站的劳动。金庆民和男士们一道,日夜奋战将一千五百吨物资及数百吨柴油卸运上岸。抢建了实验楼、高空物理实验室等设施。接着开始了全面的科学考察活动。他们每天早晨5时起床,晚上7时返回营地。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中午就在外面啃几口干粮。南极夏季天气多变,风力高达11级,暴风雪横扫而来,使人睁不开眼、站不住脚。她和两位男同胞一组,经常冒着大风雪行走三四十公里。返回时还要背负四五十斤重的标本。尽管在零下10度的气温里,汗水也会把内衣湿透。

就这样凭着一股拼劲,她与中科院地质所的一位同事一起,以短暂的17天时间完成了菲尔德斯半岛南部地区1:10000地质填图;实测两条长达1653米的剖面;观察地质路线14条;地质观察点171个;采集各类岩石标本365块。

回国后,金庆民谢绝了领导让她去疗养的安排,甚至没有休息一天,就又钻进工作室,建立了该区火山岩系的地层层序;划分出拉班系列和钙碱系列两类岩石;测了火山岩系为始新世早期的地质时代;通过古磁测定,获得了火山岩地质体向赤道方向游移约2度的资料,还完成了火山岩造岩矿物、冰雪的氢氧同位素研究。以她为主撰写的两篇论文被南极国际会议所采用。

勇攀高峰 生死置之度外

1988年11月,金庆民作为唯一的女性,参加了由中美双方联合举办的攀登南极最高峰——文森峰的登山科学考察活动。文森峰位于南极极地高原的埃尔斯沃思山区的北部,海拔5140米,被称为世界第七高峰,地势非常险峻,最低气温达零下88度,被人称为“死亡地带”,至今仍是地质学研究的空白区。金庆民深知此行的艰巨和危险,然而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1月25日,她与其他队友到达智利港城彭塔阿雷纳斯,准备从这里飞越德雷克海峡,登上南极。登机之前,美方人员发给每人一份美国政府的照会。照会称:“美国政府鼓励、支持南极科学考察和探险事

业,但对探险者的生命安全不负任何责任。”要每人必须在这份“生死文书”上签字,方可获准登机。

金庆民毫不犹豫地首先在文书上签了名。其实,她早已作好准备。五个月前在国内签署的中美联合协议中就有一条:“在这次南极探险中,队员如遇难,遗体就地掩埋。”临来南极之前在北京她已分别给研究所领导、助手和丈夫分别写了信,对自己的“后事”一一作了安排。

飞机在德雷克海峡上空飞行。德雷克海峡是地球上最危险的一个海峡。上次乘船,金庆民已领教过它海上冰山的威严。而今飞行在它的上空,南极气旋似乎又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强大的气流,使机身剧烈颤动,一会儿抬着飞机迅猛上升,一会儿又压迫着飞机大幅度下跌。飞机上下起伏、左右摇晃,好似断线的风筝飘忽向前,随时有撞上冰山,坠入深海的可能。

大约是经过德雷克海峡上空,剧烈气旋的冲击。当飞机飞抵南极大陆的上空以后。一个螺旋桨突然停转,而且机翼下还出现渗油。这时机上的人无不提心吊胆。莫非真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么?大家都作好了应急的准备。万幸,情况没有继续恶化下去。飞机



在南极之巅发现铁矿。

赖着另外三个螺旋桨坚持飞行,终于将他们送到了南极爱国山营地。

一下飞机,大家都兴奋得鼓起掌来,庆幸安全着陆。这时已是夜里11点钟。然而,极地太阳照在冰原上反射出的强烈光芒,刺得大家睁不开眼。大家只好眯缝着双眼来观察眼前这一片银白的神奇世界。

为了争取时间,中美联合登山队一行6人,顾不得住下休息。又换乘一架小飞机,飞往文森峰。凌晨3时到达文森峰下的登山大本营。说是大本营,其实什么也没有。这里海拔2286米,由于地处南极腹地,虽说是夏季,气温仍在零下40度。刚下飞机一会儿,3名美国队员的大胡子上就挂满了冰花。中国队员的头发、眉毛也都一片银白。在空无所有的营地上,大家开始紧张地搭帐篷,直到凌晨3时,帐篷搭好了,一个个又累又困,也顾不得吃饭喝水,便钻进睡袋呼呼入睡。

为了抢时间,大家也不敢多睡,11月28日,便开始登山。他们每人穿着3公斤重的登山靴,背负二三十公斤重的物品,男队员们还拉着两个雪橇,艰难地攀登着。他们爬过两道长长的冰坡,在距离大本营7.5公里的地方建了第一号营地。这时天气骤然阴沉,接着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文森峰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为了防止帐篷被刮跑。大家又沿着帐篷垒起一圈半人多高的冰墙。营地建设好,便开始做饭——将冰块放在特制的高山煤油炉中融化,煮压缩面条。由于气温低散热快,一锅面条煮了一个多小时才煮熟。吃面时队友小李用舌头舔了一下勺子,舌头便于勺子冻粘在一起,他一拽勺子,便扯下了一块皮。

第二天,联合登山队向海拔3200米的2号营地进发。途中一段近70度的陡峭冰坡,光滑透亮,登山靴尖如犬牙的冰爪走上去,只留下浅浅一层爪痕,抠不住冰道,直打滑。他们每人都背着二三十公斤重的登山包,重心很难把稳。如果稍有闪失,就会葬身400多米深的冰谷。

为了使其他男队友们更顺利地登山;更重要的是为了完成她所担负的科研任务。金庆民没有与其他5名男队友继续去攀登顶峰。而决定独自一人留下,在附近作地质考察。在这里进行考察,能准确地了解、判断埃尔斯沃斯山脉的地质特征和地质构造演化史。

南极大陆绝大部分被冰雪覆盖。只有7%的地方裸露出它的荒丘。而那些露头又大都处于险峻的山

崖、陡坡、风口等积雪留不住的地方。为了采集一块岩样,她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攀登峭壁。身上的防风衣、登山靴都被划破了、手上也抠出一道道血口,但她仍顽强地、一丝不苟地取岩样、拍照片,画出一幅幅信手地质剖面图。

12月1日凌晨3时,当她完成了又一幅信手地质剖面图,返回一号营地时,极地风暴接踵而至。金庆民在帐篷里吃了几块苏打饼干,钻进睡袋。过度地疲劳使她很快进入了睡乡。到中午11时,猛烈的风暴将她从昏睡中刮醒。一阵强劲的暴风掀起了帐篷的一角。雪直往里灌。帐篷外,风雪刮得天昏地暗。太阳看不见了,文森峰也看不见了,天地一片混沌,仿佛一幅“世界末日图”。酷暑使鸭绒被下的海绵垫冻得如一块冰床。她穿上所有的毛衣、毛裤、羽绒服、防风服,卷曲在鸭绒睡袋里,胸口还放了一块“帖保灵”暖药。仍感不到一丝暖意。她知道,如果狂风刮跑了帐篷,她将被暴风雪所埋葬。然而,她并不畏惧。请听她当时的一段录音:

“亲爱的朋友。你如果要问我现在是怎么想的,我要告诉你,我感到孤单,可我感到幸福!因为作为一名女性,作为一名女地质工作者,我已涉足了这南纬78°29'的地域。涉足到这高耸入云、地势险峻的文森山地区。我孤单地留在这白色的冰原上,可是我的心是和祖国人民连在一起的。”

“现在气温很低,一片冰海。但是熊熊的烈火在我胸中燃烧,强烈的事业责任感使我坚守在这冰原上,使我去攀登那险峻的冰山,去采集样品,去探索地球最南端地质的奥秘。一个人能为自己的理想坚持不懈地奋斗、永不停息地去探索那未知的世界,去攀登那一个又一个新高度,难道不是最大的幸福吗?事业和我同在,亲人和我同在,祖国人民和我同在,我并不孤单。”

1988年12月2日,文森峰上的太阳又发出了它的光辉,冰原上闪着耀眼的银光。金庆民全副武装的走出了她的“水晶宫”,继续战斗。

她沿着一个近40度的冰坡艰难的攀登着,用心地观察、测量,采集样品,绘图拍照。她深知在这块处女地上的每一点记录都将成为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资料。

晚上8时许,当她来到一个山坡背斜的轴部,突然发现了铁矿露头。沿着这露头的走向继续追索,证



向著名物理学家周培元先生赠送南极岩标本。

明这是一条长约20公里、厚度在200米的含铁岩系和铁矿带，一个大铁矿被发现了，她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祖国啊！为你的女儿骄傲吧！”接着她把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放在矿体上：“中国、中国，中国在这里！”

当她背着沉甸甸的矿石，朝着营地往回走时，一看手表已是夜里11点多钟。从上午10时出发，她已整整工作了13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没有进一口食。她感到全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但是她必须在暴风雪来临之前赶回营地。

前面是一道冰坡。为了减缓坡度，她采取“S”形路线一步步往下移动。忽然，冰杖从她手中滑脱，全身失去控制，迅速滑向坡下。她靠着冰镐好不容易站立起来，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但是由于体力不支，一脚蹬空，掉进了冰裂缝。这冰裂缝乃是一个很深的陷阱，掉下去就别想爬上来。万幸，这裂缝口不宽，大约只有40多厘米。尽管双腿已掉进去，而背上的背包却还卡在上面。使她没有完全坠入，她拼命挣扎起来，否则她将永远葬身在这阒无人迹的冰窖里了。当她重新上路时，两条腿好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到达营地，已是3日凌晨2时许。

这时，她的两位中国队友也在完成登顶任务后，返回一号营地与她胜利会师。

4日，美国朋友也从顶峰安全归来，中美联合登山科学考察全体成员重新聚会在一起。大家互相拥抱、祝贺，流下了欣喜的热泪……

金庆民为我国南极考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89年3月中国地质矿产部在73号文件中这样写道：“鉴于金庆民同志此次赴南极考察成绩卓越，为对其给予表彰和激励更多的同志向她学习，经研究决定授予金庆民同志部劳动模范（晋升一级工资）称号，荣记一等功一次。”

三赴南极 考察再结硕果

1990年10月，金庆民又参加了中国第七次南极科学考察，这已是她三赴南极。在前两次考察取得重大收获的基础上，这次将进一步扩大考察范围。

25日，金庆民率领一支由地质研究所及南极研究中心7名中、青年地质科学工作者组成的考察组，乘坐“海洋四号”考察船，由广州启航，斜穿太平洋，经斐济抵南美，再越德雷克海峡，航程13000余海里，在沿途一路考察两个多月后到达南极。

金庆民领导的小组担负着南极陆上考察任务。他们以“海洋四号”船为依托，以长城站为基地。在南设德兰群岛的3个岛屿9个登陆点进行区域性综合地质考察。

险恶的气候，给他们的野外考察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月20日，他们正在凯勒半岛西部完成一项勘察填图任务。忽然纷纷扬扬地下起雨夹雪来，他们冒着雨雪坚持工作。待完成任务后，大家从外到内全身湿透。这里离基地尚远。他们便到附近巴西考察站设的一处避难所内暂避。可是外面的雨雪到晚上仍然很大，大家无法返回住地，只好裹着毯子躺下休息。他们感到又冷又饿，不得已动用了避难所里的救生食品。给未曾谋面的主人留下了一张表示谢意的字条。

南极考察是艰难的。然而，他们却感到极大的乐趣，甚至觉得在极地生活是一种美的享受。正如金庆民在她的相片册里写的那样：“我来到世界上最大的冰雪王国。茫茫雪原，莹莹冰川，仪态万方的冰山，蔚为奇观。在这片美丽、宁静、洁白的土地上，我们尽情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自然博物馆。这里是一片没有污染的净土，这里是地球上尚未开发的万宝之地，这里闪耀着奇异的生命之光。”

在她的相片册里,我看到她与企鹅在一起的照片。那说明词里写道:“我来到企鹅的乐园。这些颇有‘绅士风度’的企鹅,大腹便便,步履蹒跚,憨态可掬,令人喜爱”……

南极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也有让他们大饱口福的时候。他们在彭塔阿雷纳斯海边捕螃蟹。那里的螃蟹又多又大。大概从来没有人捕捉过。所以很容易捕捉。他们没有什么捕蟹的工具,就在用来装垃圾的筐里放上一些烂鱼肉。然后用绳子吊着放入海底。大约十来分钟后拉上来,筐里起码有二三十只三四两重的大螃蟹,不多时候就能捞起上百斤。于是,他们就大吃清蒸螃蟹,品尝那特有的鲜美滋味。

这“世界真奇妙,不看不知道”

科学无国界。南极是一个国际协作的大家庭。目前已有三十多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五十多个常年科学考察站和一百多个夏季考察站。这次,他们先后与巴西、韩国、苏联、智利等六个国家的科学考察工作者进行了访问、交流。当国外同行看到他们获得的丰富资料和漂亮的地质图时,无不啧啧称赞。

此次南极考察对金庆民来说,除了完成科研任务以外,还有一个培养青年科技人员的任务。她说:“南极是年轻人的事业,应该让年轻人来锻炼。从实践中提高,从实践中成长。”“在舒适的研究室里培养不出真正的探险家”。因此,在南极她处处以身作则,对他们言传身教,将自己多年积累的野外工作经验,特别是在南极考察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们反映:“跟金老师在一起,我们得到很大的提高,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57天的南极考察任务。圆满地、超额地胜利完成了。他们带着丰富的资料和数以吨计的岩石标本于1991年5月回到祖国。

通过三次南极考察以及回国后的进一步研究,他们获得了丰收。由金庆民主持科研实施的两项成果,经由学部委员、教授、研究员等14人组成的“专家鉴定会议”的鉴定,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南极埃尔斯沃思山脉文森峰地质特征》的鉴定证书上写道:“它填补了南极最高峰——文森峰地区地质空白,是国际上第一份有关本地区地质研究报告,对南极地质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提高了我国南极研究的国际地位。”在《南极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岛弧火山作用及岩浆演化机理》的科技成果鉴定证书上写

道:“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系统深入的综合研究,填补了该区以往研究的不足与空白。为提高我国在南极洲地质研究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地质科技人员。”

现在,由金庆民为首编写的两本南极地质学研究专著已正式出版。

学者下海 科研实业并举

在三上南极之后,1992年1月至4月,金庆民又参加了中国与智利合作的一个地质科学考察组,对南美安第斯山脉南端进行地质考察。回国后,她一面对这次考察进行科学总结。另一方面,她又在考虑下一步新的征程——“下海”办企业。

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筹备。1992年6月,金庆民引进香港资金,组建了江苏省第一家中外合资金石科技开发公司。她亲自出任总经理。

当一位香港记者问她为什么要“下海”办公司时。她说:“有多少科学家因经费短缺而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我‘下海’办企业,要设法为公司挣钱,去支持科研,奖励科研。”

公司正在筹办经济实体。首先打算开发一种矿物。其目标不仅是开出矿产品,而且要对它综合利用。利用其副产品——矿物有机质。生产出医药、食品添加剂、营养饮料和农肥等多种产品。

除了有关矿产品的科技开发以外。他们还准备在建筑、化工、电子、机械等方面进行科技开发。

公司不仅要开辟国内市场,而且要面向世界,打进国际市场。现在公司已与韩国有关部门初步达成意向协定。根据协议,将在韩国与他们合作共同开发一处金沙矿。另外,还准备与美国一家电脑公司合作,进行软件开发。

他们通过对一些地区的考察。发现许多乡镇企业,这几年发起来了,拥有较为雄厚的资金。但却对新的投资意向把握不住。金庆民利用她曾多次出国广交朋友的有利条件,准备帮助他们向外发展。余杭市的一位副市长曾来公司跟金庆民商讨计划到巴西去建一座中国城。常言道,“一个良好的开端,已经是成功的一半。”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成功是可以期待的。

金庆民在地质科学道路上,经过三十余年的艰辛跋涉,取得了非凡的成绩。目前虽已年过半百,却仍精神抖擞。在第一职业之外,又在第二职业中大显身

建设新雨花 繁荣南大门

● 南京市雨花台区城乡建设局局长 杨炎平

南京市雨花台区城乡建设局自 1985 年从原区城乡建设交通局分建以来,在市、区有关部门领导下,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充分发挥我局的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职能作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不断地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雨花台区的投资环境。

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我们根据《城市规划法》和《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的条款,严格执行“一书两证”制度,使全区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全面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先后制定了全区的工业小区规划、农民新村规划,着手编制和完善集镇发展规划。1990 年,我们理顺了全区城乡建设管理网络,后在全区实行了“政务下乡、现场办公”制度,定期到各乡镇办理建房执照批建手续,集中了管理权限,明确了管理职责,从根本上扭转了多年来乡镇批建、部门盖章、违章建设屡禁不止的弊端,改善了政府机关的形象,提高了办事效率。到目前为止,我区已规划建成兴隆、雨花、天堂、赛虹桥等农民新村 25 片、有 450 多户农民进驻,改善了农民的居住条件。

加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几年来,结合创建卫生城活动,我们开展了道路创建工作,先后投资翻建了雨花路、雨花东路、雨花南路、共青团路、长虹南路。特别是 1992 年投资 1073 万元,独立承担了拓宽改建雨花西路和排水工程任务,并提前三个月竣工通车。雨花西路成为雨花台区的门户。目前,我区城市道路面积达 122403.6 平方米,道路完好率达 100%。1993 年,为作好秦淮河整治工程的配套工程,我们又承接了纬七路(西段)拓宽改建工程和污水截流管工

程,现已进入紧锣密鼓的施工阶段,预计年底竣工。城镇绿化和环卫管理工作近年来也有了可喜的进步:全区城镇绿化总面积达 514.9 公顷,公共绿地 150.3 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已达 10.78 平方米,绿地覆盖率提高至 27.1%,并有 35 个工企单位进入绿化达标单位行列。而菊花台公园的正式对外开放、成功地举办九一、九二年“雨花台区金秋菊花展览会”,则标志着我区的专业绿化工作已达到了新水平。全区环卫管理工作通过几年的努力业已形成专群结合、条块结合的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体系,专业保洁面积 264348 平方米,拥有水冲式公厕 39 座,机械式垃圾中转站 3 座,垃圾自卸车 6 辆,保洁车 70 辆。

加强城市综合整治工作。近年来,我们结合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和开展“金陵市容杯”活动,加强了城建执法队伍建设,在全市率先组建了由规划、市政、环卫、园林等专业执法分队组成的雨花台区城市建设监察中队,按照《城市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城市市容环卫条例》及《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南京市市容环卫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性文件赋予的权力,对全区市容、市貌进行了综合整治,自 1990 年以来,共查处违章搭建 629 起,拆除违法(章)建筑 16360 平方米。我区的城市建设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1992 年,我局被市政府授予“城市综合整治立功单位”称号。

雨花台区——作为南京市的南大门,将以更新、更洁、更美的市容迎接中外宾客的到来!

(责任编辑 吴纪岫)

手,在她的生命乐章里,仿佛没有休止符。

她的成就,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赏。先后被授予“地矿部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她的名字已列入《中国人物年鉴》和《中国名人辞典》。并被

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及美国传记学会选入《国际名人辞典》。载入《世界上有杰出成就的人》、《世界上杰出的妇女》、《杰出人物五百名》等书中。

(责任编辑 霁 明)

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

李国鼎

崔之清 张黎宏
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



李国鼎先生(左二)

1968年,有“亚洲诺贝尔”之誉的菲律宾麦格赛赛基金会颁给台湾“经济部长”李国鼎以“政府服务奖”,称赞他是在国民党当局“迁台后的艰苦岁月中,缔造台湾工业奇迹的一位主要设计者”,以积极合理的方法,指导台湾经济成为世界“经济成长快速地区之一”。当时的外电报道都将他称为台湾“工业发展奇迹的缔造人”。享此盛誉的李国鼎在台湾人人都不陌生,只要提到经济“起飞”和科技发展的功臣,都会说出KT李(李国鼎)的大名。

李国鼎,1909年生于南京市,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与暨南大学合办之附小、钟英中学就读,1926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34年以优异成绩获中英庚款公费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三年后获硕士学位回国,任教于武汉大学。翌年入防空学校从事防空机械修理及照测工作,后转往资源委员会。1948年去台湾,任台船公司协理、总经理。1953年,应“经安会”主委尹仲容的征召,出任该会专任委员,跻身于台湾经济决策机构。之后,因其才干和任事勤奋颇受当局赏识,连次提擢,由专任委员而“美援会”秘书长、“经合会副主委”、“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直至1976年6月辞职,后专任分管科技的“政务委员”,转往科技界发展。现任“总统府资政”。李氏主控台湾财经、科技发展之设计与决策大权凡数十年,是财经系统中重要元老人物之一。

一、求知、求新的一生

李国鼎由学界起步进入企业,再往财经、最后回到科技领导层,“科技牌”是他最大的资本。四五十年代,美苏的核子竞赛愈演愈烈。国民党高层颇受影响,十分重视科技人才,自然对李国鼎这位剑桥留学生格外垂青。然而,工业、财经与科技毕竟相差甚远。要想做好各项工作,必须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李氏之所以能胜任各项重要职务,并取得出色的成就,全靠不断的求知。与他共事的人都承认,李国鼎吸收新知识的速度和广度,一向超越同仁。他喜欢将自己形容成一个“空罐子”,常说“我愈求知,愈觉得自己不足,因为知识的范围实在太广泛,进步也太快了。要能保持好奇心,不断的求知。若有一天感到满足时,这个人的人生也就接近终点了”。他从求知的角度,回顾自己一生,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校求学时期。中小学时,他对各门课程都很感兴趣。后在一位认真的数学老师的陶冶下,迷上了数学,直至考入大学数学专业。其时核物理研究正在兴起,李国鼎遂即改修物理。留学英国时就选择了当时研究核物理的重镇——剑桥大学物理研究所。

剑桥给他的影响是深远的。现代科技、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都给他以很大的教益,各位导师的治学方法给了他很多启示。剑桥有一批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学者常在喝下午茶时,相互交换工作经验和研究心得,沟通意见,彼此都了解对方的研究领域,在交流中相互切磋学问,使各位学者都深受启迪。李国鼎常深有感触地回忆:“这种研究学问的方法教给我,对任何问题,要先对整体有所了解,再排定先后次序着手进行”。

从1937年回国工作起,到1963年担任“美援会”副主委,李国鼎将这26年称为“实习中求知”阶段。

回国后不久,李即弃教从事防空照测和修理工作,这与所学理论物理知识颇多差异,但其已显出头脑灵活、擅长解决问题的特长。其后转往工业,从事筹建炼钢厂与造船厂的工作,从中取得管理与发展重工业的实务经验。进入政界后,陆续接触到财税、经济等问题,并逐渐担当起筹划整体经济的重任。对他而言,每一次转行都是一次重新学习的起点,他常对人说:“由科学转到工程,再由工程转到社会科,领域虽有所不同,但我一直战战兢兢,也兴致勃勃,用心把握种种学习机会,从未敢轻忽懈怠。渐渐地,这种心

态与做法就成了习惯,想变都变不了了。”

第三阶段从1963年至退休,是“知识与经验的整合阶段”。这段期间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他一生最具成就的时期。从“经济部长”到“财政部长”,同时兼“经合会”副主委,再至主掌科技的“政务委员”,工作涉跨经济、财政、科技多界,需要经济决策、管理和现代科技等多方面的知识。此时,李国鼎身负重任,学习更加勤奋,思维也更趋周密和严谨。他觉得自己对各种问题已渐有系统的观点和看法,能够综合过去的经验与专门知识,清楚地分析、判断事情的轻重缓急,有系统地解决问题。

李国鼎的知识面很宽,在经济、管理、科技等方面皆有相当造诣,著述丰盛。他总结自己获取知识有三大来源,即“看书、见客和出国访问”。

喜欢读书,这是他从小养就并伴随终身的爱好。每次外出,总要带回大批的新知识书籍,长年月累,个人藏书竟有3万多册。

从政期间他访问过许多国家和地区。每次访问,总是放弃游览机会,而到各地去考察,以吸取先进经验。在担任财经首长期间,结识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财经官员及企业家,从相互交流及他们所提供的公司年报中,增加了对世界经济、产品发展和各公司经营策略的了解,得到许多书本上没有新鲜和动态的资料。

李国鼎还常常就台湾经济、科技发展等发表演讲。他有一个原则,坚持每次讲演都有新内容,因此必须认真思考和准备。讲稿大多由自己写就,不劳秘书代笔,且讲哪方面的问题就请教哪方面的专家。这样许多专家都成了他的朋友,他亦易于获得最新知识,观念也超于别人,台湾一位政要常说:“李国鼎先生的外表较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二十岁,他的观念也比多数人前进二十岁。”正是这种不断求知、求新的精神,才使他能多项领域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为台湾经济、科技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二、当代台湾经济发展的设计师

李国鼎1953年进入“经安会”任工业委员会专任委员,开始其经管生涯。“经安会”是国民党在台初期的经济主管单位,李氏上任后,通过广泛的调查摸底,鉴于当时的物力和技术条件的不足,主张实行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之战略,以现有设备为主,采取重点主义又兼顾适度平衡、扩充生产与改进生产并重,以岛内

市场作为生产目标的策略,使工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受到主委尹仲容的赏识。1958年“经安会”撤销,尹仲容任“美援会”副主委,李被任命为秘书长,后又兼工矿计划联系组和工业发展投资小组的召集人,成为尹仲容的主要幕僚,积极参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决策。

当时,台湾经济尚未完全摆脱困境,生产能力不足,基础实施不配套,部分物资供应紧张,“美援”是维持台湾经济的支柱。当局虽然制定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发展方针,但发展工业的资金、技术、原料和大批机械设备主要依赖进口,几乎所有的大型工业建设项目都需“美援”支助,“美援会”遂成为四年经建计划的主要执行机构。1963年9月,尹仲容去世,李国鼎继任副主委(主委陈诚,12月,“美援会”改组为“经合会”)。1965年1月又兼任“经济部长”,从而主控台湾经济发展的决策大权。

“经合会”的职权比“美援”会有所扩大,它不但负责台湾经济发展的方针研拟,同时还协调各执行部门实施经建计划。李国鼎接任后,首先主持制定了第四期四年经建计划。根据当时岛内经济情况,决定转变经济建设重点,实行出口扩张发展战略,改善投资环境,增加投资,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成立了“筹设加工出口区临时工作小组”,先后设立了高雄、楠梓、台中等加工出口区,以引进技术、增加就业、扩大对外贸易,这些措施都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同时在财税金融政策上也相应进行配套改革,如减少税收、奖励投资、增加对民营企业贷款、外销退税、加强农业配套建设等,收效良好。台湾经济导向“起飞”时期,10年期,工业年增长率高达18.1%,对外贸易增长势头迅猛,年增长率高达20%以上,侨外商投资剧增。经济结构实现转型,由以农业为主转为以工业为主,工业以进口替代为主转向以加工出口为主,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渐形成。

1969年6月,李国鼎奉调为“财政部长”兼“经合会副主委”(主委严家淦,1972年后为蒋经国)。及至1972年蒋经国“组阁”,在李国鼎支持下,推行“十大建设”,发展重化工业。同时,李在财政上也作了一些改革,以因应现代化建设,如扩大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修改“关税法”促进对外贸易、筹款成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促进金融动

员,改进赋税和金融管理制度等,大力筹措资金支援经济建设。

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引发了台湾经济潜伏已久的一系列问题,在经济资源、基本建设、技术劳动力和外销市场等方面都出现了“瓶颈”,通货膨胀严重。为克服困难,李国鼎首先在财政上实行紧缩措施,将台币升值、发行各种有价证券、强化金融措施、降低进口关税、延缓基本建设等。接着在贸易、物价等方面都实行紧缩措施。随后又根据新的情况,停止执行第六期四年经建计划,重新制定了六年经建计划,加强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经过几年整治,台湾经济发展指数重新回升,并开始了工业经济的第二次转型——由劳力密集工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转变。李国鼎的个人威望也达到顶峰,一位政坛要员称他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最杰出的财政部长之一”,政坛时有其将出任“行政院长”的风声,但他却因心脏病发于1976年6月辞职,后奉调为专管科技发展的“政务委员”,开辟其政治生涯的又一春天。

三、台湾现代科技发展的开山祖师

台湾六年经建计划(1976—1981)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升级”,科技是决定其能否实现升级的关键。科技发展工作牵连甚广,必需综合各部门有关的力量和智慧,共同策动。李国鼎出身科技界,又具有财政、经济、工业等完整的经历,提携的门生故吏遍门各级机构,故推展工作颇为方便。

上任后,李氏立即成立“行政院应用技术研究发展小组”,作为发展科技的主管机构。这是一个跨“部会”的小组,成员包括经济、财政、教育、科技等各机构首长,直接向蒋经国负责。主要任务在于推动及协调全岛的科技活动。对一些跨学科、涉及不同经济及研究部门的科技研究与开发项目,小组下单设专门小组,以统一规划发展和协调指导。短短几年之间,该小组几乎抢走了“国科会”(台湾科技主管机构)的全部生意,KT李的大名也从此在工业及科技界生根。

李国鼎对台湾科技发展的贡献,首先是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设。1977年2月,他提出建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构想,以吸引技术、外资,带动岛内的“工业升级”。园区重点发展所谓策略性工业,主要是机械、电机,特别是以资讯工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工业。李国鼎特设了“资讯策进会”,全力推展该项工作。1979年园

』

南京举办《东方巨人毛泽东》大型展览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由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党史办等九个单位于 4 月 23 日起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东方巨人毛泽东》大型展览。共展出毛泽东同志的照片、书法等展品 300 余件。其中有不少照片是首次面世。展览分七个部分:(1)深谋远虑的军事战略家;(2)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3)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4)毛主席和人民群众心连心;(5)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6)生活中的毛泽东;(7)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艺术。该展完整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光辉的一生,展示了他在政治、军事、理论、外交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巨大影响和杰出的贡献。

(施善萃)

区开始建设,一直延续到 80 年代,渐成规模。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实现整个台湾的工业升级,但台湾的电子工业却在这时有较大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工业,给工业经济和技术结构带来较大冲击。

1979 年,台湾当局为促进科技发展,聘请了 5 位外籍专家组成“行政院科技顾问小组”,结合岛内外学人及企业界人士,全面推动生产自动化,由李国鼎负责监督,直接对“行政院长”负责。李氏又全力投入该项工作,设立了许多专业组织,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和规划,目的在推动台湾工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自动化生产、以及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他还时时强调现代知识分子一定要懂得经济、电脑和管理知识,并以身作则带头学习。经过几年的经营建设,成效显著,受到各界人士的推崇,特别是中小企业主的欢迎。

李国鼎十分重视台湾科技事业的长期和持续发展。1979 年 5 月,他主持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方案》,作为台湾“现阶段科技最高指导原则”。该方案规定了台湾科技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在指导和推动科技事业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和重要措施。1982 年 2 月,又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方向作了修订。80 年代台湾科技事业的发展也基本上是依照这个方案所规划的方向进行的。

发展科技最关键的是人才,为拓展科技队伍,提高科技人员素质,李国鼎于 1982 年主持制定了《加强培育及延揽高级科技人才案》,这是一个全面培育人才的方案,突破了许多陈规旧习,分立即采取措施和中长期规划两个部门。对岛内人才培育、延揽海外人才等都提出了相应措施。他希望两年试办期满后,能

扩大一般科技,造成有利于整体发展的优良环境。此方案目标还没来得及实现,他即因心脏病发作于 1984 年赴美就医,交棒他人,所领导的“科技顾问小组”也改隶“经济部”,台湾科技发展的重心,亦转移到“国科会”去了。

四、并不寂寞的晚年

现任“总统府资政”的李国鼎,位坐国民党中常委第二把交椅,虽然已不担任任何公职,但由于长期在经济、财政、科技界任职,提拔的子弟仍是当今台湾财经、科技界的主流(外界称 KT 系)。王建煊(原财政部部长)、王昭明(行政院秘书长)、徐立德(国发党中央财务会主委)、薛家桢等李氏人马皆位居要津,把持财经大权,故其在财经、科技界仍享有一言九鼎的尊严。

现在台湾媒体已鲜少有关李国鼎的报道,但在财经、科技会议等场合,他还是最忙的人之一。遇到不能解决的议案,他或与人窃窃私语、交换意见;或穿梭会场,整合沟通各派,议案往往便顺利通过。平时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李氏常以一个电话,各部会即会主动执行。其在幕后的影响力难以估测。

他还常常就岛内经济、科技及组织人事等重大问题发表公开谈话,常为当局重视,以作决策的重要依据。前不久,他建议当局应放弃保守身段,加强两岸的科技交流,并使之正面化、制度化,在两岸科技界反响强烈。

在政界任职时,李氏一向以三快著称,即走路快、说话快、做事快。走路常常是一步三台阶,说话快得连秘书都难以记全。工作效率很高,早上上班花十几分钟时间即能将当天的剪报资料阅读完毕,并一一做出批示,交给下属的事总是要求立即办好。台湾一位

风靡世界的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 李北祺教授

“民以食为天”，谈吃，是个永远不枯燥的话题。”听说笔者想了解一下李先生在把中西饮食文化相结合方面如何闯出了一条成功之路时，他愉快地接受了此次采访。

虽说李北祺教授原籍在四川铜梁，但他从小是喝扬子江水长大的，十五岁才告别金陵去美国谋生，他把自己视为地道的南京人。

据李先生回忆，当时到大洋彼岸求发展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以经营餐饮业为主。中国的京、鲁、川、江、粤五大菜系驰名中外，中国的烹调技术在世界享有盛誉。尽管在美国开餐馆的也有不少日本人、韩国人，但他们哪里能与中国餐馆相比拟？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有孔子菜谱、红楼菜谱等 170 多种菜肴可供食客挑选，煎、炸、炒、火局、煲、清、香、酥、脆、浓，五滋六味倍受美国食客青睐，现有 6 万多家中式餐馆遍布美国各大小城市。

李北祺教授本人是从事中国餐饮教育业的，对中国的烹饪技术有专门研究，拜他为师的弟子达千余名。门徒学成之后，得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于是李先生决定开薄利多销的牛肉面馆作为他们的实践基



中为南京市副市长钟裕辉，右为李北祺教授。

左为南京金鹰总经理陶耀乐。

地。1974 年，“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在洛杉矶正式创立，谁知开业后一炮打响，加州牛肉面以它的物美价廉，方便快捷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顾客，一个面馆远远招架不住那蜿蜒如龙的食客队伍，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的分店便一个个应运而生。就餐的食客中美人士、少数民族都有，华侨社会与当地入一半对一半。我问李教授：“现在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发展多少家了？”李先生回答说：“除美国外还有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有 40 多家，在北京、上海等国内 17 个省、市也

财经要员曾将他与尹仲容作过对比：“尹仲容交待你的事，总希望你明天做好。李国鼎今天交待你的事，总希望你昨天已经做好了。”但经过几次手术后，已大有改变。现退休在家的他，早起后常常是打打太极拳，闲时或与夫人散散步，打打高尔夫球，或摆弄花草，早年的急躁性格已难得见到。

在 1984 年手术后，有人曾以“休止符后，音乐

将重新奏起”，预测他未来政治行情仍将有看涨的一天。看来，他的健康和年龄已不允许其再另奏新的乐章了，但是他的乐队还在演奏。

生为南京人，又是南京大学的校友，他和夫人（金陵女大毕业）最大的愿望是能在有生之年重回故土。惟愿李国鼎先生伉俪早遂此愿。

（责任编辑 海 鸣）

相继开设了六十多个连锁店,还有不少城市的连锁店正在洽谈、酝酿之中。”看来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的崛起和兴旺大有不可阻挡之势啊!

“既然中国餐饮业品种万千,您为什么独独选中了牛肉面呢?”我好奇地问。李教授:“道首先,是它的大众化。牛肉,是美国人的主要副食,美国人普遍都爱吃牛肉。其次,在美国的华人很多,他们也习惯了吃牛肉,他们还特别喜欢吃面条。面条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年前的先秦时期,中国人就爱吃面条了。此外,意大利人不仅爱吃面条,而且注重原料加工流程。我们中国人,要在海外站稳脚跟,就得有开拓创新的意识,既然二百年前,祖先们就把中国的饮食文化与西方饮食文化融合,中菜西吃,我们今天不应在此基础上再有一个飞跃和发展吗?”所以,李教授便积多年烹调技术之精华,吸收意大利面条的配方,融美国地方风味及中华民族风格,精心调制了综合性的美国加州牛肉面,由于用料考究,味道浓郁,质地鲜嫩,回味无穷,而风靡世界。

“那么,您经营有方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呢?”李教授笑笑说:“除了意大利面条配方是专利,暂且保密外,其它都可以对你直说,那就是:碗大、份量大,保质保量;价低、味鲜,生肉三两三。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开业十八年来,始终坚持保证质量,信誉第一,今天来吃是什么份量,若干年后来吃还是这个份量。这是赢得顾客的关键所在。”“请问,一碗牛肉面的价格是多少呢?”“从开业到现在,价格一直很稳定,一碗牛肉面价格是美金三元五角。在国内则定为人民币三元八角。折合美金才六角。这样比较适合大陆人民的消费水平。”“十八年不涨价,会不会亏本呢?”“除了国家公布的两次正常调价而作了一些小调整外,基本上我一直坚持不涨价,严格把好进货关,减少不必要开销,我不愿把负担加在顾客身上。”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李先生,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说‘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一夜之间打垮了有两千年历史的中国刀削面’,对此您有何看法?”“我觉得这样的措词是有些反作用的,当然我理解这是国内新闻界朋友对我的鼓励,我认为不应有‘打垮’的提法。”“那么这面条是怎么制做的呢?”“为了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节奏,高效率,我们没有采用中国传统的拉面或刀削面,因为手工做太慢,跟不上需要,我们采用的是机器压面,快而均匀。”

“听了李教授这一番介绍,我理解了加州牛肉面实在是中西饮食文化的最佳结合,可我还想了解一下,您在国内外开了一百多家连锁店,对众多的员工是怎么管理的呢,或许这是您第三个经营秘诀吧?”李先生肯定地表示:“是啊,人的因素最重要。做好员工的工作,首先作为总经理的我要处处以身作则,要保持清洁卫生,注意店容店貌,客人多的时候,我自己也要拖地板,打扫洗手间……即使员工不愿做的事,我也要带头做。”“这么说来,您对员工要求一定相当严格,只要不满意,是否可以随时‘炒鱿鱼’?”“不,没有一次性辞退。我主张以教育为先,表彰为主,奖惩结合。鼓励表现好的员工,多发奖金。对犯过失的员工,则采取记过方式,三小过为一大过,给员工以充分自省改过的机会,除非连犯三次大过而不得不清除。”

得知李北祺教授此次来南京正是为1992年12月16日在南京湖南路40号开业的江苏省首家“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剪彩而来,作为一名南京食客我感到十分幸运,因为我不仅有机会探索了李北祺教授的经营秘诀,还亲口品尝了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在南京开张第一天的牛肉面,嘴!真是名不虚传:“碗大,味鲜,牛肉三两三!”发稿前,中方总经理陶耀乐先生打电话告诉我,湖南路40号新开张的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门口天天排长龙哪! (责任编辑 霁 明)

预 告

第一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
国际学术讨论会,于6月1日在
南京召开。本刊下期将发综合报
道及部分论文。

为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银奖获得者

甘当人梯的单樽教授

● 南京师范大学 邱志强

IMO 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英文缩写,它从 1959 年起源于欧洲,而今已逐步进入了辉煌的“亚洲时代”。我国虽自 1985 年才首次组队参赛,但后来者居上,1989 年、1990 年、1992 年都获桂冠。这斐然的成绩与中国代表队集训队老师们的辛勤劳动是密不可分的,在他们中有一个被国内外公认为 IMO“最佳教练”的单樽教授。他外貌颇为平常,中等身材,微胖的脸,常见的黑框眼镜,朴素的衣着,谦和的微笑,无半点名人气。往昔他曾跻身于中国首批理学博士的行列,今朝他刚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走上了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的岗位。这位年富力强的学者,几十年来驾着数学方舟,从平凡中驶来……

并非神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943 年 11 月 1 日,单樽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祖辈是读书人,他父亲曾任南京下关发电厂厂长。小单樽从小跟随父母在南京,那时候的玩具颇为罕见,他跟小伙伴玩骨牌,“摘骰子”,总是常赢,不知不觉中他就掌握了简单的加减法,那时他还不到四岁。有谁能想到,用传统的赌具作游戏竟然孕育了一个数学家最初的数学细胞。

1949 年秋季,单樽没有上一年级上学期就直接考一年级下学期了,但他连数字还不会写,为对付考试他学写数字。结果,他顺利地进入了汇文小学,算术、语文学习对他来说是蛮轻松的,留下大量的空余时间使他能钻进饶有兴趣的文史书中,至三、四年级的时候《说岳全传》、《封神演义》他已读过几遍了,岳飞精忠报国的形象给他幼小的心灵以很深的感染,旧版本的书常有评注,虽有封建正统色彩,然而正是这些已开始启发小单樽朦胧的思维了。五年级,单樽是在家乡读的,由于两地教学要求不同,他不很适应,



有的功课徘徊在及格的边缘,然而他没有一点儿不安,因为他有另一个天地。每天放学回家就捧着《西游记》、《东周列国志》、《水浒传》看,白天看,晚上点着油灯还要看,有时看得入了迷,头低下来,头发被火烧得“吱吱”直响。然而有谁能否认那些小说对他想象能力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呢?六年级时,他又回南京读书了。

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南京五中度过的,他学功课总是游刃有余,常凭着自己的兴趣去看书,在畅想中感受到一种轻松、愉悦。他的理解能力较强,许多题目看看想想就解决了,他做作业既快又好,在同学们心目中是一个聪明的小弟弟形象,同时很得老师的器重,初中时的数学老师贾长庚在一次复习课上指着单樽对同学们讲:“你们有什么问题请教他就行了。”上高一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出了三道题全班没有一人解出,老师第一个提问的就是单樽,虽然他没答对,但老师的信任激发了他不懈思考的热情,终于他把三道题都弄通了。

入扬师院读书,勤为人师

1960 年,他考入了扬州师范学院数学系。那段时期,国家很困难,学生们的温饱并未能完全解决,学校

里面的书籍也不很多,但学生们还是发奋地读书,单士骥曾在学校因勤学受到过表扬。也是在这批学生中后来出现了两个中国第一批理学博士——单士骥及他的同学冯玉琳。

1964年大学毕业的单士骥牢记着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导,站到了第四女子中学(人民中学)的三尺讲台前,然而两年后,“文革”开始了,学生们成了“红卫兵小将”,他为自己的学生在狂热中虚掷光阴而痛心疾首。他一直坚持摸索自己的教学之路。他认为中学数学内容是相当少的,培养解题能力是最重要的,数学教学就是解题教学,主张“精讲多练”。于是每堂课,他花十五分钟将基本内容讲好,然后通过各种题型来应用概念,在解题中使学生对概念加深理解。学生们感觉上单老师的课最好懂。

插上科学的翅膀腾飞

1978年单士骥进了中国科技大学学习,经历过动荡时代的他,面对新的环境,开始了新的奋斗。他给学生上课,帮教师改卷子什么事都干过,踏实、苦干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当时与他同住一个宿舍的有肖刚(当今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李克正,他们分别比单士骥小10岁、6岁,但他们当时已经很有建树了。他们三个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从两位年轻的学者身上,单士骥得到了启发,他说:在他们身上数学是直观的、形象的东西,在此以前我一直是重复着书本的东西,我应该像他们一样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我懂得了老是作读者的读者不是好读者。”他决心开拓新的领地,他曾师从数学家王元、曾肯成,陆鸣皋在解析数论上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凭着兴趣、凭着一意志,翱翔于自己的知识天地,辛勤的劳动换来了智慧的果实,他在数论与组合数学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83年他成为我国第一批理学博士之一,被列入了“国内一流专家”之列。他对整、素变数的华林问题,有条件的哥德巴赫问题等造诣精深,有些问题的研究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的最好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他的数论圆法研究,以方法新、工具新,具有相当高的创造性,改进了世界一流数学家达文波特(Davenport)教授等的成果。他的20多篇论文中,有15篇被权威的文献刊物《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和介绍,多项成果获科大科研成果一等奖。

作为一位有过十多年中学教学经历的单士骥,他

没有一味埋头于高深的学术研究,而是居高临下,深入浅出,不遗余力地进行数学普及教育。他陆续在《数学通讯》、《数学通论》、《中学数学》等刊物上发表数学普及文章100多篇,出版著作《几何不等式》、《覆盖》、《不定方程》、《组合数学中的问题与方法》、《趣味数论》等十多种。他认为,数学在不断发展,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作为一种思维科学,数学的价值又越来越为现代人所重视。这样,普及工作花费精力多,进行专业研究的时间就相对减少了。单士骥却乐此不悔,他广泛涉猎数学各个领域,并凭藉自己的研究造诣,立足于学科最前沿,认认真真地做著这一铺路奠基的工作。他对自己的教学普及读物力求四个特点:一是新,内容新、思路新;二是明,深入浅出,虽深又一眼见底;三是准,严格推理,一丝不苟;四是趣,引人入胜,生动可读。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的两大河流长江和黄河,它们的源头都是清澈见底的。讲授高深的知识,也应当如大河的源头,深则深矣,却应能一眼见底。”他的这些书籍,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有的被列为大学教材,有的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图书,还有的被介绍到国外,成为外国专家的参考读物。

劳碌为IMO,甘心作人梯

1985年起单士骥开始担任IMO我国代表队教练,凭着深厚的中等数学高等数学功底,他开始了向奥林匹克数学的进军。奥林匹克数学内容并不超出中学或中学生所能接受的范围,又有高等数学的背景,采用了很多现代数学的思维方式。这种“中间数学”联系着中等数学与现代数学,很多新思想、新方法、新内容通过这一桥梁,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学,促使中学数学发生一系列革新,跟上时代的步伐。正是由于这一强烈的改革时代意识以及让泱泱中华民族在世界数学奥林匹克占据应有的位置这种神圣的责任感,单士骥对奥林匹克数学进行了独到深入的研究。所有30几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题有近二百道,加上历届预选题,各国竞赛题与训练题,内容丰富,数量蔚为大观,倾心研究,全部解过这些题的人,在我国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单士骥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我国最先涉猎、介绍数学奥林匹克的专家。

1987年、1988年,他到加拿大的Wilfrid Laurier大学Alberta大学,美国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进行学术访问,并在加拿大Bangg参加了国际数论会议。他在提高自己学术水平的同时关注着IMO,时刻留心

搜集一些资料。

1989年,他担任中国IMO集训队副领队兼教练,在30届IMO上我国以4枚金牌、2枚银牌获团体冠军;1990年第31届IMO,单先生任中国队领队兼主教练,我国又以5金1银的成绩夺冠。第31届IMO组委会主席,武汉大学校长齐民友教授说得好:“试题那样难,但我国学生能取得这样出色的成绩绝非偶然,这与单士尊等训练教师倾注的心血是息息相关的。”单士尊为此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啊!每次参赛前的集训,他总是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奔波忙碌。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广西、陕西、江苏、山东、安徽、浙江、福建等十几个省市,培训教师,选拔组队,集训教学,多少年来,他没有一个寒暑假不是在劳碌中度过。教学中,他因材施教,针对集训队员的相对水平较高这一实际情况,上课时采用讨论式的方法,师生共同解题。他先听同学们讲述各自的解题方法,然后再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评析,这样有益于培养同学们的创造性思维。在他的指导下,同学们从参加预选到最后决赛要练1000题,题目面广,深浅相宜,这就使他们参赛时胸有成竹了,他担任领队时,注意发挥集训队教师的活力,为使集训工作有后劲,他在科大等学校挑选了一些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担任教练。并对他们说:“有人讲教师是蜡烛,牺牲自己才能照亮别人。我不这么认为。教师应是灯,照亮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不断充电,师生同时充实受益才是教学工作的真谛。”

1988年下半年,他的妻子遭车祸骨裂,为照顾家庭,他于1989年2月调回南京,当时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都跟他联系过,他选择了南京师范大学,因为他认为自己跟师范有感情。从此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里出现了单士尊忙碌的身影。他花费精力搞IMO的同时一直没有放松自己的科研、教学,教研方面他曾获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南京师范大学科研一等奖。这位“传道授业解惑”近30年的老教师,对教学仍一丝不苟,他的备课分为两种要求,一是短期备课,对教程作充分准备;二是长期备课,对所教业务不断钻研,根深叶茂。厚积薄发,上要时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担任数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给学生以无私的爱和悉心的指导。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王巧林曾这样说道:“单教师给我的影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的。单先生是我至今为止碰到的最聪明的人,每有疑问向他请教,他回答我的问题速度之快,使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天才。单先生反对条条框框束缚人才的发展,对我总是给以启发,引导而不限制,他总是鼓舞我要有创见。单先生的品行非常好,我要像他那样不追求名利,只有这样才能做事,做好事,做好学问。”单士尊不但关心青年数学工作者的成长,而且关心少年的成长,1990年他应聘担任《小学数学报》编委,对如何办好报纸、组织好小学生数学竞赛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有人曾不无惋惜地对他说:“你在专业上成果累累,如果你把普及与奥赛上花费的精力,时间也用在专业研究上,成就会更大的,”他说:“前辈华罗庚告诫我们要甘当人梯”,我不想去争什么,只想踏踏实实地点事。”单士尊以其默默耕耘的作风,优异的工作成就,赢得国内外的一致肯定。1990年、1992年,他受到了国家教委、中国科协的表彰,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向他颁布了荣誉证书,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享有国家特殊津贴。

入京出席十四大,回宁继续图改革

1992年6月,单士尊当选为江苏省出席中共十四大的代表。这位解过无数数学题的教授,又以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党代表这个新问题。十四大上,江泽民总书记作的报告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他认为报告中所提的计划是宏伟的,同时又是留有余地的,这个报告是民主的、朴实的。他参加了热烈的大会讨论,他永远也难忘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回到南京后,他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将大会精神向南京师范大学师生作了传达。作为一名教师,他决心带头将教学科研搞好,眼下他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省的科研项目,为完成这些项目他做着努力。作为系主任,他要为全系师生多干实事,把十四大的精神落到实处,他鼓励系里开办的星期天数学辅导班、奥林匹克训练班继续办下去,而今正在受国家教委委托承办理科试验班,旨在为师范院校探索、研究高智学生智力发展规律提供试验基地,深入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单士尊总是忙个不停,他的事是一件接着一件,每一件事都留下一个踏实的脚印,正是这样的脚印凝成了他的成功之路。同时这也将伴着他走向更远的明天。

(责任编辑 霁 明)

● 王可权 寿魁成

记 图书馆学家、

目录学家

李小缘教授



文部主任,并成为美国图书馆协会终身会员。当时,美国国会图书馆曾有意留他在美工作。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就在国会图书馆留言簿上题词:“与其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表达了他对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和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愿望。

李小缘,原名国栋。我国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和历史学教授。1897年2月9日出生于南京汉西门城湾街。其父李公白楼与人合伙开设旱烟铺,育三子,期望子早成大器,以建国之栋、立国之梁、治国之鼎,为三子取名国栋、国梁、国鼎。国栋幼年家境贫寒,6岁入私塾,12岁转读金陵中学附小,毕业后升金陵中学。辛亥革命后,张勋复辟之际,他在校率先剪发,以示反抗。1915年考入金陵大学,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由于所进中学、大学,皆教会所办,重英文,他为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寒暑假期间均在家补习国文。在校期间,以工读方式服务于本校图书馆。当时,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风雨飘摇之中,内有军阀混战、割据,外有列强宰割、侵略,有志青年纷纷探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之路,年轻的小缘先生认为:“图书馆乃文化之渊藪,民智之源泉。”192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文理科,获学士学位,经美籍教师克乃文介绍,任金陵大学图书馆管理员,迈出了他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奋斗一生的决定性一步。

为探求知识,实现理想,1921年夏,他自费出国留学,先后在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读,分别获图书馆学学士和社会教育学硕士学位。在美求学期间,他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汉

1925年4月,他学成归国,就任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图书馆西籍部主任、教授,并参加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筹备会,为美国图书馆学家鲍士伟博士(DY. Authur E. Bosituick)演说作翻译。是年6月,他代表江苏省和南京市图书馆界赴北平出席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协会董事长、执行委员、执行部副部长、编目委员会主任等职,亲自擘划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份全国性图书馆学刊物《图书馆学季刊》。1928年受聘为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同年秋,他在金大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图书馆学系,首任系主任,使图书馆学在我国首次以独立学科的姿态,并列于众学科之林。与此同时,他高瞻远瞩地对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大学到小学,从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到医院、军队的各级图书馆,系统地一一作出详细规划,撰写了《中国图书馆计划书》,全书阐述了各系统各级图书馆的办馆宗旨、目的、要求、机构设置、经费、设备、建筑规模、服务范围、职责和人员素质。他在“缘起”中提到“国人皆能识字读书,享受图书馆之利益,则方可谓图书馆之真革命……乃中国教育界之幸,国民之幸!”据此,一年后在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了“筹设中央图书馆”的议案,此乃中央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的前身)之来由。在此前后,他还写有《藏书楼与公共图

书馆》、《公共图书馆之组织》、《图书馆学》、《民众图书馆学》、《图书馆建筑》、《中类书研究》、《目录学》等近20篇颇具创见的论著,而《中国图书馆计划书》以及以后写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是我国图书馆学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他在图书馆学方面的代表作。

1929年1月,他受委托筹备并主持了在金陵大学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届年会。同年5月他受聘东北大学图书馆馆长,次年重回金大。1930年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教授,1939年任该所所长兼史学部主任。在任期内,他主编的《金陵学报》、《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丛刊》以及抗战时期在成都与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文化所联合负责编辑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等,在国内外学术界,颇具影响。

在目录学研究方面,他造诣尤深。在这一时期前后,他所编制的各类中外文书目达30余种,累积卡片十余万张,所编的地方书目、边疆书目,中外关系书目,如《西人论华书目》、《西人论中国边疆书目》、《汉籍西译书目》和《中法印支关系史书目》等,具有明显的思想性和目的性,为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服务。如他在三十年代编印完成的《云南书目》收录题材极广。内容有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教

育、经济、民族、边务、军务、物产、地质、动植物以及各代的艺文、各县的详细地图,无所不包。史料之丰富,不仅有我国古今论著,文种有英、法、日、德、意、荷、西班牙等,是我国现代目录学的代表作之一。

1948年秋,小缘先生复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古文物陈列委员会主任。全国解放后,任命为南京市人民政府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南京市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7年参加九三学社。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执掌馆务。1956年,受命原高等教育部,参与筹备召开全国第一次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协助起草会议文件,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试行条例》(草案),这些会议文件和工作试行条例的形成,对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1959年12月26日,李小缘教授在南京与世长辞,终年63岁。

小缘先生是我国最早向西方学习图书馆学的爱国知识分子之一,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全力投入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奠基人之一。

《金陵胜迹大全》一书出版

《金陵胜迹大全》由南京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弘扬南京文化、提供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和服务于新兴的旅游事业为目的,以能与载誉世界的南京知名度相匹配的高水准为目标,以学术性、资料性和工具书性质的三性兼备、雅俗共赏为要求,组成蒋赞初教授等人参加的编委会,由季士家、韩品峥、王能伟为主编。

该书是截止目前介绍南京风景名胜最全的一本书。全书分综述、文物古迹、园林苑囿、风景名胜、寺庙道观五编,加附录共六个部分,计252篇文章,60万字,介绍了南京的地质风貌、成城原因、建都史略、域名沿革、文物古迹、大小园林、山水景致、寺庙教堂,以及南

京的著名土特产等。

该书各个条目的表述具有相对的权威性。本书作者共有58人,分别来自在宁15个学科的学者、专家,因此,保证了各个条目的表述具有准确性。在撰稿过程中,还不断地增添条目。如民俗博物馆、傅抱石纪念馆、林散之纪念馆、国防园以及刚发现的汤山古猿人头盖骨化石等均有专条介绍。特别是在叙事中注重考证,广征博引,对重要证据性的资料均指明出处。

本书有原市长、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耀华、现任市长王荣炳作序,著名书法家武中奇题签。

(计晗珏)

裕仁天皇

与“七七事变”

● 北京 王俯民

(一)

“七七事变”之名,是由日本当局而来,他们把整个侵华战争,统称之为“中国事变”,“七七”之前,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又叫“华北事变”。其目的是用以掩盖其侵略本质。

裕仁的侵华谋略,是想在侵占我东三省后,以外交手段割去华北,建立第二个伪满,再进而诱迫南京政府,向日本屈服,达到其征服中国的目的,然后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美、英和苏联,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如果外交手段失败,他就以尽量少的兵力,于华北进行局部战争,击败中央军,恐吓蒋介石,迫其屈服,以此达到“征服中国”之目的。“七七事变”,即是为采取战争手段而制造的事件。

裕仁要“征服中国”,是要以中国为其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据地,供应其大量人力、物力。这个政策,是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早已制定好的,至裕仁当政后,更有《田中奏折》为其侵略战争计划的蓝本,综归之为:

“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先征服中国”。

这个侵略的战略和战略方针,以后在其对外侵略作战中,逐步得到实行,毫不走样,所不同的,只是一败涂地,未达到目的罢了。

(二)

裕仁侵占我东三省后,继占热河,又一度出兵长城,攻入我滦东地区,威逼蒋介石,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议》,以控制华北。此间,裕仁于1933年3月,派土肥原贤二(他的“十一人俱乐部”成员)到华北与中国当地实权人物接触,欲说服他们建立华北伪政权,脱离南京。^①同时又于1935年10月7日发表广田三原则,要中国承认伪满及华北和伪满的密切关系,更要中国排除与英、美的关系,完全依赖日本(实际上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以及共同防共(防苏)等。这一切,当然都是裕仁的一厢情愿,中国政府既不承认“华北自治”,也未接受广田三原则,

使裕仁的外交手段完全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裕仁最后决定使用武力,在华北进行局部而速决的恐吓战。

“事实上,日本天皇裕仁,早在1935年初,就指令参谋本部策划这场战争。”^②

这个具体计划的大要是:

“对华北方面作战:在京津方面,以第七军占领北京、天津及其附近要域;在山东方面,以第八军自山东半岛、海州附近登陆,占领青岛、济南、海州及其附近要域。”^③

其总的作战方针是:“期待不用十分的兵力,击灭中国武力,以占领必要的中国要域,给中国方面以痛苦,迫使中国屈服……”^④

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对此方针则有更全面详细的归纳:

“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手段,使中国本部入我支配之下,然后以日满华三国为基础,实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武力对苏联的陆上和英、美的海上武力,确保我东亚联盟地区,进而采用迫敌屈服的方案,以达战争的胜利。……”^⑤

于此方针指导之下,裕仁便于1936年3月审核了作战计划。“该计划非常周密,甚至包括了如何在马可波罗桥寻衅的描写。”^⑥3月9日,裕仁拟准了一份新的国防计划草案。该草案分四个部分,是由国防机构的许多部门合作起草的。……至于详细行动计划,惟天皇及参谋本部的极少数官员才能窥其全貌。该草案有一章节是1936年3月初制定的。规定在北京附近举行夜间演习的一项计划。该计划实施时,可以挑起同中国的全面战争;十六个月后,这个计划就付诸实施了。”^⑦

(三)

华北作战计划定好以后,裕仁便开始准备实施。1936年5月,向华北增兵三千名。6月3日,裕仁正式裁可以上作战计划,即:

“6月3日,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由裕仁裁可”。^⑧裕仁的裁可,是决策性的,而决不是形式性的,关

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生动的故事,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是在1933年4月的事。

这年4月27日,东久弥宫殿下在出游的汽车上,对原田熊雄和近卫文亲口说:

“不久前,参谋次长特来访我。他对我说:‘近来陛下对参谋本部的上奏,不予裁可。……愿殿下能够影响陛下,对参谋本部的上奏予以采纳’。我对他回答说:‘这个事,即使是次长的命令,我也不能服从。这不是我的责任,干预陛下的奏章处理,首先就紊乱官纪,破坏军律。陛下对总理大臣和各大臣的上奏,均系综观全局进行判断,而后下达可否。……’参谋次长听罢我的回答作色曰:‘殿下说违背自己的职责,要知道,殿下系作为皇族任职,不同于一般的官吏’。说罢,愤愤而去。如此以来,我们的关系就恶化了。”

⑨

这个故事,是皇族东久弥宫亲口所言,它充分地反映出,裕仁天皇在日本国的军事政治行动中,是实权在握,没有他的批准,谁也无法调动军队,为此,逼得参谋次长,也去走部下的后门(东久弥宫于参谋本部任职,为次长真崎甚三郎之部下)。既然裕仁的裁可可是决策性质的,那当然是裕仁亲自批准了,卢沟桥的军事挑衅,和此后的华北作战。因此“卢沟桥事变”到日军发动华北作战,均由裕仁直接审批,由参谋本部直接指挥,完全不是什么陆军中的“下克上”和当地军人“独断”的结果。

在裕仁和参谋本部指挥下,日本陆军迅速部署对华作战步骤:1937年1月,日本陆军逼迫广田内阁总辞职。2月2日,林内阁成立,放弃“华北自治”政策,不数月,林内阁因仍不合军部心意,也不合裕仁心意,亦复辞职。6月4日,近卫内阁成立,近卫积极配合裕仁的武装侵华行动。

6月8日至6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积极研究中国对日关系和抗日状况。同时,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又派作战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到卢沟桥地区“视察”。冈本回到东京后,向本部报告情况时,特指出:“事实上,中国驻屯军在行动和心理上都表现出对中国军队的仇恨在日益深刻化,并决心对中国方面对应处置。”¹¹当时,在卢沟桥畔,日军咄咄逼人,火药味极浓,已完全是一触即发之势。

7月1日,裕仁召见汤浅内大臣,对他说:“华北问题之中央化,已是必然结局,若然,宁可先打。你对

中国的看法如何?”

汤浅则回答说:“中国从来是口是心非,并且侮日……。”⁽¹¹⁾

7月2日,裕仁又召见参谋总长闲院宫和陆军大臣杉山元,并与此二人共同进餐,饭后二人“奉旨”而出。

7月6日,裕仁的兄长秩父宫,自英国伦敦打给裕仁一密电曰:“干吧!”

7月7日晚,终于爆发了由日军挑衅引起的卢沟桥事件。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七七事变”。

(四)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于9日上午召开重大临时内阁会议,同日11时,又召开五相会议,会议中,陆相杉山元主张向我华北增派兵力三个师团。参谋本部作战课,则于8日已制定好作战方案,拟将战事限制在平、津地区。⁽¹²⁾最后拟定《卢沟桥事件处理方针》四项,作为对外公开的表态。此四项为:

“一,中国军队自卢沟桥撤至永定河左岸;二,保障事态不扩大;三,惩处直接责任者;四,中国方面向日本方面谢罪。”⁽¹³⁾

7月10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内定,向我华北增兵三个师团。中国政府亦于同日命令四个师自石家庄附近,北上抗日,同时命令空军出动。11日,日本政府又召开五相会议和内阁紧急会议。议决动员日军五个师团,先派三个师团到我华北作战。⁽¹⁴⁾同日,日本军部下达临参命第56号令,调关东军和速成之第二十师团抵华北集中。并令香月清司为代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于12日到达华北“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准备对华作战。¹⁵

同日,又拟定好《关于华北作战之陆海军协定》主要内容是将作战限定在平津地区,在天津地区,海军协助陆军作战;输送和护卫陆军;必要时,在青岛、上海陆、海军协同作战,保卫侨民。¹⁶

同日午后6时25分,日本政府发表出兵华北声明,把责任完全推到中国方面。

与此同时,裕仁天皇批准以上军事计划和增兵三个师之决定。即:“仰上奏裁可”。¹⁷

在一切军事行动都已准备好以后,日方又于7月13日,提出解决争端的七个条件,要中国政府承认,否则就大开战端。此七条件是:

“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

三,撤走在冀察排日的各中央机关;四,撤走排日团体蓝衣社、CC等;五,取缔排日言论和机关、学生、民众的排日策动;六,取缔学校、军队中之排日教育;七,北平城内不得驻军,由公安部队负责警备。¹⁸

这七条,中国政府当然不能接受,这是裕仁和日本政府与军部,深深知道的。同日,日本军部又制定《华北事变处理方针》,主要规定:“如果中国方面无视前项条件(七条件)和无实行诚意,或者中央军继续北上,企图攻击日军,帝国则断然出兵”。¹⁹

这就是说,在中国土地上,不许中国出兵抗击侵略者;中国的北平城,不许驻中国军队;并以此为条件,要中国答应,如不答应,就发动战争,这叫什么“不扩大主义”或“不扩大方针”?

以上这个处理方针,“闲院宫参谋总长、杉山陆军大臣、今井参谋次长协议上奏后发电”,⁽²⁰⁾这就是说,这个对华北开战方针,是经过裕仁自己亲自裁可和批准的。所以裕仁不但指导制造“七七事件”,而且进一步批准日军对我华北的侵略战争;铁证如山,是抵赖不得的。

在裕仁裁可后,日军迅速发动对华战争。7月15日,“中国驻屯军”(日军),拟定了《作战计划》。此计划共为三项,将作战分为两期:第一期:“首先于北平郊外永定河以西扫荡第二十九军。”第二期:“根据情况,以现地兵力,向保定、仁邱之线增兵,进出石家庄、德县之线,准备与中央军作战。”⁽²¹⁾

至7月16日,日本军部令“中国驻屯军”以7月19日为开战期限,即要中国政府于19日以前(含19日)答应以上七条件,否则,即行开战。⁽²²⁾

18日,参谋本部又制定作战要旨四项,其中规定“准备转向对华全面作战”,但“对华中、华南仍极力避免使用兵力”。⁽²³⁾

7月19日,蒋介石庐山谈话公开发表,坚决拒绝七条款,公开表示决心抗战。

7月20日,日本内阁议决对华作战。26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海军)联合下达临命第418、419号令,令中国驻屯军准备对华作战。

27日,日参谋本部下达临参命第64号令,命令立即对华作战。此令曰:

“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除完成现任务外,于平津地方对中国军队进行膺惩,并安定各要地“秩序”。⁽²⁴⁾

此令也经过裕仁批准,其记载曰:

“将此次作战动员和战争部署,上奏天皇之时,天皇询问了未来平津作战的结局”。这是日本侵华军之华北作战的正式发动,惟因日本侨民避难问题,迟了一天,延至28日向我北平发动突然攻击,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于此役壮烈殉国。

8月15日,日本对华宣战。⁽²⁵⁾9月4日,裕仁天皇向日本议会颁布敕语,认可日本内阁之对华宣战,全面侵华战争正式爆发。

其此次战争之目的,用裕仁的黑话说,就是:“促使中华民国政府反省,征服中华民族”。⁽²⁶⁾

这就是裕仁制造“七七事变”的真正目的与用意。但裕仁却谎称“七七事变”纯系偶然事件,以掩其丑。⁽²⁷⁾

裕仁天皇,不但于侵华战争中负有罪责,而且是发动侵华战争之元凶。

笔之于此,不禁想到日本政府至今尚未认罪之事,令人愤慨万分,亦令人深思。日本政府既不认罪,只以“道歉”、“添麻烦”轻描淡写而过,能够真的改恶从善吗?值得世人深思。

(责任编辑 宁 宁)

注:①②③⑦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1971年纽约英文版。

③④⑤⑧L(12)-(26)《大本营陆军部》1974年东京日文版。

⑨原田熊雄《原田日记》1951年东京日文版。

(11)《木户幸一日记》1966年东京日文版。

(27)《昭和天皇的独白》

补 正

本刊今年第一、二期合刊登载的《杨家骆及其南京辞典馆》一文,关于杨家骆的生年及学历有误。现接到南京气象学院教授陈家溶先生转来杨家骆胞弟、沈阳农业大学教授杨家驹先生的来信,指出杨家骆生于1912年(民国元年农历正月初四),1991年10月6日于台北逝世,享年80岁(虚岁)。信中还说:“家兄在世时,并未在东大附中及国学专修馆读过书,他仅在朝天宫山上‘三高’读过半学期,毫无学历。所以平生完全是自学成材,无同学关系,忘年交特多;一生勤奋治学,绝少虚度时光;社交活动亦多联系个人事业。是我辈兄弟中成就最足称者。”特此补正,并向杨家驹先生、陈家溶先生深致谢意。

编辑部

(总 179) 23

“四一二”政变前夕

蒋介石的南京之行

● 南京大学博士生 刘才赋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夕,于9日离沪赴宁。长期以来,史学界和一般关于现代史的著述都把蒋此次南京之行说成是“政变部署完成,到南京幕后操纵”。笔者不否认蒋此行有从前台退处幕后、以为政变不成预留转寰余地之可能,但念实上,蒋此时离沪赴宁,却另有更重要的原因。

南京于3月23日被江右军攻克后,形势的发展,对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来说,非常严峻。

一方面,被击溃逃往江北的北洋军阀,不甘心失败,他们集结援军,整顿败军,由津浦路大举南下,从外部威胁南京。

另一方面,令蒋介石、国民党右派更为惊心的是北伐军内部的“生变”、中国共产党在南京势力的迅速发展。江右军总指挥兼第六军军长程潜在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日益倾向武汉国民政府,疏远蒋介石。蒋为让其嫡系部队控制南京,电令二、六军北渡过江,程部向时在武汉的总指挥请示,程回电“不许渡江”。新组的江苏省政务委员会,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根据共产党员吴玉章、林祖涵之提议决定发表的,十一个委员中,李富春、侯绍裘、张曙时、李隆建、江董琴、顾顺章等六人都是共产党员,柳亚子、程潜倾向左派,国民党右派分子只有何应钦、鲁涤平、钮永建,但三人或不在南京,或羁于军务,不克过问政务,因此事实上,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全部掌握在革命人士手中。

3月30日,武汉中政会又应李富春之请,决议查办国民党右派把持之南京市党部。31日,共产党人张曙时、侯绍裘主持的江苏省党部由沪迁宁,并在党务、政治方面迅速展开工作,一时,我党在南京的声势大振。国民党右派惊呼,南京“处在黑与赤的双重威胁之下”,形势千钧一发。

显然,蒋介石在此时匆匆赴宁,“形势紧急”是一

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来自武汉的压力,蒋介石到上海以后,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密谋策划,发动政变,逐渐显露出其背叛革命的嘴脸。有鉴于此,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再要求蒋迅速离开上海,北上主持军事。4月2日,武汉中常会扩大会议作出决议要蒋介石克日离沪赴宁,专任军事。武汉方面认为,上海的环境,是设法子使蒋能革命的,只有让他“离开上海反革命的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向反革命;如他真能接受中央训令,离开上海,而是最好了”。^①

4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得到武汉方面的决议,这些正与蒋介石反动分子在上海斗争的同志也认为武汉的办法是“很对”的,提出,“现在就要看老蒋是否服从,如不服从则目前斗争将更紧迫”。^②换言之,如蒋服从了决议离沪赴宁,他们就认为上海的左右斗争将会有所缓和。

面对拭目以待的上海左派力量,为确保数日后的政变顺利进行,蒋不得不暂时低一低头,遵令赴宁。蒋4月5日得到命令,6日上午9时30分,他先派王柏龄专车赴宁;20分钟后,第一师开拔赴宁;当晚,21师师长严重专车返苏,预备军队开赴南京。^③

同日,郭泰祺由宁返沪,向蒋报告南京的紧急情况。于是,7日上午,蒋即下令将总司令部迁至南京,定各部长官人员下午4时出发。“嗣因蒋总司令尚有要事,须待解决”,乃改定8日下午起程,便“飭令路局预备专车,以便随时应命”。^④

7日下午,武汉方面就沪宁左右力量斗争的危紧局势在鲍罗廷私寓召集紧急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至南京,并下令武汉军事委员会准备“以南京为中心之作战计划”。^⑤至此,蒋即使不考虑南京的形势,只为与武汉方面争经营南京之先机,他也必得马上动身,先行赴宁布置。8日下午蒋正准备

江浙财阀

与蒋介石的恩怨

● 江苏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陆仰渊

所谓江浙财阀,是指一批江苏籍和浙江籍的人,在上海发了财,自己开了银行、轮船公司、各种工厂和商行,左右着江浙沪甚至全国的经济。其中的浙江宁波——绍兴帮,主要经营金融业与航运业;江苏的无锡——常州帮,主要经营棉纺、面粉、缫丝等业。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蒋介石和宋子文,蒋是浙江宁波奉化人,宋是上海人,他们与江浙资本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曾经得到过江浙财阀的支持。但蒋恩将仇报,当他一旦稳固了权力后,又反过来压迫他们。宋子文是斡旋于两者之间,因而他当了财政部长。江浙财阀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恩怨,都是以互相间的利益为转移的,蒋宋起了重要的作用。

江浙财阀起源于鸦片战争后,上海租界内一批充当我国洋行的买办,早期的如常州人盛宣怀,无锡人周舜卿,宁波人叶澄衷、严信厚等人。到二十年代,已

是江浙财阀的第二代,其代表人物如浙江宁波帮的虞洽卿、张静江、李铭、钱新之、王一亭、林康侯、叶琢堂、胡祖同、周佩箴等人;江苏常锡帮的陈光甫、张嘉璈、唐寿民、荣宗敬、荣德生等。他们利用北洋时期北京政府的孱弱、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以及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发展了工业、金融业、航运业和商业等。到1927年前后,上海不仅是西方各国在中国及至远东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最大中心,其经济活动量几乎占中国整个经济活动量的一半以上。江浙财阀在上海的经济实力,仅次于外国列强在华的经济力量,他们是中国民族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浙财阀在发展道路上,首先遇到的对手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经济势力,尤其是西方列强控制着中国的海关,以极低的关税向中国境内倾销洋货,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严重的打击。因而他们迫切需要得到保护和限制外国人在华的不平等经济活

出发,何应钦又由宁到沪,“会商要事,致未果行”。直到晚10时35分,蒋始由龙华乘车,11时40分至北站,9日零时40分前往南京,“濒行,有密令一通,送至闸北天通庵路徐家花园26军长周凤岐处,指挥一切”。^⑧

9日上午8时,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所辖停泊高昌庙江边码头之海军决川炮舰、超武兵轮奉蒋令同时赴宁^⑨。不难看出,蒋到南京,是上“前线”,不是躲到“后方”。

而且,于蒋赴宁的同时,张静江赴浙指挥浙江清党,李洛琛、黄绍 赴粤导演了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件。显然,上海清党不是孤立的,蒋的布置是沪、宁、杭、粤同时进行,下的命令是“已克复各省一律实行清党”。只不过上海是策划中心,策划好了,即须分头进行,蒋之赴宁是清党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蒋介石一到南京,南京的局势突变。

9日下午不到一点,国民党右派、反动的南京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劳工会流氓,即手持木棍、铁棒、手枪,在街头殴打共产党人、进步分子,包围、冲击共产党人主持的省、市两党部、总工会,捕去著名共产党人省党部农民部长戴盆天、商民部长黄竞西、宣传部秘书高尔柏、总政治部特派员吴琪等革命人士数十人。^⑩愤怒的工人群众齐到总司令部请愿,要求蒋介石下令保护省、市党部、南京总工会,封闭劳工会,蒋拒不旨行。

10日,“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将9日请愿群众的要求作为会议决议,由群众再到总司令部请愿。蒋介石竟派军警配合劳工会流氓,对群众大打出手,酿成流血惨剧。

10日夜间,在宁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在大纱帽巷

10号王宅开会,反动军警前往搜捕,侯绍裘、文化震、动。当1926年国共合作的广东国民政府提出打倒列强在华势力,推翻军阀统治的口号,组织军事北伐时,得到了江浙财阀的欢迎与支持。当北伐军攻占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和南京后,形势有了变化。在激动人心的革命潮流中,广大工农起来了,工人在城市中建立了武装纠察队,协助北伐军的军事行动;农民在农村中组织赤卫队,打击地主豪绅的势力。一些工农的过激行动,直接触犯了上层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动摇,进而转到害怕和反对,已经在政治上取得一些地位的江浙财阀,尤其感到害怕。当1927年3月21日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进占上海时,上海的工人已经在中共的领导下,组织了15万人的武装纠察队,发动了三次起义,控制了上海的局势。上海的资本家面对形势,已经处于动摇的十字路口;他们害怕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15万工人纠察队,不仅控制了他们的工厂企业,甚至在左右着上海政治形势的发展。而蒋介石呢?不但害怕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纠察队会直接控制着上海的形势,更害怕共产党还要直接控制广大农村和其他城市,直至军队都倒向共产党。于是蒋介石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后,就和江浙财阀想到一起去了,做着异床同梦。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从九江到达上海,住在龙华交涉署内,当天就召见了江浙资本家代表人物虞洽卿和张静江等人,双方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蒋介石向他们表示:“保证与租界

谢先进、钟天樾等十余人不幸被捕。四一〇反革命事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并答应虞洽卿提出的要求,一旦恢复“和平秩序”,“迅即调整劳资关系”。3月2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召开会议,听取了虞洽卿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的报告后,甚为满意。3月30日,蒋介石再次接见了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提出了上海商业联合会出资“援助”的要求。商联会代表表示,只要蒋介石决心和共产党决裂,就立即给予经济援助。谈判结果,上海商业联合会于4月1日至4日间,先提供短期借款300万元。这样,江浙财阀第一次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作了财力上的准备。

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并不完全信赖他的军队,而是求助于与江浙财阀有一定联系的上海社会帮会组织青帮和红帮。蒋介石派他的亲信,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与青帮头子杜月笙秘密联系,扶持杜在上海建立了“中华共进会”,作为对付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急先锋。蒋介石布置妥当后,离开上海赴南京筹备另立国民政府。4月11日,蒋在南京发出“已克服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分子,臂缠黑白布上书“工”字袖章,冒充工人纠察队,向南市、闸北、沪西、虹口、吴淞等地的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公然出面武装干涉,收缴了3000多工人纠察队的武器。上海工人倒在血泊之中,300多人被枪杀,数千人被捕,上海总工会被封闭。江浙财阀的头面人物拍手称快,蒋介石

件使南京先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蒋介石的赴宁对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有很大影响。

其一,在当时左右斗争剑拔弩张、蒋的行止成为双方注目焦点之一的情况下,蒋介石表面遵从武汉政府的指示,离沪赴宁,客观上起到了麻痹在沪革命党人的作用,掩护了蒋的政变。

其二,在其时的左右斗争中,沪、宁、杭三点一线,是联成一体。特别沪宁密迹、此牵彼动,休戚相关。正如上海区委的同志所分析的,斯时蒋介石同革命阵营斗争的关键,在沪、宁两地;在上海,蒋主要是想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在南京,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左派军队”。^⑥如果南京为左派控制,成为革命的堡垒,那蒋介石即使在上海政变成功,也会因孤处

中间,受到威胁,成而复败。左派力量朦胧意识到了这一点,加紧在南京的工作;蒋介石也因情势的逼迫,而及时地离沪赴宁,用台湾历史家的说法,蒋此行系“救党救国”、“扭转乾坤”之举。话虽过分,某种程度上却透视出蒋介石此次南京之行的“重要”。

(责任编辑 淑玉)

注:资料引自

①《国民党执委会常务委员会第51次会议速记录》。

②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

③④⑥⑦《申报》。

⑤《武汉中政会临时紧急会议记录》。

⑧《刘少猷上武汉关于南京党务纠纷始末报告书》、《张曙时上武汉中央关于南京纠纷及脱险报告

书》。

乐呵呵地在南京另立了国民政府。4月25日,蒋介石又在江浙财阀手中拿到了第二笔700万块银元的“贷款”。这笔钱对蒋介石来说实在太需要了,他急需要用于搜捕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和对付武汉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内的其他反对派。蒋介石和江浙财阀间的蜜月达到了高潮。但好景不长,这股高潮很快就退落下去,投下了一层深深的阴影。异床的梦再做下去就各有打算了,蒋介石发动政变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江浙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为实现他独裁中国的美梦。蒋介石在举起右手杀灭工农和共产党人的同时,又举起了左手打击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和其他各派政治、军事力量;他扩充军队,每月需要花去2000万元的经费,哪儿去筹?真像热锅里的蚂蚁,心急如焚。于是他向上海的资本家提出了更多出钱要求。上海资本家着慌了。4月初,担任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来到上海,蒋介石满以为宋的到来可以帮助他。但宋子文一到上海就和江浙财阀们广泛接触,并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广泛吸收上海金融界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组成了有关发行债券、国家预算和协调银行及工商业的三个顾问委员会。当蒋介石要求上海资本家向国民政府支付现款时,宋子文拒绝了签字。于是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蒋立即改变了主意,不再任命宋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任命古应芬担任财政部长,甚至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宋子文被迫去了日本。蒋宋间的矛盾表面化,表明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江浙财阀间矛盾的表面化。

蒋介石要江浙财阀拿出更多的钱,逐渐由协商到强迫,又由强迫转向勒索,当年西方记者索科斯基曾在《大公报》上这样写道:“各种迫害方式都在搜捕共产党的藉口下使用出来,许多人被绑架并被迫献出大量的军事贷款,……这种反共的恐怖手段,使上海和江苏人民感到为近代绝无仅有的恐惧”。1927年4月下旬,蒋介石向当时任招商局董事、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傅筱庵提出借贷1000万元的要求,遭到傅的拒绝后,蒋则以傅曾为军阀筹过款为借口,要逮捕他,并没收他的财产。傅逃往大连,通过他人斡旋,最后被迫捐了一笔巨款才算了事。但蒋介石仍以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的名义,宣布傅筱庵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一职无效,另任虞洽卿为会

长,以图打击一个,拉拢一个。5月14日,法租界内颜料商石宝顺的儿子因“反革命”罪被捕,在答应捐款20万元以后才获释。接着又以“资助过军阀”为名,逮捕了江苏大工业家荣宗敬,并下令没收荣家在无锡的面粉工厂,在荣家捐款20万元后,人才获释。5月16日,酒商赵志永被上海军事当局逮捕,后来捐了20万元才放人。先施公司经理欧炳光的三岁儿子被绑架,捐款50万元才了事。棉纺厂主徐宝真的儿子被以“共产党员”的罪名逮捕,勒索了67万元。当时一个澳大利亚的观察家查普曼在报纸上写道:“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或在马路上神秘地失踪,……大富翁竟当作共产党员遭到逮捕”。他又说:“估计蒋利用这种手段共筹集到50万美元”。看来这50万美元蒋介石仍非常不够用的,运用这种恐怖手段,主要目的是恐吓江浙的资本家,要他们乖乖地听命。

蒋介石对江浙财阀的另一种搜括手段是强迫他们购买巨额公债。1927年5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3000万元短期公债,月息7厘,30个月内还清,以上海江海关百分之二、五附加税作担保,其面值由10元至1万元不等。5月中旬,蒋介石亲自到上海,强令上海资本家购买。美国人小科布尔在《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这本书中这样写道:“政府办事人员逐店逐厂去征集资金,例如上海银行公会会员银行,被指定购买165万元江海关二五附加国库券;闸北水电公司被指定25万元;华商保险公司50万元;内地自来水公司25万元;南市电器公司30万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50万元;广东商联会30万元;先施公司25万元;商务印书馆20万元;永安公司25万元;新新公司25万元;华成烟草公司10万元;丝茧公司10万元;”至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江浙财阀之间的紧张关系可想而知了。但蒋介石也尝到了苦果。

南京和武汉政府的分裂,工农运动受到镇压,加上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等一系列因素,削弱了北伐军的力量,使得北洋军阀势力得以重整旗鼓,孙传芳的直鲁联军在徐州一线击败了蒋介石的主力,直逼南京城下。1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辞去一切要职,宣布下野,回到家乡浙江奉化。9月,蒋介石去了日本;10月,在日本神户谒见了宋美龄的母亲,缔下了与宋美龄的婚约。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蒋宋联姻被称作是一场“政治

婚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表示了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复出，当即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蒋想通过宋子文在江浙财阀中的特殊关系，谋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的头半年，基本上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敛财方针，继续软硬兼施对上海资本家进行敛财。宋子文知道，武汉政权的垮台、南京政府的危机，主要来自财政上的困难；如果财政问题不解决，北伐就难以胜利，南京国民政府仍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

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第一件事，召集了一次财政官员会议，商讨筹集北伐经费问题，决定向上海资本家先筹集1500万元。他先向上海的钱庄开刀，要求上海83家钱庄每家至少抽3万元，共抽500万元，限于1929年春节前交割清。结果导致5家钱庄倒闭和26家钱庄支付困难。接着于4月1日又发布出售孙科任上尚未售出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4000万元，后又加发1600万元。蒋介石还亲自打电话给上海资本家，要他们在购买国库券中“全力予以合作”。宋子文也指示上海总商会、闸北商会和路商界联合会，要他们帮助推销公债；要求工厂主、商人、银行界须认购相当于全体员工一个月工资总数的国库券，或是相当于这个企业一个租金数额的国库券，职员与工人也要捐献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如此摊派，已经到了近乎勒索的地步。

在摊派不足的时候，再度使用了绑票勒索的手段：如先劝说上海万国体育场和远东公共体育场的两个跑马场各承担捐款50万元。当遭到拒绝后，财政部即命令这两个跑马场需缴纳入场券和赛马彩票的印花税。1月9日，远东体育场董事会主席的兄弟在法租界被绑票，最后以认捐了巨款后才释放。宋子文在1928年前6个月任内，先后为蒋介石筹集了几千万的军费，并使北伐取得了胜利。接着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在财政问题发生了意见相左。

宋子文出身于上海名门望族，父亲宋嘉树曾在美国多年，宋子文曾就读于美国的哈佛大学经济系，还在纽约的银行里担任过职员。宋家因和孙中山的姻亲关系而在国民党内有一定影响。但宋子文在军队里的支持者不多，因而他急切需要寻找支持者，拉拢上海资本家，是他目的之一。

1928年6月，北伐军进占北京，名义上标志着蒋

介石取得了统一。但实际上蒋介石和桂系、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间产生了新的矛盾，加上东北尚未统一，蒋介石难以高枕无忧。而国民党内一些人鉴于财政收入困难，难以支撑局面，极力主张裁军，以减少军费支出，宋子文就是其中一个。宋子文提出了三点理财主张，一是建立国家预决算制度，理顺财政收支；二是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改善政府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三是限制军费。这些措施，很能讨得上海资本家的欢心。但又是蒋介石所不悦的。

宋子文为实现理财主张，于1928年6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在115名参加者中，70多名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一些中国著名的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其中有江浙财阀的头面人物如虞洽卿、荣宗敬、李铭、张家骥、宋汉章、陈光甫、金宗泽、徐新六等。有人认为，这个会议虽名为全国性会议，实际是由江浙财阀所控制。会上宋子文首先对过去政府采用的高压手段表示歉意，号召工商界今后要与“政府合作”。接着他提出了今后财政所谋求的实施方案：限制军费，推行预算制度和裁抑厘金。这次会议是一次咨询性会议，也为江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发泄对政府意见的机会，与会者提了不少提案，要求国民党中央全会加以考虑或认可。会后，虞洽卿等在宋子文授意下还组织了一个“国民裁兵促成会”，通电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裁军会议，要求立即裁军和限制军费。7月，宋子文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官员，宋的目的是想通过会议，把全国的税收统一于财政部之下。但实际上在各地军阀割据的形势下，是行不通的。会议只通过了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会后，宋子文兴冲冲地赶到北京，想在正在召开的全国裁军会议上得到支持。但宋子文的设想遭到了各派的反对，相反还逼他再发行3000万到4000万元的公债。宋子文只得寄希望于国民党五届中央全会。

1928年7月8日，国民党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由上海总商会、南市和闸北商会、上海银行公会以及上海的60个同业公会推举的100名代表，在虞洽卿率领下到南京请愿，要求会议通过宋子文的理财方案。代表还向五中全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声明如果政府不采纳和实现全国经济会议的建议案，上海的工商界将不再筹集贷款。接着上海工商界又扣发了1928年8月的财政垫款，表明了江浙财阀对蒋介石

及其政权的强硬态度。在这一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五中全会才被迫通过了统一财政和采用国家预算制度的提案,并决定成立一个由9人组成的国家预算委员会。至于限制军费问题,直至1929年1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上才作出决议。但这些均为蒋介石所不悦的,不久即采取了对江浙财阀的报复措施。

1929年3月28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上海的江浙财阀很想在这次会议上争得几个席位。但奢望彻底破灭了,相反有人在会上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商会组织的动议,显然,其主要矛头是针对江浙财阀及其主要组织上海总商会的。于是上海的工商界立即行动起来反击。3月23日,上海各地区商会、银行公会、纱厂联合会等组织代表在上海总商会大楼集会,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这一议案。会上推举虞洽卿率代表团到南京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最后,尽管在这次大会上没有通过取消商会这一议案,但蒋介石采取了另一手段,搞垮了上海总商会。

1929年4月,受控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两个下层组织——全国救国会和商民协会,因与上海总商会为会客室的使用问题发生争执,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使下,全国救国会唆使一批人闯进设在公共租界天后宫院内的上海总商会会客室,逼使上海总商会停止办公。4月24日,全国救国会和商民协会在上海总商会的隔壁一所学校内开大会,指使一群暴徒举着声讨上海总商会的标语牌,冲进上海总商会内,殴打了雇员,抢走了文件和财物。上海总商会和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等一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交涉,而国民党《中央日报》竟然载文斥骂上海总商会的某些负责人是“帝国主义走狗”。接着南京国民政府还煞有介事地派了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宣部长叶楚傖率领的一个小组到上海来调查。调查结束后,又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要把上海的各商业团体实行合并,

其目的是搞垮上海总商会。国民党当局还指定由虞洽卿为首组织一个由34人组成的改组委员会,监督各团体的合并事宜,而实际均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所操纵。1929年5月25日,改组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市社会局、工商部等都派人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张群公然在会上说:“上海总商会应当予以改组,因他创立于革命军到达上海前,当时上海的总商会事务被一小撮迎合军阀的人所把持”。工商部代表许建屏也在会上高叫“上海商界曾经饱受总商会的压迫,现在上海的商人应当遵从中央政府的命令,筹组一个统一的新团体”,道破了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对江浙财阀及其主要组织上海总商会不听命的仇恨,定要铲除他的决心。1930年6月21日,新的大上海市商会成立了,原来总商会的代表所占的比重不足三分之一,而受国民党所控制的全国救国会和商民协会的代表却占了多数。南京国民党当局对新成立的商会作了许多限制,规定其必须“服从于当地国民党的指示和命令,并受当地行政机构管辖”,所有会员必须“信仰三民主义”。凡接受“反革命分子帮助的”和曾经“危害过国民党”的人,不得成为该会委员。不久国民党当局又勒令尚未合并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内的路商界联合会停止活动,进行解散。实现了蒋介石对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江浙财阀的控制。

美国学者小科布尔在评论上海总商会被国民党当局吞并改组一事时说:“说明了上海资本家在国民党中国是不能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的。正如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表明,在国民党内占优势的领导者在政策上仍然是反对资本家的,……上海资本家的独立组织已经被迫屈从于国民党的统治了”。

(责任编辑 淑玉)

南京造飞机了

年内生产三架,三年内年产百架以上



这是第一架轻型飞机外壳。

刘小云摄

南京轻型飞机研制厂昨天成立并投产。这是我省唯一将轻型飞机的设计成果转化为产品的专业加工厂。

轻型飞机是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普及的一项高科技产品,在农业、林业、地质测绘摄影、交通运输乃至旅游等许多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北京、上海等省市都在筹备开发轻型飞机。南京轻型飞机研制厂接受北京科源轻型飞机实业有限公司委托,已试制成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计研制的 AD200 型轻型飞机。这是我国第一架达 80 年代国际水平的全封闭式、全复合材料结构,压式气动布局轻型飞机,最远可飞

400 公里,时速 90—100 公里,售价估计在 20 万元(人民币)左右。(陈思平 何玉平)

又讯 由江苏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南京高新技术经济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筹资 4000 万元组建的南京轻型飞机股份有限公司将于最近建成,年内将生产出 3 架 SN—300 型轻型飞机。预计 1994 年生产各类型轻型飞机 27 架,1996 年可达 115 架。这类飞机重仅 120 公斤,飞机上装有安全装置,发生故障时能自动打开降落伞。

(龚学明 彭建华)

(摘自 1993 年 4 月 29 日《扬子晚报》)

* * * * *

* * * * *

(上接 52 页)

杜月笙前后五次婚姻,共生有八子三女,长子杜维藩后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当研究员;次子杜维垣任职台湾驻联合国总部(当时台湾在联合国中有席位);三子杜维屏在巴西开设股票公司;四子杜维新在美国檀香山经商;五子杜维翰和六子杜维宁未离开大陆;七子杜维善在澳大利亚学习矿业,后回台湾在台湾石油公司任重要职务;八子杜维嵩去世较早;大女儿杜美如嫁给国民党一空军军官;杜美霞嫁给金元吉,他是浙江青帮头子金廷荪的儿子;小女儿杜美娟在琉球,嫁给美国国务院派驻琉球的一名华裔美籍官员,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再走杜月笙的老路。1951 年 8 月 16 日,孟杜举行婚礼后不久,杜月笙病死于香港坚尼地杜公馆。

(责任编辑 海 鸣)

南京小姐

珠海折桂

〔本刊综合消息〕从 4 月 18 日起,来自沈阳、西安、武汉、南京等 11 个城市 32 名佳丽,云集珠海,角逐“华夏小姐”桂冠。经过几轮竞赛,南京小姐尤朝晖、陈梦渔、宋岚进入前 10 名。

25 日晚,在珠海影剧院进行最后决赛。21 时 40 分,当司仪宣布:尤朝晖为“华夏小姐”冠军时,聚光灯、闪光灯一齐聚集在这位身披绶带、头戴“美光皇后”的身上,台下响起一片掌声。此时,27 岁的南京小姐尤朝晖,笑容可掬,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并当场接受了中山雄基房地产公司赠送的价值 30 万元的高级住宅一套。南京小姐陈梦渔、宋岚获得“华夏小姐”称号。

刘宋“二铢钱”考

南朝刘宋时期曾先后铸有三种货币。一种是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冬十月始铸的四铢;一种是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正月始铸的孝建四铢;再一种是前废帝永光元年(465年)二月始铸的“二铢钱”。对于前两种钱,因有实物流传,人们并无异议。对于后者,存世只有“三铢”、“四铢”、“五铢”,偏偏不见“二铢”钱。“二铢钱”是种什么钱?自清代以来,钱币学及货币史的研究者曾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至今分歧较大。

南京是六朝故都,对于刘宋货币研究中的这一疑点,南京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者理应担起释疑的责任。1987年,溧水县寺桥出土了一罐刘宋时期的货币,共二斤半重,计有铜钱871枚。(见《江苏溧水县寺桥发现刘宋时期货币》,《中国钱币》1992年3期)使我们有可能结合实物来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对比,并参考古代文献,我认为刘宋的“二铢钱”即是孝建二铢。试论述如下:

一、刘宋“二铢钱”诞生的历史背景

刘宋孝武帝孝建元年铸孝建四铢钱,面文“孝建”,背文“四铢”。三年,由于尚书右丞徐爱的建议“今宜以铜赎刑,随罚为品”。从此以后,“所铸钱形式薄小,轮廓不成就,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溧水寺桥所出的刘宋货币中有四铢钱39枚,平均每枚直径2.18厘米,重2.01克,比较规整。而所出的192枚孝建四铢则大小悬殊很大。有7枚直径2.4厘米,重约2.6克,与标准的四铢钱同,占总数的3.6%。其余均不足重,最小的一枚直径1.5厘米,重0.4克。通过对150枚孝建四铢逐一称量后得出,其平均每枚直径2.05厘米,重1.18克。平均直径与四铢相差不大,而平均重量则大大减少了。钱面大而重量轻,导致“孝建四铢”钱面极薄,很容易破碎。溧水寺桥所出192枚孝建四铢中,破碎者45枚,即是明证。

虽然当时“盗铸者云起”,“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民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但“公私所乏,唯钱而已”。大

明中,一些大臣提出“官藏空虚,宜更改铸,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交弊,赈国纾民”建议铸造二铢钱。虽曾遭到颜竣等人的坚决反对。但到“前废帝继位,铸二铢钱”。

二、目前学术界对“二铢钱”的几种看法

二铢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钱?学术界大体有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刘宋二铢钱是面文为永光、景和的两种小钱。如肖清著《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称“到前废帝永光元年(465年)二月,景和元年(465年)九月,又铸行永光、景和年号的二铢钱”。

第二种,认为除永光、景和外,还要加上面文为“两铢”的小钱。如国家文物局编《中国古钱谱》(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在永光年号下列永光二铢,景和年号下列有景和二铢及“两铢”钱。

第三种,认为刘宋二铢钱包括永光二铢、景和二铢和孝建二铢。如千家驹、郭彦岗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年)在表八中称“正面有‘二铢’二字,背面有‘永光、景和、孝建’三种”。(按“正面有二铢”的钱并不存在)

这三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二铢钱”是指重量为二铢的小钱,并非面文为二铢。

之所以出现如此分歧,是由于刘宋货币发现很少的缘故。罗宗真先生曾说:“南朝墓葬在南京地区发现甚多,且有许多帝王官僚大地主之墓,但墓中出土钱币甚少。我们发现几乎有铜钱随葬的墓葬百分之九十都是五铢钱或剪轮五铢钱,而没有一个墓葬出土过二铢、四铢、六铢或两柱、四柱钱的”。(罗宗真《南朝货币和经济发展》)。而刘宋货币窖藏一共只发现过两批,一批是清道光年间毗陵(今常州)曾出土一窖,尽为吕全孙(字尧仙)所得。(见《吕尧仙中丞孝建四铢拓本》);第二批即是1987年11月溧水寺桥出土的一罐刘宋货币。这两批窖藏材料,前者早已分散于各收藏家手中,缺乏整体的研究。后者出土不久,研究者尚来不及引用。因此许多货币史的著作往往

仅凭借古文献及各钱谱中的左泉拓本来研究刘宋货币,缺乏第一手的感性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识极不一致。

三、刘宋的“二铢钱”应是“孝建”二铢。

刘宋的“二铢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钱?我们有必要将《宋书·颜竣传》中有关二铢钱的段落抄录如下:

“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议者将为官藏空虚,宜更改铸,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交弊,赈国纾民”。

“颜竣曰:今铸二铢,恣行新细,于官无解于乏,而民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靡碎至尽。”

“前废帝继位,铸二铢钱,形式转细”。

在这里的“宜减钱式”、“恣行新细”、“形式转细”告诉我们,新铸的“二铢钱”,它的“钱式”,即钱的外形已与孝建四铢有很大的区别。为了表示这种改变,新铸的新钱不用钱面文字来表示,而改称“二铢钱”。

在整理刘宋货币时,我们发现孝建二铢与孝建四铢钱式不同,它们是不同的两种货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从文字看,孝建四铢,面文“孝建”,背文“四铢”。而孝建二铢面文孝建,背面无文。

从钱文书体来看,孝建四铢的“孝建”二字均用薤叶篆书写。而孝建二铢的“孝建”二字除用薤叶篆外,还用玉箸篆书写。

从钱的外形看区别更大。孝建四铢正背肉好皆有廓。即使减重后的薄小钱,廓线突起仍十分清楚。孝建二铢面背无外廓,背穿有廓,不磨铍,外缘不圆。孝建四铢由于减重,钱面薄如纸;而孝建二铢靠钱穿部分较厚,边缘部分较厚,截面呈棱形。只要拿到实物即可看到两者的区别,其实从拓片上也很容易将二者区分开来。

我们曾对52枚孝建二铢逐枚进行称量。得出孝建二铢平均每枚直径为1.6厘米,每枚重1.02克。与前面所述的孝建四铢的平均值相比,每枚重量相差不大,而直径大大减少了。说明孝建二铢的相对厚度增加。通过改进“钱式”,在维持每枚钱币二铢的条件下,钱币比较不易破碎。

《宋书·颜竣传》:“前废帝继位,铸二铢钱,形式转细。……无轮廓、不磨铍,如今之剪凿者,谓之末

子”。这里被称作“末子”的二铢钱与我们所见到的孝建二铢完全吻合。

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看现存的“永光”、“景和”及“两铢”钱,这些钱就变得十分可疑。

从造型上讲,它们与减重的孝建四铢相同,面背肉好皆有廓。与史载二铢钱“无轮廓,不磨铍”的特点不符。既然它们在钱式上与孝建四铢无区别,就不应是另铸的“二铢钱”。

再从钱文艺术来看,孝建二铢的钱文“孝建”二字,无论是薤叶篆还是玉箸篆,均是“笔势飞动,有如翩翩舞袖”,神采飞扬。是中国古钱币书法中的上品。而“永光”等钱的钱文用笔拘谨,呆板,一点生气都没有。与孝建钱的差距太大。

还从钱币的数量来看。二铢钱发行有一年时间,其间又曾“开百姓铸钱”,造成“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十万钱不盈一掬”。无论如何,应有一大批钱参与了社会流通。如果二铢钱是孝建二铢的话,它的发现情况与史实是吻合的。如果二铢钱是指永光、景和等钱的话,这些钱少得令人难以置信。不仅常州、溧水两次货币窖藏中见不到它们。而“永光、景和钱极为少见,解放以后未见有新出土者”。(见《古钱的鉴定和保养》,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通过以上讨论,我认为孝建二铢即应是刘宋时期发行的二铢钱。

四、结 语

刘宋时期所铸的二铢钱即是孝建二铢。它是脱胎于孝建四铢,而钱式又不同于孝建四铢的一种新钱。过去一些钱谱中把孝建二铢当作孝建四铢的别品,如国家文物局编《中国古钱谱》在孝建四铢条下共收录拓八品,其中的6、7两品是孝建二铢。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刘宋货币发现较少,研究不足的缘故。现在是为孝建二铢正名的时候了。

至于永光、景和小钱,由于有“顾烜曰,宋中废帝景和元年铸,重二铢,文曰景和”(《钱谱》,转引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这条史料。顾烜是梁人,距刘宋时代不远,应当尊重。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现存永光、景和钱疑点太大,如真有这种钱的话,相信真钱总会出土的。而“两铢”钱,既无文献可证,疑点又很多,应在不考虑之列。

(责任编辑 宁 宁)

国礼《百寿图》创作始末

● 董宁宁

中国的书法艺术在东南亚乃至国际上都享有盛誉,被称之为“无色而具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特别是书法精品,更是无价之宝。1992年5月,由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孙家正同志率领的江苏党政代表团赠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百寿图》,就是由著名书法家陈大羽、洪炜联合创作的艺术精品。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受《南京史志》编辑部委托,采访了百寿图的创作者之一,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江苏书法家协会驻会负责人洪炜先生。

话题首先从《百寿图》谈起。据洪炜先生介绍:用《百寿图》祈福祝寿的风俗在我国民间流传久远,目前保留下来的《百寿图》真迹,较为著名的有广西永福县夫子岩的摩崖石刻《百寿图》。据当地志书记载,南宋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县令史谓遣公匠镌刻大“寿”字于岩壁,字高5尺,宽4尺,其中有真草篆隶小“寿”字100个。每个小“寿”字旁都注有文体,称为《百寿图》,为我国南方摩崖石刻中的珍品。明清之际,用《百寿图》给人贺寿,渐成风俗。清《通俗编》记载,当时流传民间的《百寿图》已是代代相传的宝物。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对当时以《百寿图》贺寿的习俗作过生动的描述,因此,当孙家正同志即将率江苏党政代表团和省历史家代表团赴朝访问,并祝金日成主席八十寿辰之际,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传达到省文联党组。

洪炜先生接着说:“1992年4月28日,省文联王光炜、赵绪成同志代表党组找到我,谈及孙家正副书记出访事宜,要求省文联创作一幅精美的书法为国礼献给金日成主席。考虑到金日成主席精通汉语,对中国的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决心以中国民间传统的祝寿方式——《百寿图》作为中共江苏省委代表团献给金日成的寿礼。省文联的决定,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的认可,创作《百寿图》的任务就落到著名书画家陈大羽先生和我身上。陈老先生今年也是八十寿辰,又患有眼疾,具体的创作工作就由我全盘规划。



由于任务急,时间紧,责任大,接受任务后,我通宵达旦查找资料。《百寿图》作为民俗文化在民间广泛流传。但在书法界,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哪个著名书法家以此作为书法作品登上书画大堂。陈大羽先生与我联合创作《百寿图》在书画界尚属首例,困难是相当大的。陈大羽先生和我都酷爱篆书,特别是陈老先生的篆书在国际上都享有盛誉。他轻易不动笔,但只要出手皆为佳作。因此,我们商定《百寿图》用篆体创作。

中国是书法大国,《百寿图》作为国礼,必须体现出中国书法的神韵。同时,作为书法作品又必须要有科学的出处。基于这种考虑,我从大量的古瓦当、石鼓文、钟鼎文等古篆体中找出二百八十多个篆书“寿”字,从中精选出100个“寿”字。按照笔画的繁简,线条的变化,根据既统一又有区别的原则,初步定下了《百寿图》的布局方案即:全图上部1/3处由陈大羽先生篆书一大“寿”字,下部2/3处由我篆书99个小“寿”字。‘五、一’节前后整整忙了三天,终于拿出了小样。省文联党组很快将小样上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办公厅,宣传部潘震宙副部长审定并得到省委办公厅批核。我和陈大羽先生就进入了《百寿图》正式创作阶段。”

洪炜先生喝了口水,继续说:“中国的书法以墨写为主,一般都书写在白色生宣纸上,考虑到《百寿图》是用来祈福祝寿的,用白纸写黑字,不太适用,因此就选用金黄色的绢来书写。这种绢,一般都是用于画工笔画用的。写字因其吸水性不强,难以表现韵味,很少采用。同时,绢是不允许补的,每一笔都要求准确无误,书写难度较大。大羽先生和我都习惯了宣纸,很少用绢。为慎重起见,每个‘寿’字都事先在宣纸上写好,并确定每个‘寿’字在绢上的具体位置,然后再写在绢上。为了突出长寿之意,在具体篆写时,每个篆字写法均采用长形,象征寿寿长,长长寿。一百个寿字写好后,陈老叫我在大‘寿’字左下方签名盖章。当时陈老正患眼疾,写小字困难,他的落款也叫我代签。为了使百寿图臻善臻美,我特请南京篆刻家苏金海刻了一颗8.8厘米的《百寿图》卷首印,盖在大‘寿’字右上方。这样与大‘寿’字左下方的落款印章遥相呼应,整个《百寿图》上下左右都均衡协调了。到此,整个《百寿图》总算创作成功了。”

说着,洪先生递过来一张《百寿图》照片。我接过照片,仔细打量:只见整个《百寿图》给人以喜气洋洋的感觉。上部一个大“寿”字粗犷有力,庄严老辣,富有金石之气。下部九十九个小“寿”字,铁骨银钩,清逸秀丽,每字篆法不一,又大体形态一致,有内劲持重之感,左右朱色印章,恰到好处地点缀着画面。为了突出《百寿图》,洪先生特加了两条长绢题款,并用正楷书写。上款为:祝贺尊敬的金日成主席八十寿辰。下款为: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敬赠,一九九二年

四月。两条长绢题款和《百寿图》一并精裱在深赭色的上等绫子上。浑然一体,显得典雅飘逸,富丽堂皇。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我不由脱口而出赞道:“好精致的国礼。”洪先生补充道:“听当时随孙家正同志访朝的省文联副书记姚志强说,当时金日成主席看了这幅《百寿图》,满面笑容,连声称赞,朝鲜的国家电视台也多次播映《百寿图》全景。我们能为中国书法事业作一点贡献,就是苦点累点,心里也是甜的。”

听了洪先生一席话,我心中颇为感动。在当前的经商大潮中,著名书画家陈大羽、洪炜先生能以国事为重,竭精殚力,创作书法精品《百寿图》作为国礼无偿献给国家。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我又向洪先生了解大羽先生的情况,洪先生介绍说:“大羽先生原名汉卿,1912年生于广东潮阳县,32岁被书画大师齐白石收为弟子,改名翱,取字大羽,寓鲲鹏展翅之意。今年80岁的陈老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国画系教授。”我插话说:“早听说陈老以擅长画鸡而驰名中外。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陈大羽的鸡,历来是收藏家重金求购的艺术精品,深受人民的喜爱。我不知道陈老对书法也有极高的造诣。”洪生先接着说:“陈老的篆书雄浑刚劲,富有金石之气,在书法界有极高的声誉。这次创作国礼《百寿图》就是借重陈老在书法界的威望,请他篆书一大‘寿’字,加重了《百寿图》的国礼价值。”

至于《百寿图》的另一创作者洪炜先生,虽然他不肯过多的介绍自己。但我知道,洪先生八十年代被誉为中国书法界的后起之秀,1986年起主持江苏省书协日常工作。国内外有50多家博物馆和展览馆收藏其作品,各地出版的书法家传集、辞典皆有其传略、条例。1988年曾出访日本,在国际书法界有一定的影响。他的书法特点是:行笔一丝不苟,布局协调统一。你只要仔细地观看《百寿图》上99个变化多端、各具特色的“寿”字,你就会心悦诚服的赞叹作者的踏实认真和布局的巧妙了。

采访结束后,我告别了洪炜先生。冬日的阳光洒在洪先生那略显苍老的脸上,我由衷地祝福两位《百寿图》的创作者,健康长寿!创作出更多更美的艺术珍品!

(责任编辑 霁 明)

江南考古史上的重大收获

南京汤山发现猿人头骨



编者按:3月13日,汤山葫芦洞发现猿人头骨的重大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江苏和南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纷纷作了报道。省市领导十分重视,指示有关部门:此乃大事一件,要高度重视,立即采取措施,把事情办好办妥。中国科学院称,这一重大发现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丰富了人类文明宝库,为古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现南京市文管会及其下属单位市博物馆正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开展研究和加固、修复。本刊特转载有关报道,以飨读者。

我国古人类研究又获重大发现 汤山溶洞发现早期人类头骨化石

新华社南京3月25日电 我国科学家首次在长江以南、南京东郊汤山的一个石灰岩溶洞里,发现一具保存完整的早期人类头骨化石。专家认为,这是继北京人、蓝田人、元谋人之后我国古人类研究的又一重大发现。它对深入开展人类起源、演化、迁徙和分布的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1年,南京市汤山镇居民在汤山东北角山坡上采石时发现一个溶洞。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专家在对溶洞的旅游资源进行考察时发现,洞内不仅有千姿百态、晶莹剔透的石钟乳、石笋等自然景观,而且还沉积了大量洞穴堆积物,其中含有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今年3月13日,又在洞内发掘出一具头盖骨和一些肢骨化石。

经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和中科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初步确认,这是一具保存相当完整的早期人类头骨化石,它长约16厘米,宽13厘米,眉脊硕大粗壮,向两侧突出,左眼眶完整清晰,骨壁比现代人厚得多。与著名的北京猿人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初步推测,这具头骨化石的时代为距今10万年的中更新世。在洞内发掘的仅生存于中更新世的肿骨鹿化石,是确定这一时代的有力佐证。

据专家介绍,这次在汤山溶洞采集的动物化石有熊、犀牛、肿骨鹿、葛氏斑鹿等15种。这一动物群与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共生的动物群面貌相同,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型动物群。其中肿骨鹿和葛氏斑鹿化石以往尚未在长江以南见到。它们是在比现今寒冷得多的冰期从北方迁徙到南京附近的。这些动物化石的发现,为东亚地区古动物地理和古气候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汤山猿人头骨发现记

● 钱东德

前年,汤山人开山时在宁杭公路边发现被泥土堵



住洞口的葫芦溶洞,打算开发为旅游景点。去年民工清洞,看到洞内表层有很多零碎的动物骨头,便当作垃圾堆在了一边。

这一信息去年7月被南京古生物研究所许汉奎得知,他随即和穆西南、钟石兰两位副研究员冒着酷暑来到汤山。当他们在洞里捡起这些数十万年前的动物骨骼化石时,惊喜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沉寂的南京古生物所沸腾了!所里立即拨款成立课题组,并请来中科院北京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徐钦琪副研究员,共同研究该项目。

20多天的研究论证,专家们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幅清晰的汤山地区中更新世动物群落图。然而,更令专家们惊喜的是,根据化石发现的15种动物与伴生北京猿人的动物群落非常相似,且洞内骨骼零碎,又以食草类为主,会不会有猿人留下的痕迹?会不会有猿人遗骸?这个念头浮现在人们脑海中。

3月13日,民工们在葫芦洞挖出一个“洞中洞”。洞顶黑乎乎的,很像专家描述的那种烧烤后留下的痕迹。懂得了一点考古知识的民工们也兴奋起来,他们小心翼翼地挖掘,终于挖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人头骨化石。民工从土中捧出化石,用报纸裹好,送到汤山旅游公司办公室。

3月19日,穆西南、钟石兰带着相机,将信将疑地第三次来汤山,打开纸包,一个保存极好的头骨化石赫然展现在眼前!23日,课题组的专家确认这是猿人头骨化石,并根据伴生的动物群化石年代,初步认

定头骨距今约12.7万年至40万年之间。南京市文管会立即通知停止溶洞清理,并将这个头骨送至有关单位妥善保存。这时,恰逢北京古脊椎所所长类研究专家、副研究员齐涛来宁出差。他看到照片十分激动,并对头骨保存得如此之好而惊叹不已!

许汉奎说,这缘于大自然的杰作。他认为,数十万年前的一次泥石流,封住了洞口,把这个洞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使洞内的遗骸处于天然保护中。汤山溶洞猿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在我国是继北京周口店猿人、陕西蓝田猿人、云南元谋猿人、安徽和县猿人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该头骨长16厘米,宽13厘米,眉骨突起较大,顶盖骨较厚,保存完整性好于北京猿人头盖骨,尤其是左眼圈保存较完整。许汉奎说:“这个头骨,看上去与北京、和县猿人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同。如经过充分研究,上述看法正确,可以给头盖骨起个名字,比如称‘南京猿人’。”

(摘自《金陵时报》1993年第0084期)

(上接56页)望着有朝一日回到刘备身旁,再展胸中才智,以安东吴。可接踵而至的是,刘备对她精神上的种种打击。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夺取益州后,便另寻新欢,很快和一位寡居的吴氏女结了婚。接着刘备自称汉中王。曹魏灭东汉后,刘备在成都当了皇帝。王妃和皇后的风陞,全让吴氏女坐了。这对于“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的孙仁,怎能甘休。但又无力挽回。只能以泪洗面、孤度岁月了。

至于这位较短时间得志于当代的孙仁的最终结局呢?《三国演义》是这样描写的:当她传闻到刘备彝陵之战失败阵亡后,在京口(江苏镇江市)北固山上为夫殉节,跳江而死的。京剧舞台上也有《祭江》一曲戏,流传于世。如若分析这位烈性女子不甘心于前途茫茫、投江自杀以解脱自身,或许还有可能。说她在无情无义,遗弃她的刘备死后,痛哭悲哀地于祭江亭上举行一番悼念后,投江殉节,则可能性极小。若有此举,在陈寿的笔下,绝不会少了对她“忠节”的赞扬。

(责任编辑 淑玉)

桃叶桃根桃叶渡

——兼谈宋词咏金陵桃叶渡

●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高国藩

提起桃叶渡，使人想起南京六朝民歌《桃叶歌》。陈释智匠《古今乐录》云：“《桃叶歌》者，晋王子敬之所作也。桃叶，子敬妾名，缘于笃爱，所以歌之。”说此歌原是东晋王献之作，歌咏他的妾桃叶的。但后来它似已失载，所以宋郭茂倩从民间搜集来，收入《乐府诗集》卷四十五，特地标明它是无名氏作，还在说明中特别转引《隋书·五行志》指出它的“陈时江南盛歌王献之《桃叶》诗”的流传性，实际已表明它是南朝时江南“盛”传的民歌。

一、桃叶迎情郎

桃叶渡与《桃叶歌》有关。但《桃叶歌》共四首，内容重点各别。第一、三、四首是一致的，都是歌唱桃叶女子的。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桃叶渡”条说：“桃叶渡在县南一里秦淮口，桃叶者，晋王献之的爱妾名也。……献之诗曰：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不用楫者，谓横波急也，尝临此渡歌送之。”这是说王献之曾临此渡，对桃叶女以“歌送之”，因此叫桃叶渡。但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搜集的《桃叶歌》本身却不是这么说的。正相反，是桃叶女来接她情郎的。民歌是以女子口吻来写的。第一首：

“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这一首是写感郎图报的，并不像是王献之送给桃叶的诗。既感郎图报，于是就要亲自迎接了。果然，第三首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民歌还唱她不顾风急浪大去接她的情郎，第四首唱道：“桃叶复桃叶，渡江不待棹。风波有无常，没命江南渡。”所以第三首中的“我”字，联系一与四两首诗来看，应当指的是桃叶女而并非王献之。一个弱女子，竟能不顾大江之险。“没命”去接她的情郎，情之诚更令人感动，故渡口因之有名起来。

桃叶渡在城南淮清桥畔，在南京为数众多的六朝遗迹之一。它原位于清溪与秦淮河汇流之处。现在看来虽然河面不宽，但是六朝时它是相当宽阔的，后由

于淤泥堆积漫涨而变狭；再说六朝时整个南京水位都很高，高到长江潮水漫到石头城根，所以当时这里渡口的水肯定又急又深，古人诗中多有歌颂。言急者，宋杨修《桃叶渡》云：“桃叶桃根柳岸头，献之才调颇风流。相看无语横波急，艇子翻成送莫愁。”言深者，元虞集《题柯敬仲杂画》云：“峡口春云重，江南夜雨多。水深桃叶渡，风急竹枝歌。”

桃叶渡在宋代最为著名，考其原因，大都因为宋代词人对桃叶渡特别感兴趣。著名词人辛弃疾《祝英台近·晚春》就曾唱到桃叶渡：“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流莺声住。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将愁带去！”这是一首离别相思词。沈谦《填词杂说》云：“稼轩词以激扬奋励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而其温柔魂销的艺术背景，是在桃叶渡，可见它在宋代影响之广。宋代另一词人吴文英《青玉案》中也将桃叶渡作为艺术背景云：“短亭芳草长亭柳，记桃叶烟江口。”吴文英《齐天乐》一词，也别致地提到桃叶，云：“烟波桃叶西陵路，十年断魂潮尾。古柳重攀，轻鸥聚别，陈迹危亭独倚。凉风乍起，渺烟横飞帆，暮山横翠。但有江花，共临秋镜照憔悴。”这里在词首便提“烟波桃叶”，俞平伯先生在《唐宋词选释》下卷，将它视为“错杂用典”的范例特别提出的（二五〇页）。

宋代著名词人姜夔在《琵琶仙》中，也在歌咏桃根桃叶，云：“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鸟。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

又还是宫烛分烟，奈愁里匆匆换时节。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榆荚。千万缕、藏鸦细柳，为玉尊、起舞回雪。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

这首词下片，虽如许昂霄《词综偶评》所说：“句句

说景，句句说情，真能融情景于一家者也。曲折顿宕，又不待言。”但是，此词的艺术境界。全来自首句“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似咏唱与“蛾眉”的思念之情，处处皆有言外之意。

总之，由于宋代词人中不少词人，如除辛弃疾、吴文英以外，还有姜夔、黄孝迈等等人，或将桃叶渡作为艺术背景，或将桃叶渡作为典故，写入词中；此外，宋代的其他诗人均有咏桃叶的诗，兹选摘如下：

1、杨亿《此夕》：“锦里琴心谁涤器，石城桃叶自横波。”

2、苏轼《次韵王定国马上见寄》云：“但恨不携桃叶女，尚能来趁菊花时。”

3、徐铉《听霓裳羽衣曲送陈君诗》云：“清商一曲远人行，桃叶津头月正明。”

4、陈造《寄程帅》云：“对酒不无桃叶女，扣舷却笑木肠儿。”

5、党怀英《双头牡丹》云：“水南水北何曾见，桃叶桃根本自仙。”

6、高廷玉《道出平州寒食忆家》云：“上国春风桃叶渡，东阳寒食杏花杨。”

由于有众多的诗人墨客对桃叶渡如此的厚爱，写词写诗加以歌颂，因此使“桃叶渡”之名在宋代极盛起来。

写诗词歌咏桃叶渡，至明清时仍然如此。明代马銮写有《桃叶》诗：“古今只以去来潮，桃叶王郎两寂寥，渡口不须重问渡，试看人倚夕阳桥。”明纪映淮也写有《桃叶渡》诗：

“清溪有桃叶，流水载佳人。名以王郎久，花犹古渡新。楫摇秦代水，枝带晋时春。莫谓凭栏处，因之可结邻。”这是女诗人赞桃叶爱王郎之永久诗，别具一格。至清代，曹雪芹在《红楼梦》五十一回中也写过一首《桃叶渡怀古》：“衰草间花映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六朝梁栋多如此，小照空悬壁上题。”郭继思也写过《桃叶歌》：“桃叶迎渡头，桃花艳春晓。风雨落桃花，始知桃叶好。”以咏桃叶渡而寄托他们对人间特定的感情。

二、桃叶的妹妹桃根

如果我们研讨桃叶的妹妹——桃根的成名，情况与桃叶与桃叶渡在宋代的极盛一时是同样的，她也是被宋代词人以其优美的词句歌咏而成名的，《乐府诗

集》第三首《桃叶歌》云：“桃叶复桃叶，桃树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这首歌既唱桃叶又唱桃根，实际似歌唱的是两位下女。自唐代起，传说她俩是姐妹，李商隐《秋》诗云：“当时欢向掌中销，桃叶桃根双姊妹。”所以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才说：“（桃叶）其妹曰桃根。”从此姐妹同出名。

宋代词人对桃根妹妹，似乎比桃叶姐姐还要推崇得多。吴文英在他的一首颇长的慢词《莺啼序》（春晚感怀）中，这样写道：“十载西湖，旁柳系马，趁娇尘软雾。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涴、歌纨金缕。暝隄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

幽兰旋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委，瘞玉埋香，几番风雨。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楫桃根渡，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由此词可见，吴文英干脆将“桃叶渡”改名为“桃根渡”了，写了好词来。陈洵《海绡说词》云：“第二段‘十载西湖’提起，而以第三段‘水乡尚寄旅’作勾勒。‘记当时、短楫桃根渡’，‘记’字逆出，将第二段情事尽销纳此一句中。临分泪墨，十载西湖，乃如此了矣。”陈洵将此词中“桃根渡”句作为“点睛”之笔。我猜想，在宋代，或许桃叶渡在有一段时间里，被民间称为“桃根渡”吧！吴文英给它改名或有原因。

最妙地是宋代另一词人黄孝迈了，他在《湘春夜月》一词中这样写道：

“空尊夜泣，青山不语，残照当门。翠玉楼前，惟是有、一陂湘水，摇荡湘云。天长梦短，问甚时、重见桃根？者次第、算人间没个并刀，剪断心上愁痕。”

黄孝迈也干脆不提桃叶，而只提桃根了。词中盼“重见桃根”，是将桃根妹妹作为同姐姐桃叶一样的多情女的。由上可见，宋词的流传，硬是将六朝时不甚著名的桃根女，鼓吹得盛名盖过了桃叶女。

三、桃叶桃根总关情

这使清代诗人浮想联翩。生于清初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郑板桥《念奴娇·桃叶渡》云：“桥低红板，正秦淮水长，绿杨飘撇。管领春风陪舞燕，带露含凄惜别。烟软梨花，雨娇寒食，芳草催时节。画船箫鼓，歌声缭绕空阔。究竟桃叶桃根，古今岂少，色艺称双绝。一缕红丝偏系左，围阁几多埋灭。假使夷光，萝终老，谁道倾城哲。王郎一曲，千秋艳说（下转45页）”

一管画笔绘盛景

记复制《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经过

程苏元

说起圆明园,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心头一颤,这个汇集了中西方园林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被英法联军于1860年抢掠、烧毁一空,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留下了一页难忘的国耻民恨。不少去北京的朋友都忘不了到圆明园看一看,徘徊在残垣断壁之间,抚今思古,更激起了心中振兴中华的强烈责任感。

1992年国庆前夕,我到了圆明园,见到了印象中的几根残损的大理石柱和一片碎石废墟。当我从万春园宫门入园,沿着小径漫步走下去时,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偌大的湖(福海)在夕阳的映照下,闪烁着金色的湖波。山水依然如此独具魅力,却不见了当年园中琼楼玉宇,亭台楼阁。那么当年的圆明园又是怎样一番风韵呢?这不由使我想起梁志才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

清代乾隆年间,受到康熙钦赐“画状元”的宫廷画家唐岱与宫廷另一画家沈源奉勒合绘圆明园四十景图,给我们留下当年圆明园的情影。这四十幅景图由汪由敦题跋,共八十幅。每幅绢心原长二尺、阔二尺

零四分,分装上下两册。上册有正大光明、勤政亲贤、九州清晏、镂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护、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茹古涵今、长春仙馆、万方安和、武陵春色、山高水长、月地云居、鸿慈永、汇芳书院、日天琳宇、淡泊宁静二十幅景图及二十幅图咏。下册有映水兰香、水木明瑟、濂溪乐处、多稼如云、鱼跃鸢飞、北远山村、西风秀色、四宜书屋、方壶胜景、澡身浴德、平湖秋月、蓬岛瑶台、接秀山房、别有洞天、夹镜鸣琴、涵虚朗鉴、廓然大公、坐石临流、院风荷、洞天深处二十幅景图及二十幅图咏。这一珍贵的资料原存于圆明园中。1860年英法联军抢掠、烧毁圆明园后,四十幅景图和图咏亦被劫走,流落异域,后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内。1928年程演生先生漫游欧洲,得见此图,叹为国之胜迹,经多方交涉,征得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许可,摄得这四十幅景图及图咏。1980年,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得知此事,通过我驻法国巴黎使馆人员将程演生先生所拍的照片连同底片交给了同年成立的“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委会”,并在国内出版了单行本。这是一项重要资料,为修复圆明园提供了重要依据。

1991年4月,北京圆明园管理处约请专家对四十幅景图复制成和原稿大小相同的画图进行公开招标。全国有三十多位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参加了招标。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南京市美术家协会会员、栖霞区交通局企业管理科干事梁志才,在首都美术界老师的推荐下,也参加了绘制四十幅图咏的招标。由于梁志才的山水画用墨清淡,线条细秀,笔墨细致柔和,设色的空灵淡宕,使画里的春山秋水如美人出浴,铅华尽洗,澄明秀雅,清韵无穷。因此,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他的作品得到了专家的青睐,一举中标,从而挑起了绘制圆明园四十幅景图的重任。

从1991年7月到1992年4月,历时8个月,梁志才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绘制上。他的那间4平方米由旧仓库隔出来的简陋画室冬凉夏热,连扇窗户都没有。他顾不上这些,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描摹这





镂月开云

些一度展现了绝代风华的亭台楼阁,力求按照准确的结构和比例,真实地复制这些珍品。他的妻子汪美凤为了全力支持梁志才的绘制任务,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当我来到他的画室时,他指着画室的微风吊扇,不无甜蜜地对我说:“这还是她为我装的呢!”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梁志才临池不辍,成为南京画坛上近年较为突出的一位。1985年北京举办“五人山水画展”,在参展五位画家中,梁志才是最年轻的一位。1987年,他的六幅作品被全部选中送日本参加“第四届国际菊花大展”,饮誉海外;1989年在南京参加“三人春秋画展”,得到普遍关注;其个人传略已被收进“中国当代书画家大辞典”中。

前不久,梁志才满怀喜悦地收到北京圆明园管理处寄来的、由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的《圆明园沧桑》录像带及收藏证书等纪念品。

(责任编辑 淑 玉)

在改革中

前进的下关区市政工程管理所

下关区市政工程管理所成立于1953年。40年来,经过广大职工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现已发展成一个拥有185名正式职工,183万元固定资产,具有相当实力的全民事业单位。全面负责养护维修全区48万平方米的道路和77公里的下水道等各类市政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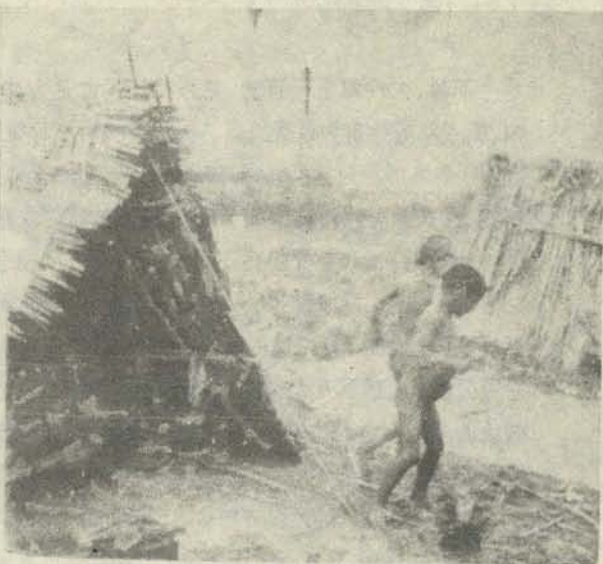
我所坚决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根本路线,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经济,获得了显著成效。推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形式,在用工制度、分配方式上大胆革新。采取所长负责制下的干部聘任承包制,职工劳动优化组合制,按实际承包效益分配奖金,实施科学管理。充分发挥广大干部职工的聪明才智,调动工作积极性。

我所主要是服务于社会,确保市政设施完好,发挥最大效益。我们以此为根本,认真进行养护维修,完成多项大中修、集资、代办工程,加强市政建设。先后为抗洪防汛,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高架桥建设等作出重大贡献。为加快市政行业发展,提高经济效益,我所对内涵机构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成立“南京市政

● 下关区市政工程管理所所长 金 华
建设总公司下关公司”,下设四处、二科、一股、一室、一队,并开办利康贸易公司,联办靖江水泥预制品厂,发展多种经营,创造财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据统计,仅1992年我所就承办各类工程93项,整修道路25万平方米,新建翻建下水道11万米,创产值240多万,利润60余万。并添制多辆工程机械,新建办公楼一座。

在发展生产经营的同时,我所还十分重视社会效益和精神文明建设。各部门紧密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宣传社会主义制度,开展生动活泼的教育。在全所范围内开展行风建设活动,树立优秀职业道德风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班子重视自身建设,模范带动职工群众,上下团结,通力合作,以最大的努力获取最佳的成绩。先后荣获市创建先进单位、区文明单位、行风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所将顺应时代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开创事业,兴办经济实体,努力为市政行业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长江第三大岛

南京八卦洲开垦记

● 王长喜

万里长江中,有无数个岛屿,其中最大的是上海的崇明岛,镇江的扬中县次之,第三便是南京的八卦洲。八卦洲位于幕府山对面的长江中,由长江泥沙沉积而成,与燕子矶一水相望,东西长7公里,南北8公里,面积约56平方公里(相当于南京城区面积)。查志载,八卦洲原名青沙,继称金珠沙,再改名新洲,亦名巨洲。它在明代叫“草鞋洲”,因形似而得名。后南岸被江水冲塌,水道南移,泥沙北淤,洲渐成八卦形,遂以“八卦”名洲。清代八卦洲为“八旗世产”,盛产芦苇,供城内居民燃料之用。据《同治上江志》载,“洲为八旗世产,薪蒸资焉。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调荆州驻防500户,公捐人二两,以助培洲本。又岁以洲息银600两,助八旗昭忠祠祭费”。八卦洲千百年来一直荒芜人烟,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以后,才在这里开垦种植农作物。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设南京特别市政府。当时南京的旗民有3000余人,市政府设旗民生计处负责旗民事务,举办教养。八卦洲划归旗民生计处管辖,洲产芦柴收入用于补贴旗民生计。到了冬日,数千名刀工登洲,收割芦柴,然

后用船运到城里出售。1928年八卦洲芦柴产量达15万担,每担售价大洋七角,由旗民生计处统一定价。洲上建有望台,配有望远镜,收割芦柴时,稽查、巡丁不分昼夜轮流守望,遇有火灾发生,便于指挥灌救。

1928年,江淮公司经理刘常远向南京市政府提请开垦八卦洲,理由为八卦洲收入仅有芦、鱼二项,开垦一以重民生,一为市政府可收地租以增加收入,并表示由江淮公司负责招股开垦。这一提案被市长何民魂驳回。尽管如此,刘常远毕竟是第一个提出开垦八卦洲的人。

1929年,刘纪文重新出任南京市市长(刘纪文为首任市长)后,计划在八卦洲放垦3万亩,并令旗民生计处拟具放垦详细计划。旗民生计处洲务股长带领一些人到八卦洲实地勘察,依据洲图推算全洲面积约为7万亩,但洲上的柴民说有10万亩,渔民说有12万亩,均系传闻,无从考证。全洲以乾、坤、震、艮、离、坎、兑、巽八字按照八卦方位列为八号,芦苇以乾、巽两号茂盛,坤、离、坎三号次之,震、兑、艮三号既稀且枯。八卦洲地域辽阔,究竟放垦哪块地方需定案,市政府为此于7月31日召开第55次市政会议,确定放垦地点以“地高柴稀”为原则。经过反复测量,将江字

号上下段、大沙滩上三百丈、驼路、新溜、青龙头、团洲、鸭子路等处定为放垦地点。接着,在《中央日报》登报通告八卦洲放垦事宜,向南京及外省招佃、垦地。制定有《八卦洲计划放垦条例》、《八卦洲放垦佃农报领地亩简章》、《八卦洲佃户庄规》,规定每户可领地10亩至100亩,租期为20年,各佃农需照章承租,不准冒名领地,佃户有庄规可守,关于全圩修路浚沟御险等公益事宜做到有人负责,不至于互相推诿。申请领地的多为安徽无为农民,在旗民生计处登记,审查确为安徽农民后缴纳保证金及柴价,每亩7元,共领地22000亩。佃农登洲后,丈划垦地亩分,发给佃农执照,并再次申明无地者不得居住洲上。经过这批农民的辛勤劳动,原先的芦苇滩被开垦成一亩亩良田,种上小麦、油菜。旗民生计处又在驼路(今新闻村)划出30亩地为市场,城里许多商人来洲领地开店经营,又建立实验畜牧场,从事农副业生产。

八卦洲放垦后,农民们就在自己的领地附近搭建草房。1930年,南京市政府决定在八卦洲建设一个模范新村,由市工务局、社会局具体负责办理,用半年时间完成。新村在驼路,面积4000亩。新村分为田地和庄园两部分,前者为农艺生产部分,后者除住宅建筑外,并有牲畜饲养场。庄园位于新村中央,有十字道路通过其间。田地采用横排法,全部田地分为82大畦,每大畦为40亩,一大畦内又分为10小畦,每小畦为4亩,每亩都有纵横小埂,这可谓标准的田块方阵。新村共有120户农民,并有较齐全的社会设施:1、设有新村小学,并附设民众夜校;2、组织保卫团;3、设有新村生产消费合作社及贷款所;4、备有小汽船一艘往来于下关、驼路间;5、广植树木,点缀村景。这个新村被市政府列为全市乡村建设之典范。

1931年,八卦洲改归南京市财政局管理,财政局下设八卦洲管理处,设主任1人,并配有测量员、稽查、巡丁数名。首都警察厅在八卦洲驻有巡逻队。这年初才开始筑埂,原定筑埂由财政局负责,临时改为官民双方负担,民方每亩摊派2元,当时由八卦洲管理处主任关培元主其事,后因潮涨,用船运土,每土方报销2元8角,耗费52000元,进展不大,向民方索金一半,又硬将垦地内农民应受之柴价一起没收充抵。1931年夏天,长江洪水泛滥,尚未筑好的堤埂抵不住洪水的冲击,八卦洲全部被淹,水没之处,汪洋泽国。

难民们望着刚开垦不久的田地没在水中,心中酸痛至极,扶老携幼,眼里含着泪花离开了八卦洲,逃离四方,年轻力壮的以傭工为生,老弱病残的只好沿路乞讨。

不久洪水退下去了,农民们又回到八卦洲上,重新建设家园。他们自动组织起来筑埂,1932年底完工,达43里长。八卦洲管理处见洲埂已经筑成,复议由官方和民方共同增加修筑,采以工代赈办法,共发面粉2150袋,价值4356元,又发现款6233元,共10589元。这项工程由农民挑筑土方,计值51000元,官方赈与赈款总计不足半数,摊派给农民的费用竟高达25000元,由此可知农民损失巨大。

1932年6月,南京市市长石瑛到八卦洲视察,见佃民居室湫隘,生活困苦,为之叹息,令八卦洲管理处主任石肇基制订整理计划。7月,《整理八卦洲计划书》出台,计划中对于清丈地亩、招垦余荒、村落布置、使用机犁等均有详尽论述。石瑛指令八卦洲管理处可按计划书实施,并拨款给八卦洲添购两架进口机犁,单价2千多美金,每架日可垦荒6亩,更换一下配件,也能用来运土、车水、耕植、磨面等。

由于1931年大水,八卦洲三年不能耕种,佃民无法缴租。八卦洲管理处认为佃民狡猾,从1933年起佃民凡生产出口必先向管理处领取生产出口证手续,佃民将自产农产品出洲,必向管理处缴纳地租后,才发出口证。农民一般要等粮食出售后才能有钱缴租,况且市价有高低,农民损失惨重,坚决反对这一做法。直到1937年2月,八卦洲召开全洲佃民大会,推举萧祝三、刘卿臣等7人为代表,到市政府请愿,出口证制度才取消。

二

八卦洲第二次放垦在1934年,计有5000余亩,储备金及柴价与第一次相同。当时管理处主任余澄自为放垦介绍人,领垦者多为公务人员,余澄按亩索取介绍费,并化名自领地数百亩。这些公务人员领地后并非自家耕种,而是雇工代耕,人称呼其为“宦亩”。他们不负筑埂义务,坐享农民代为筑埂的权利,遂致纠纷迭起,一直得不到解决。

八卦洲原属燕子矶区七里乡,由于该洲区域辽阔,人口众多,1934年市政府第333次市政会议决议“八卦洲划设为八卦乡,仍隶属于燕子矶区”。1935年

2月八卦洲开始编组保甲,4月完成,全乡有12保,109甲,1114户,6126人。同年冬,八卦洲的堤埂进行了全面的加修,由市工务局技术人员亲自指导。经测量得出全洲堤埂全长23.757公里,堤埂全部在55米以下,整个修筑分为两项工程。(一)抽箱工程。每到夏汛江潮暴涨,水由芦根渗入堤内,俗名“过埂潮”。为杜绝渗漏,一劳永逸,堤埂芦根漏处都实施了抽箱工程法,即在外坡堤下挖深1米宽1米土,除净芦根,加填黏土夯碾坚实,共计挖填土方23757立方。(二)加高堤埂工程。加高到55.4米,堤顶放宽至2.5米,内坡增厚至坡度为1比2。

1936年八卦洲管理处会同农会、农民教育馆、八卦洲巡逻队共同组织水利委员会,负责全洲机器排水,农田灌溉。同年筑埂委员会成立,财政局、管理处、巡逻队、乡公所、农民教育馆、农会主管人员为委员,另推举5名佃民代表,筑埂委员会负责提费收支、招募工役、监核工程及勘验土方。

八卦洲田地,大都由领户招佃耕种,或由佃民雇人代耕,并有领地转卖谋取暴利的,肥沃的土地每亩卖五六十元,一般的亩价也有三四十元。由于1931年大水,1933年干旱,迭遭荒芜,领户及佃民大都将田地收回自种,这就造成一般代耕贫农无地可耕。到1936年,这类无地贫农多达780户,3000多人。在大批贫农的呼声下,市政府决定在八卦洲新埂内芦地放垦7000亩,这是八卦洲的第三次放垦。申请领地者达2150户,所需亩数总计在20万亩之上,由于地少人多,只好采用抽签法。11月20日,位于夫子庙贡院的市政府内人头攒动,申领垦地的几千名农民一大早就赶到市政府,直到下午2时才在大礼堂内开始抽签,7000亩垦地,以50亩为一户,只能有140户领地,中签为数甚微,没中的农民久久不肯离去,要求市府再次放垦。

1937年1月,市政府决定第四次放垦6000亩,包括外沙包至下坝及下坝至天河口两部分,全部为埂外芦滩,且都在洪水位下。这次放垦未用抽签,由周其全等120户无地难民承领,因为他们自行集资建筑堤埂,故免收放垦保证金,并免租两年。

第四次放垦后,仍有不少农民未领到地,他们集体到市政府请愿,可是无济于事。1937年5月18日,300多难民为了求生存来到八卦洲农事试验场,占田

地搭盖芦棚。八卦洲管理处主任列应佳自恃是市长马超俊的侄女婿,带着几个警察气势汹汹地赶到,驱逐难民离开农场,难民们坚决不走,列应佳便指使警察对难民大打出手,难民们愤怒了,他们高喊:“打倒列应佳!”冲了上去,几个警察见势不妙,夺路而逃,列应佳没跑掉,被痛打了一顿。第二天,大批全副武装的宪警登上八卦洲,将几名为首的难民逮捕,并贴布告限令难民两日内离开农场,难民们将布告撕得粉碎,毫不畏惧宪警的淫威。7月2日,南京市党部派黄其弼、伍士焜两特派员会同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邹树文、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章之文、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主任黄通组成调查团,赴八卦洲调查纠纷案。南京市政府、市党部、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四机关为八卦洲难民占地案多次会商,最后决定将八卦洲占地难民移到大小黄洲洲尾垦荒。至此,这一纠纷案才告结束。

三

今日的八卦洲隶属于栖霞区,有15个行政村,人口3万多人,洲上有五条交通干道,水上有宁九线航班,可达市区和大厂区,并有轮渡过江至燕子矶。洲上有高达193米和163米的22万伏高压线过江铁塔各一座,并有八卦洲船闸一座,为该洲泄洪和水上通道。八卦洲以产小麦、玉米为主,其特产芦蒿、韭菜已成为南京人爱吃的时鲜菜。多年来,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发展不快。今年在八卦洲上将动工兴建我国最大跨度管道桥,以让江北的南京钢铁厂煤气过江进城,彻底解决南京城居民煤气紧张状况。这是南京市今年的重点建设项目。该桥位于八卦洲上游洲头,由南北两桥组成,其中北桥从南钢码头跨江至八卦洲落地,跨度为400米,南桥由八卦洲跨过长江主航道至幕府山落地,主跨1000米,为我国同类桥之最。南北两桥采用悬索斜拉混合结构,塔高160米。

1995年,南京长江二桥将在八卦洲上开始建设,1999年前竣工。这将使八卦洲这座孤岛千年来第一次与江南、江北大地相连接。南京市政府王荣炳市长表示“要将长江二桥的建设与八卦洲的开发结合起来”,这消息是何等地振奋八卦洲3万农民!随着南京长江二桥的建设,不久的八卦洲定会是一个美丽富饶的镶嵌在扬子江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责任编辑 霁明)

“先行官”的足迹

——喜读《当代南京电力工业》

王能伟 马伯伦

《当代南京电力工业》出版面世,得以先睹为快。读过,深为南京电力工业部门的远见与魄力所感奋。这样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南京电力工业的史料性专著,一部70万字的蔚然巨制,想必是南京有电业以来的第一部了。大约50年代,电力被称为国民经济的“先行官”。目前,又与南京市加快步伐迈向现代化大都市,电力工业作为城市最重要的能源供应部门、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投资环境要素,正受到所有关注南京发展前景的人们格外注意。《当代南京电力工业》在这时候出版,其价值自又高于寻常。

《当代南京电力工业》共6篇、13章,从发电、输电、配电到用电全系统,从城市到郊、县农村全地域,完整地记述了1949年以来南京电业的发展状况,并配有100多幅彩色和黑白照片,称得上图文并茂。在其“附录”部分,又收录了《建国前的南京电力工业史料》和《南京电力工业发展规划》。这就使全书内容从1910年南京有电以来80年的历史贯通始末,而且放眼未来。编著者全局在胸,以史为鉴,其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振兴电业的立意,不仅可见于全书篇章布局,而且通过翔实的资料体现出来。就目前所见各城市电力工业的资料性著述来说,论史料容量、论记述翔实,《当代南京电力工业》也属佼佼者之列,其致用的价值相当高。

《当代南京电力工业》着力于突出南京电业的时代特点与地方特点,也是该书的成功之处。从全国来看,南京电业的起步不算很早,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才有南洋劝业会自装发电机组和金陵电灯官厂相继发电。而上海,则在1879年因美国总统格兰特途经上海而在外滩装机发电,比南京早31年。1888年清廷在北京西苑(今中南海)办电供皇室自用,也早于南京22年。南京与邻近的江南城市苏、锡、常、镇相比,办电也都要晚一些。起步虽迟,但南京电业特点鲜明,历程曲折,这在《当代南京电力工业》的记述中,相当突出地反映出来了。对于认识南京电力工业,很有帮助。

南京电业起于官办,用于官署,和南京位居清代

“江南枢要”,是东南半壁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分不开。金陵电灯官厂选址于西华门附近,位处两江总督署与江宁将军署两大军政衙署中间,以便就近供电照明,便足以反映官办电业的特点。而后,才有经新街口到朝天宫和经大行宫到夫子庙两条供商、民用电线路的架设,差不多10年以后才通电到下关车站、码头,逐步成为公用事业。官办开端,使南京电力工业“先天不足”,发展缓慢。

民国时期,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南京电力工业曾一度兴旺,首都电厂享有“全国模范电厂”美誉。1936年,敷设过江电缆,使江北在建的永利铔厂获得电力供应,又架设了中国人自行设计、施工的66千伏京龙线,为中国水泥厂送电,当时,是国内电压等级最高的输电线路。南京跨江两岸发展民族工业,南京电力工业是名副其实的促进者。日军侵华,又使南京电力工业一落千丈。

南京解放以后,曾经是电力富裕、向外输送的地区。然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尽管南京电力工业也在大步迈进,“先行官”终于一再跟不上了。南京电网并入大电网后,分配的电力不敷需要,南京成为缺电城市之一。

70年代起,电力缺口常在三分之一左右。全市各部门千家万户、千方百计办电补缺的局面出现了,1987年企业自备发电机组总容量达到21.58万千瓦,是南京解放时首都电厂装机容量的6倍。而随着华能南京电厂的开工建设和新建西渡电厂的立项,南京能够就地平衡为主的供电前景,又展现在眼前。

《当代南京电力工业》从各个侧面记述了这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反映了电力工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给了读者开拓进取、奋发向前的力量和借鉴。这正是这部资料性著述的成功之处。依靠翔实丰富的史料而收到的这种效果,是一般的“简介”、“概况”所难以做到的。

如果说,《当代南京电力工业》还有总揽稍嫌不足,专业性较强而通俗程度尚显欠缺等瑕疵的话,从总体说来,仍瑕不掩瑜,将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改革大潮中的鼓楼区工商局

● 鼓楼区工商局局长 黄星仁

鼓楼区工商局现有干部职工 114 人,内设一室六科和四个工商所,以及经济检查中队、农贸市场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能是对全区范围内的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办照,经济检查监督,合同检查仲裁和市场进行管理。现我局登记注册的企业有 2035 个。个体工商户 4571 户,私营企业 108 户,私营企业分支机构 6 户,辖有江苏路、汉口路等 13 个农贸市场,开辟了鼓楼街小商品市场、山西路灯光夜市等 7 个专业市场,以及筹建中的草场门龙江市场等。

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鼓舞下,我局推动企业内部机制转换两个方面来为企业服务的,制定了“关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实施办法”,采取“三放、二减(简)、一加强”的措施,支持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增强了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建立和完善经济合同管理制度,培训企业合同管理人员,调解和仲裁经济合同纠纷,对经济合同实行鉴证;以打击假冒伪劣和走私贩私为工作重点,有力的保护了合法经营,维护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在大力支持发展国营、集体经济的同时,采取减少审批环节,政策倾斜及方便变更转向经营等措施,

积极扶持个体私营经济稳步发展,鼓励私营企业向生产型、科技型发展,管理上努力做到规范化、程序化,同时用各种形式对广大个体户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普法教育。

我区集贸市场每年总上市量约为 4500 万公斤,成交额逾亿元,满足了群众生活需要。随着经济发展,我局各类市场建设与管理又有长足发展,继全市首家招商市场、首家灯光夜市、首家电子电器总汇、首家文化用品批发市场建成开业后,又积极倡导“破墙开店”。与单位联合开办了三乐、天龙、天马、长三角等一批新的市场和商业摊群,从而为本区和外地的集体、个体经营户提供了销售窗口。筹建中的江苏路大型室内农贸市场预示着我区集贸市场将逐步走向现代化。连续两届荣获国家级“文明市场”光荣称号的招商市场等先进单位标志着我局市场管理工作已经跃上新的台阶。

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们决心以更优异的成绩为振兴经济添砖加瓦。

(责任编辑 吴纪岫)

江楫。”郑板桥也认为桃叶桃根是两位女子,并且还说她们“色艺称双绝”。清黄嗣塘《桃叶渡》诗说法又不同:“花开姊妹总消魂,嫁得才人共一门。何事渡头遗古迹,只名桃叶不名根。”黄嗣塘则认为桃叶桃根是两姐妹,共同嫁给了才子王献之,很为“只名桃叶不名根”鸣不平。清顾梦《秦淮泛舟》的《桃叶渡》云:“桃叶桃根最有情,琅琊风调旧知名。即看渡口花空发,更有何人打桨迎。”顾梦则认为桃叶桃根是天下“最有情”之女子。清李茂英在他的《秦淮闻笛》诗中,则想象桃根桃叶姊妹俩是住在“画楼”上,所以他唱道:“桃根桃叶画楼多,秋水秋山唤奈何。几曲小栏明月底,有人曾此别横波。”清代江浦诗人刘岩的《桃叶歌》中,则想象桃叶桃根在渡头等人的憔悴面容:“桃叶复桃根,憔悴新林浦。艇子过江来,迎接韩擒虎。试问渡头人,何如井中苦?胭脂色未消,尚学桃花吐。”韩擒虎句缘于隋书,《隋书·五行志》云:“隋晋王广伐陈,置将桃叶山下,及

韩擒虎渡江,大将任蛮奴至新亭,以导北军之应。”诗以后世之事比她俩当时,说她们像陈妃在胭脂井中躲隋军一样的苦。桃叶桃根痛苦的命运,引起清代诗人极大的同情,清代六合诗人朱实发《秦淮》还在寻觅桃叶桃根在哪里,他唱说:“盈盈一水脂粉香,帘栊荡上明月光。金虫灯小红不定,玉笛声落波中央。红板桥南去沽酒,东风吹绿门前柳。一笑借问当垆人,桃叶桃根今在否?”时代越往下,人们对桃叶桃根下女的关注越发加深。

所有歌诗都在声声唱着古金陵民众对桃叶姐妹与桃叶渡难忘的回忆。但是,自从《桃叶歌》在六朝产生以来,桃叶民间传说的不断被人民修改补充,反映在宋词、明清诗词中,已与六朝《桃叶歌》的内容有了许多不同,这说明,桃叶女永远深藏在南京人民善良的心中,她的传说随着时代而流变。

(责任编辑 海 鸣)

(总 201) 45

以法治税 利国利民

● 南京市税务局鼓楼区分局局长、高级经济师 陈义海

南京市税务局鼓楼区分局内设六个科室,八个税务所,一个稽查队,一个检查站。此外,还在招商市场、江苏路等较大的工农贸市场设立了征收机构。负责全区国营、集体、个体、私营和外商投资企业 6500 多家和 10 多个工农贸市场的税收征管工作,年人均组织收入 200 多万元。分局于 1990 年、1991 年、1992 年连续三年被市税务局评为税务系统先进集体。1990 年、1991 年被区委、区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

一、转变思想观念,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分局领导多次带领有关科、所人员深入到大中型企业、区、街企业进行现场办公,宣传党的税收政策,了解政策运用、落实到位情况,了解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走向市场中遇到的问题,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加速企业发展,提高经济效益。我们还主动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为企业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提高管理水平。几年来,我们为企业牵线搭桥,提供经济信息 1300 多条,建议和帮助企业开发新品、改造技术设备 500 多项;提供各种咨询服务 2950 多人次;为企业举办企业负责人、财会培训班 9 期,培训人员 437 名。同时,我们还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培育市场,促进个体、私营企业快速发展。1992 年,全区个体企业 4000 多家,比 1989 年增加近 2.8 倍;私营企业 130 余家,比 1989 年增加了 3 倍。

二、突出重点,支持企业发展

我们按照上级制定的税收政策,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保证完成税收任务的前提下,坚持就松不就紧,就宽不就严,就低不就高的“三就三不就”原则,帮助企业用好、用足各项政策。分局深入、扎实、有效地开展政策促产、信息促产、科技促产、管理促产等活动,始终把“电、汽、化、特”支柱产业、科技、外向型企业、骨干企业作为税收扶持重点,帮助企业搞活生产经营,提高经济效益。仅 1992 年,分局共开展支、帮、促项目 44 个,帮助企业消化优惠政策资金 3000 多万元,使 7 个企业扭亏为盈,5 个企业减亏,有 1 个项目被市税务局评为“十佳”支帮促项目。我们还积极扶

持第三产业、教育、福利、宗教事业的发展。

三、加强税收征管,坚持以法治税

近几年来,分局正确处理依法治税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在深入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中,认真贯彻《税收征管法》。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冲击了税收环境,干扰了税收秩序,税款征收的难度大大增加。为了重新建立良好的税收秩序,坚持以法治税。我们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大力加强税法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二是坚持以法治税,坚决打击偷、抗税行为。仅 1992 年,共查出偷、抗税案件 70 余起,立案 6 起,追缴税款 91 万余元。我们还同区检察院联合建立了税务检察室;同区法院建立了税务巡回法庭;与公安分局、派出所、联防站建立了公安三级护税网络;与区 9 个街道建立了 40 多个护税协税组织,设立了零散税收稽查小组。这些护税协税组织,帮助税务部门清查偷、漏、逃、抗税 407 起,挽回税款损失 250.4 万元。全区初步形成了较好的税收环境和税收秩序。国家税务局、省、市税务局分别报道和转发了我们的经验。

四、抓廉政促勤政,加强税务干部队伍建设

我局经常对税务干部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纪教育,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开展“学先进、比贡献、争当青年标兵和‘三八’红旗手”活动,开展比思想,赛职业道德;比作风,赛工作效率;比纪律,赛廉洁守纪;比干劲,赛岗位贡献“四比四赛”活动。还先后举办各种培训班 56 次,提高了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几年来,分局有 103 名干部被各级有关部门评为先进工作者、青年标兵、三八红旗手。我们还注重廉政建设,树立良好税风。在廉政工作上,坚持了一教育,二制度,三查处的方法,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副职领导配合抓,职能部门重点抓,其他部门共同抓。建立了公开办税制度、纪检日制度、举报电话和信访接待日制度,建立了内外结合的复合型监督监察网络,促进了廉政勤政建设,全局干部、职工形成了团结、奋进、求实、廉政的良好风气。

发挥基础作用 推进经济发展

南京市雨花台区交通局

我局成立于1985年。局机关设党政办公室、财务科、企事业管理科、工程科,下辖四个事业单位、四个企业单位,在职干部职工共有892人,离退休人员430人。

近几年来,我局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不断深化直属企事业单位内部的改革,加强机关队伍自身建设,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多次受到省、市有关部门和区政府的表彰。

在我局管养的114公里国道、省道及县级公路上,我们坚持“以养为主,管养并举”的方针,一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分片包干,把养护责任落实到班组人头;另一方面,通过强化路政宣传,增加公路巡查力量,设立义务路政监督岗,组建公路巡回法庭等,教育沿路的厂矿企事业单位和乡镇爱路护路,确保公路畅通。在市公路管理处组织的好路率评比中,连续七年获得第一名。

在市交通局、雨花台区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我局集中力量,先后修建、改建和扩建了赛小公路、江叉公路、宁溧公路、天双公路、宁丹公路石子岗段、油棉路、机场路、大郑路等8条进出南京的主要通道,解决了我市南郊道路交通的卡脖子问题,为全市及本区的乡镇经济开发提供了便利。

全雨花台区境内共有乡村道路290公里,大小农桥113座。在维修和管理上,做到既方便乡镇企业和农居民生活,又符合全区的总体规划,在1985~1992年的7年时间里,我们共投入农路农桥修建款450万元,在村村通公路的基础上,提高路面等级68公里。

以长江和新秦淮河的自然河流资源为依托,我局大力加强码头建设,1985年协助江心洲乡建造了汽渡码头,1987年投资修建了棉花堤化工原料码头,1989年又投资120万元,兴建了西善桥件杂货码头及前后方货场。目前,西善桥码头已成了雨花台区最大的黄砂销售点。

为改善机关及基层单位的办公、生产和生活条件,从1990年开始,通过多方筹措资金,我局先后新

建、改建了雨花大件起重运输公司办公楼及停车场,交通局机关办公楼,板桥、西善、上新河三个交通管理所办公楼,港航监督所、公路管理站、联运公司业务楼、第九汽车修理厂厂房、船员宿舍等,建筑面积达1.3万平方米。

到1992年底止,纳入我局行业管理的营运车辆共1650台,船舶78艘,汽车维修厂154家,船舶修造厂2家,码头11座,运输服务业47户。在做好日常管理工作的同时,我们每年都要对执法人员进行一次轮训,加强法规学习,并进行考试,规定考试不合格者不得上岗。在各管理站(所),我们都制订了公开的办事程序和办事制度,工作人员实行挂牌服务。各管理部门共聘请行风监督员57人。面对日益繁重的行业管理工作,我们筹集65万元,装备了无线通讯电台,为各站(所)购置了摩托车及其他交通管理用车,提高了办事效率。针对管理对象的不同情况,我们坚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扶持了一批类似雨花储运站生产经营有困难的新企业,也惩处了不少违章经营的单位,维护了行业内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

局直属的四个企业,有三个是运输单位,一个是汽车修理厂,它们底子薄,基础差,设备陈旧,人员素质不高,成了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局党工委本着“放手使用,严格考核”的原则,在认真调查分析之后,为各单位逐一选好当家人,并每年对他们考核一次。对企业开发新品,局里从人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仅1990、1991两年,就为企业开发新品注入资金260万元,还抽调了两位有中、高级职称的同志到企业去,充实企业的技术力量。

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后,局领导一班人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提出了突破行业界限,放手经营的方针,1992年9月,我局组建了“雨花客运公司”,10月,成立了“雨花台区货物配载中心”及“水上货物配载站”,12月,成立了“艺虹装潢公司”,一个以运输及管理工作为主,多种经营的格局正在形成。

杜月笙和他的

五房妻妾



杜月笙原配夫人沈月英

朱氏贫病交加,过度劳作而死。五岁时,其父又病死,杜月笙为孤儿,早年的杜月笙生活极为寒苦,没有多少童年、少年欢乐。稍长,失去父母的杜月笙乃混迹于当地一帮好逸恶劳的无赖少年中,养成浪荡恶习。十四岁那年,杜月笙离别高桥镇,只身独闯“十里洋场”上海滩,开始了他以后的颇为壮观的经历。但他初次来到上海滩,虽然凭他的一点机警同一些流氓混熟,自然也碰过不少钉子。后拜青帮通字辈陈世昌为师,加入青帮,充其量是流氓队伍中的一小头目,若不是被当时已独霸一方的法租界探目黄金荣识中,并用心加以扶植提拔,像杜月笙这种流氓无业的人,在上海滩只能是小阴沟里的泥鳅,翻滚不起波浪。不要说以后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成为各方倚重的人物并跻身于“海上闻人”之列,就连他以后连续五次做新郎也完全是是不可能的。

笼络人心 黄金荣充当红娘

杜月笙第一次做新郎是在他进黄金荣公馆不久,妻子姓沈名月英。这桩婚事是由别人把沈月英介绍给杜月笙,然后由黄金荣及其结发妻子林桂生做媒人操办完成的。事情的缘由是:早年杜月笙混迹于上海滩小流氓中,不务正业,搞些小偷小摸。后经熟人推荐,入法租界同孚里黄金荣公馆做事。在黄公馆内,杜月笙仿佛变了一个人,他沉默机警、事事留神,真所谓“眼观四方,耳听八面”。他对黄公馆内上上下下每个人的生活习惯、脾气性格,都用心揣度研究,牢记在心,然后根据各人情况区别对待。不久,杜月笙便获得黄金荣尤其是林桂生的欢心,杜月笙在黄公馆内地位逐步上升,有人为了巴结杜月笙,把苏州姑娘沈月

在旧中国,有钱有势的人娶几个妻妾是极为平常的,更何况当年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青帮大亨,海上闻人、号称“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杜月笙呢?杜月笙,名镛,号月笙。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生于上海浦东高桥。其父杜文卿在上海滩茶馆当过跑堂,码头上干过“插子手”(查验货物的丁役),收入甚少,难以支撑家庭生计,故其母亲朱氏不得不时常出门帮人洗刷衣物,赚几个铜板,贴补家用。杜月笙三岁时,其母

英介绍给了他。沈月英面目姣好,身材苗条。幼时曾跟随父亲远赴东北哈尔滨做生意,未料生意失败,父亲病死他乡,沈月英便随母亲回上海,母女俩相依为命苦度时日。杜月笙自打见到沈月英后,为其姿色吸引,便经常往她家里跑,帮她家做些家务。初涉爱河的杜月笙对沈月英可谓是一往情深,然而苦于自己只不过是黄公馆内的一名伙计,无力把沈月英娶过来,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件事让黄金荣妻子林桂生知道了。林桂生已注意瘦弱的杜月笙很久了,有一件事使她对杜月笙印象颇佳。一次,杜月笙第一次得到一笔额外的2000元钱后,他没有像过去一样去嫖去赌,尽情挥霍,也没有用那笔钱去存银行、买房子、开片店面,而是拿这笔钱去清理旧欠,结交一些朋友。从这件事情,林桂生断定杜月笙正是她和黄金荣所需要的得力助手,必须另眼相待,重点栽培。林桂生是个非常有心计的女人,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黄金荣,黄金荣十分赞同。但杜月笙是个从小浪荡成性的无赖,是一匹野马,不是轻易所能驯服的,林桂生认为必须先让杜月笙成家,取一付鞍轭,套住这匹放荡不羁的野马,才能使他为己所用。恰好林桂生这时听说杜月笙认识了沈月英,又十分喜欢她,因而让老板黄金荣去做大媒,竭力撮成这桩婚事。黄金荣做媒是天大的面子,当时沈月英母女居住上海,生活维艰,其母亲只希望女儿找一门有依靠的女婿,以养老送终。因而黄金荣一提亲,沈月英母女便同意了,杜月笙的第一桩婚姻就这样定了下来。

民国四年(1915年),杜月笙28岁。黄金荣借给杜月笙一大笔钱,让他在声名显赫的法租界同孚里租了一幢房子,置办家俱,订做衣服,杜月笙忙忙碌碌准备成家。结婚那天,排场很大,热闹非凡,杜月笙花大价钱租来一顶宁波龙凤花轿,把沈月英抬进了同孚里他们的新房。顿时爆竹喧天,欢声载道。之后,开始大摆筵席,招待各方来宾。据说喜筵是流水席,即客人凑齐一桌便开,吃完了即走,如此周而复始,整整吃了好几天,开销巨大,另外客人走时,杜月笙每人还给予二十大洋的旅费。

婚后,沈月英就为杜月笙生了个儿子,这就是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为使杜月笙更忠心为自己服务,黄金荣、林桂生一定要把杜月笙的儿子过继给他们,杜月笙则以为攀上了高亲,乐得这样做。从此后,杜

月笙依赖于同黄金荣的特殊关系,世面越做越大,开始成为上海滩上受人恭维的角色,并逐渐从黄金荣那里脱离出来。沈月英在杜家当太太,什么事都不要操心。但她的身体十分孱弱,常常生病。为了祛除病苦,她染上了鸦片瘾,闲来即抽。两三年下来,瘾越来越大,精神越来越萎靡,情绪越来越低落。沈月英的母亲,住在杜公馆对面的一条弄堂里。她出门走两三百步路,就可以去跟母亲相聚。但鸦片使她性情懒堕,最后竟长期不下楼梯,一直躺在楼上,只管抽鸦片解闷。抗战爆发后,杜月笙及一些家人避居香港。沈月英因鸦片剥夺了她的健康与热情,根本无法、也不愿意出远门,所以她仍然留在上海。毒素加速了她的死亡。1938年底,她旧病复发,身体衰弱不堪,杜维藩夫妇整日侍候,但沈月英终于没有抵抗住毒素的侵害,不久死去,这年她才48岁。

关于沈月英之死,另一种说法是,沈月英因不堪杜月笙虐待而死。早年,杜月笙听说沈月英与他的一个兄弟有暧昧关系,一气之下,便指使他的爪牙把这个兄弟的脚活活打断,而把沈月英关进杜公馆顶楼的一间小屋里,一关十多年,直到杜维藩结婚才放出来。这个兄弟脚断后不久便死去,沈月英长期住在公馆顶楼心情极为恶劣,长期的精神压力加上鸦片的毒害,摧毁了她本来就比较孱弱的身体,放出来不久便死去。这种说法在杜月笙原来的朋友范



姚玉兰化装成难民赴重庆后摄

绍增的回忆录中有记载。

喜新厌旧 一年连做两回新郎

民国七年(1918年),杜月笙追随黄金荣春风得意,逐步形成自己的势力。这年上半年,他娶了陈氏,下半年又娶了孙氏,连续第二第三次做新郎。随着势力的膨胀,杜月笙对逐渐失去姿色的沈月英已看不上眼了,要换新人。他找了个借口,一天,他把沈月英带到家里的保险柜和钱箱面前,打开了保险柜和钱箱,呈现在眼前的尽是金银元宝、金条、钞票、存折……把没有见过多大世面的沈月英看呆了。以杜月笙的说法,他的门人的工资及各项开支都在这保险柜和钱箱内,非同小可,所以希望沈月英来掌管钥匙。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事不算难,但对身体孱弱、性喜清静的沈月英来说,不能不说是个负担。每天,不知有多少人要她打开保险柜取钱。半个月下来,沈月英不胜其烦,直截了当让杜月笙把钥匙拿回去。杜月笙知道沈月英难以胜任,接过钥匙乘机说:“我看,我要去讨两房小,专为帮你的忙。”知道杜月笙为人的沈月英自然不敢阻拦,她头也不抬说:“有本事你就去讨。”这种本事杜月笙有的是。这样,杜月笙在一年内顺利地做了两回新郎。陈氏当时十五岁,来自苏州农家,婚后为杜月笙生下了二儿子杜维恒、五儿子杜维翰、六儿子杜维宁。这兄弟三个后来都在美国求过学。接着在下半年,一些好逢迎吹拍之徒,看中了一个同样来自苏州的女孩,姓孙,介绍给杜月笙。杜月笙满心欢喜,娶了孙氏做三太太。孙氏为杜月笙生了三儿子杜维屏、四儿子杜维新。抗战时期,孙氏带两个儿子赴伦敦。后杜维屏和杜维新又到美国求学。杜维屏入学于著名麻省理工学院,专攻纺织工程。抗战胜利后,杜维屏涉嫌投机牟利,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尽管他本人宣告无罪释放,他的宏兴公司则受到吊销牌照和依章罚款的处分。当时的杜月笙很想为这个引以为自豪的儿子开脱,无奈那时他的势力已是日薄西山,不堪与呼风唤雨的三十年代相比,儿子的事他已难以帮忙。

颐指气使 强娶名伶姚玉兰

民国十八年(1929年),杜月笙42岁。这时他已形成他的政治势力,成为同黄金荣并驾齐驱的流氓大亨。他又看上了一位红极一时的名坤伶姚玉兰,千方百计霸占她。这一年,黄金荣开设的黄金大戏院,请



杜月笙在香港所摄之家庭照。前排右起姚玉兰、杜月笙、孟小冬,后排右起杜维善、杜美霞、杜美如、杜美娟。

来了三位久负声望的名坤伶演出,她们是三母女。母亲小兰英唱老旦,大小姐姚玉兰唱须生,二小姐姚玉英唱武生。尤其是母女三是梨园世家,做唱俱佳,毫不比别的名伶逊色,她们挂牌同台演出,空前绝后,一时轰动了上海滩,黄金大戏院场场爆满。

流氓出身的杜月笙,尽管没有多少文化,亦较喜欢西皮二簧。听说黄金大戏院请来了两位年轻貌美又是唱戏的生角,禁不住要去一睹为快。果然与众不同,头一天看姚玉兰的戏,他便深深地迷上了姚玉兰,产生了霸占为妻的念头。以后只要有姚玉兰的戏,他每场必到,甚至在百忙之中只要姚玉兰的戏快上场,他就什么都不顾,驱车疾驶,赴黄金大戏院为姚玉兰捧场。捧了一阵子,见姚玉兰毫无反应,便急不可耐,跑到后台拜访,竭力恭维三母女,想讨得她的开心。

讲究老规矩的老太太，走过多年江湖，一眼便看穿杜月笙的用意，因此形影不离保护姚玉兰姐妹俩。杜月笙来后台求见，姚玉兰或是避而不见，或是笑而不答，一切都由老太太来应付。杜月笙对此干着急但又不敢造次，因为三母女毕竟是黄金荣请来的，总还得给黄金荣面子。整日为占有姚玉兰又得不到手而烦恼的杜月笙，忽有一日打听到了黄金荣的儿媳李志清，因业务上的需要，同姚玉兰母亲来往较为密切。何不请李志清代劳，让她给老太太疏导疏导？主意已定，杜月笙去黄金荣公馆找李志清，把自己的心思和盘托出。李志清已略有所闻，见杜月笙来求助于自己，正好乐得顺水推舟做个人情，一口答应了下来。

不久，李志清代杜月笙向姚玉兰求婚。三母女虽有所防备，但仍有些手足无措，很为反感。试想，姚玉兰正值豆蔻年华，花容月貌，虽说是待字闺中，可是，拜到她石榴裙下面的少年弟子，又何计其数！而杜月笙已四十有二，一个半老头子，流氓出身，且已有妻妾三房，嫁给这种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三母女越想越不是味。但她们太了解杜月笙的为人，杜月笙在上海滩呼风唤雨，能量极大，如果他们说不字，不要说在上海滩继续唱戏，甚至还有生命之虞。万般无奈之下，只能答应杜月笙的求婚。经过李志清的往返折冲，几经交涉，姚玉兰和她母亲，终于开出了“最低限度”的成婚条件：一是公开宴客成亲；二是必须和杜公馆里的前三位妻妾分开居住。这条件对有钱有势的杜月笙来说，简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杜月笙信誓旦旦，保证一旦同姚玉兰结婚，将跟姚玉兰白首偕老，决不会把姚玉兰当偏房。杜月笙在法租界的辣斐德路辣斐坊16号，租了一幢豪华考究的西式洋房，在那里举行婚礼，大宴宾客。终于如愿以偿，将楚楚动人又唱有一口好戏的姚玉兰弄到了手，做了第四回新郎。

姚玉兰嫁给杜月笙后，便告别了舞台生涯，无可奈何在家当杜太太，使得海上戏迷怅然若失。不到一年，姚玉兰为杜月笙生下了第一个女儿杜美如，以后又生了第二个女儿杜美霞、七儿子杜维善、八儿子杜维嵩。杜月笙对大女儿杜美如钟爱有加，因为前三房妻妾生的都是公子，沈月英虽然生过一个女儿，但出世不久即夭折。有了几个儿子的杜月笙，一心想要个女儿，因而杜美如的降临使他欢喜万分。杜美如满月

那天，杜公馆又大摆宴席，甚至组织堂会，让京剧名角来演出。据上海滩人说，终杜月笙一生，他有五次极尽奢侈、大肆铺张、轰动上海滩的活动：一、杜美如的满月之庆。二、杜祠落成，众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出席落成典礼、吃了三天三夜流水席、唱了三天三夜堂会戏。三、陈氏夫人三十岁生日，借戈登路一连唱了三天堂会戏。四、杜维藩的婚礼，包下了新新公司演戏宴客。五、杜月笙的六十生日，又有许多国民党重要人物从南京赶来祝贺，摆堂会十天。而这一切奢侈气派的活动，是以杜美如满月那年开始的。

风烛残年 暗纳名伶孟小冬

杜月笙第五次，也即是最后一次做新郎是在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地点不是在上海，而是在香港坚尼地，新娘是京剧名角孟小冬。在此之前，沈氏、陈氏、孙氏都先后失宠。姚玉兰毕竟是唱京戏的，姿色不减，见过世面，里外都有一手，杜月笙虽说较为喜欢她，但当他遇到京剧名伶孟小冬时，又喜新厌旧，性情别移，迷上了孟小冬。

一个是令人恐惧的黑社会头目，一个是名震梨园的京剧坤伶，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呢？

孟小冬出生于梨园世家，自她上溯，三代中有9人唱戏谋生，其中有5名须生。孟小冬伯祖孟六，须生；祖父孟七，武净；伯父孟鸿茂，丑角；孟鸿涛，丑角；孟鸿荣，老生兼武生；孟鸿芳，文武丑；父亲孟鸿群，老生兼武生；堂兄孟小帆，老生兼武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孟小冬受到了浓烈的熏陶，从小学习京剧唱腔。她天资聪颖，为人谦虚，成名甚早。尤其是她拜梨园内独一无二的京剧须生泰斗余叔岩为师，前后共五年，使她倍受教益。当时有许多人想拜余叔岩为师，均遭回绝，因为余认为要传授弟子，学得精髓并有所创新，必须要选择良料，否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劳而无功。他看中了孟小冬，认为孟小冬一切条件接近他的戏路，因而悉心加以培养传授，使学有根底的孟小冬更上一层楼，被认为是余派唯一得到衣钵真传的人，一时名震大江南北。1926年，孟小冬与京剧海派艺术创始人梅兰芳相爱而结婚，这一桩姻缘却以离异而告终。当时北平市市长的公子怨于梅兰芳夺走了他的“未婚妻”而大怒，怀里揣着枪闯进梅兰芳的家中。当时气氛十分紧张，梅兰芳在他的一位朋友帮助下逃走，而这位朋友则被这位已失去理智、恼羞成怒

的公子打死。这件事使梅孟婚姻蒙上一层阴影,最后被迫分离,黯然分袂。此后孟小冬在艺坛上挣扎有年,经历了人生种种磨难。杜月笙早就闻知孟小冬大名,对孟小冬垂涎已久。得知梅孟离异后,杜月笙不顾自己已有四房妻妾,对孟展开了追求攻势,孟小冬虽然名气颇大,但在艺人没有社会地位的年代,如何能对付得了杜月笙这个从社会最底层冒出来的流氓大亨的软磨硬缠?!另一方面,孟小冬从自己的曲折经历中认识到,社会地位低的艺人,在黑暗年代需找一个靠山,以避免各种是是非非,所以孟小冬权衡再三,不久便同杜月笙同居,后来,生下了杜月笙最小的女儿,取名为杜美娟。但这次杜孟结合没有明媒正娶,也没有举行仪式。

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三日(1947年),正是杜月笙六十岁生日,自然又要大肆地热闹铺张一番。此时杜月笙患有严重的哮喘疾病,一切宴庆事务由金廷荪负责,大批艺人赶来助兴,恰巧伶王梅兰芳为杜月笙的六十庆宴亦来沪。好事的上海小报、杂志,在杜月笙六十生日的盛大公演之期,怎肯放过孟小冬、梅兰芳同期演出这一千载难逢的花边新闻?!当即有人建议,在杜月笙六十庆宴堂会戏中,让孟小冬梅兰芳合演一出四郎探母,请孟小冬扮杨四郎,梅兰芳饰铁镜公主。然后再叫铁镜公主梅兰芳给四郎孟小冬屈膝告罪请一个安,念一句:“咱得罪您啦,在这儿给您赔礼!”过去的夫妻然后相视一笑,过去的一切恩恩怨怨,不就了结了么?这些报纸不遗余力地企图撮合这对拆散二十年的鸳鸯,因为事实上孟小冬只是跟杜月笙同居,而未举行婚礼。这使杜月笙十分恼怒、烦闷、但好在梅兰芳已有妻室,再说在上海滩他杜月笙的势力范围之内,谅梅兰芳也不敢轻举妄为。孟小冬出于为梅兰芳着想,向杜月笙提出回北京料理诸事,一下使“梅孟重圆”的企盼成为泡影。

孟小冬进入杜门以后,同姚玉兰一样,被迫放弃钟爱的京剧艺术,照料杜月笙,这使众多崇拜孟小冬的戏迷扼腕惋惜。孟小冬则在杜月笙卧床至死前几年,常常眉宇紧锁,愁云布面。好多事情萦绕在她心头,使她长期郁郁寡欢,不能解脱。杜月笙晚年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卧榻病床,孟小冬每天任务便是给杜月笙送茶端饭,煎药侍候。这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一日二十四小时,常年累月,没有一时一刻可以轻松。

她花容憔悴,时常还要听到各种风言风语,同姚玉兰的关系亦不和。在杜公馆这么一个紊乱复杂的环境,长伴一位风烛残年的病老头,对她而言,实在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何况,孟小冬虽然已进杜门,并为杜月笙生下女儿杜美娟,却始终没有正式举行婚礼,两人之间的关系至今不明不白,自入杜门后,孟小冬没有一日分享过杜月笙的荣华富贵,也不曾有一刻得过杜月笙的亲怜密爱。她在杜门逐渐消瘦,尤其是关于自己在杜家身份这问题,为自己、也为自己女儿的将来,使她决定要在适当的时机提出来。

1949年,大陆解放,杜月笙及家人逃往香港,永远离开了他发迹的上海滩。他之所以不去台湾而去香港,乃是因为国民党蒋介石认为他已无多大用处,并不欢迎他去台湾,所以杜月笙在香港相当于避难,日子不好过。1950年,杜月笙举家准备迁往法国定居。某天,杜月笙当着全家人屈指细算去法国需要多少护照。这时,冷不防孟小冬插进了一句,问道:“我跟着去,算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这简短几句,吐出了孟小冬积压心中多年的郁闷。多年来,杜月笙很少为孟小冬考虑,对他来说,女人不过是玩物,随自己的意愿处理。孟小冬话中含意,他自然明白。怎么办呢?举行婚礼吧,自己身体衰弱不堪,力不从心。不举行吧,又担心孟小冬产生严重的怨恨心理,而他目前又离不开手脚麻利的孟小冬的服侍。考虑再三,杜月笙决定排除杜公馆内的阻力,同孟小冬尽快成婚。

主意已定,杜月笙吩咐总管万墨林赶紧筹办婚事。由于杜月笙病魔缠身,出不了门,婚礼决定在杜公馆内举行。杜月笙让万墨林渡海到九龙饭店,把饭店内的名厨师一一请到公馆内,由他们掌勺烩菜。结婚那天,杜月笙邀来了自己的亲朋好友,足足有十多桌喜筵,冷清多时的杜公馆终于又有了一点热闹气氛。当然这种回光返照难以与当年相比。这天他强打精神勉强由人搀扶着他瘦骨伶仃的身体,穿着长袍,佩着红花,同孟小冬站在客厅内迎接宾客。客人们到齐后,杜月笙命自己在港的所有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跪在孟小冬面前,让他们一一喊孟小冬“妈咪”,孟小冬则送他们每人一份礼物:女儿、媳妇是手表一只,儿子、女婿一人一套西装料子。孟小冬终于确立自己在杜门中的地位,杜月笙则预感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婚礼,将来的日子看来不长了……(下转 30 页)

戴笠的情妇 忆戴笠

● 李佳

1941年12月26日香港沦入日军魔掌。

这一天,在香港高级住宅区弥敦道银洋台的一幢花园洋楼,来了一队日本宪兵,他们用皮靴狠劲踢开紧闭的大门,直冲室内,将这幢洋房的女主人拖上囚车,呼啸而去……

那么这幢洋房的女主人是谁呢?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情妇陈华,下面就是陈华本人与戴笠交往的一段秘闻。

色艺双全的红牌妓女

陈华,1906年生于上海小西门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本姓陈,原为南京人,少年时到上海一个裱画店做学徒,后入赘做了严家的女婿。陈华的父母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吸鸦片。夫妻整天躺在床上吞云吐雾,生下孩子,若是女的,便丢进小盆里,不闻不问,直至死掉,裹张破草席,扔弃到乱坟堆里完事。到1906年冬,陈华出生时,前面已生了5个女孩,只侥幸活下一个。母亲生下陈华,发现又是一个女孩,便丢进小盆里,由她冻死饿死。偏巧陈华命大,寒冬腊月,一夜下来竟还活着!父母不禁动了恻隐之心,留下了这条幼小的生命。靠着一位好心邻居大婶的哺育,陈华长到2岁。父母又将小陈华当为累赘,送到浦东乡下外婆家。外婆此时已有79高龄,十分厌恶陈华父母这对被她称为“烂料”的败家子夫妻,便迁怒于陈华,加之老人生性吝啬,对外孙女更是漠不关心,不理不睬。

陈华在外婆家饥一顿饱一顿转眼10岁了,外婆去世。她又回到那个同样没有温情的家。又过了3年,父母坐吃山空,为买鸦片,竟债台高筑。为躲债,不得不带着陈华和她姐姐举家南迁来到广州。这对夫妻为满足自己吸鸦片,先将陈华的姐姐卖入广州妓院,又将年仅13岁的陈华以100毫洋的价钱卖到惠州妓院,一年后又转卖到广州最大的妓院倚红院。由于陈华早熟,十四五岁时已出落的十分水灵可爱,很快成为那儿色艺双全的红牌名妓,艺名“仙女”,专门陪伴



上海警备司令夫人时期的陈华

前来拈花惹草的达官显贵和纨绔子弟。

醋海生波的司令夫人

1920年,陈华结识了前来倚红院风光的“国父”孙中山的保镖杨虎,一个是含情脉脉,一个是血气方刚,双方一见钟情,两年后,结为夫妻。陈华由风尘女子一跃为司令夫人,人生轨迹发生了戏剧性转变。

杨虎,字啸天,安徽宁国人,1889年生,毕业于南京将弁学堂。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任江苏军总司令。响应孙中山,起兵讨袁。后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兼代理海军总司令。1918年任广州大本营参军,1922年任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参军。陈、杨结婚时,陈华16岁,贵为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的杨虎34岁。红牌妓女“小仙女”一夜之间尊为堂堂司令夫人,过上了仆从如

云，一掷千金的豪华生活。

婚后，两人着实做了一段时间的恩爱夫妻。1927年4月，杨虎协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陈华亦协助丈夫，出资觅工缝制大量青天白日国民党旗，发交反共游行队伍使用。6月，杨虎因“清党”有功，任上海警备司令，成为操有大上海生杀予夺大权的显赫人物。当时上海滩上有“狼虎成群（杨虎和陈群，当时陈任警备司令部特别军法处处长），神鬼皆惊”之称。夫贵妻荣，陈华也成了上海大小闻人争相巴结的对象。1928年10月，杨虎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随着地位的升迁，杨虎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移情别恋，接二连三地娶进姨太太，陈华和杨虎之间的感情出现了危机。一次，陈华为阻止杨虎纳妾，竟状告到了杨虎的结义兄弟，上海黑社会头子黄金荣那里，惊动这位“大老板”来做调解人，但也未能使破镜重圆。至此，五年恩爱一去不返，夫妻情绝，两人从此长期分居，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军统老板的红粉知己

1932年，陈华26岁，就在这一年她与戴笠相识，直到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两人保持了长达14年的密切关系。

或许是陈华为了报复杨虎的恩断情绝，或许是戴笠被陈华的不同于一般贵妇的坎坷身世和刚毅泼辣性格所吸引，两人一见如故，关系很快如胶似漆。

戴笠一向是玩弄女性的老手，和他有过一夜风流的美丽女人不计其数。但戴笠和陈华之间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却一直保持到戴笠坠机身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陈华是个相当能干厉害的角色，此时虽是个被遗弃的杨司令夫人，但由于过去经常与杨出入于上流社会，看多了宦海沉浮，深谙官场内幕，交际应酬功夫圆熟，社会关系广泛，甚至和黄金荣以兄妹相称。加之出手阔绰，各色人等均有结交。和戴笠结识后，陈华调动自己的一切关系，四处活动，为戴笠的特务组织招兵买马。陈华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找到当时还是中共党员的大学毕业生刘戈青，威逼利诱，许以高官厚禄，游说其脱离共产党，投靠国民党，为戴笠效命。刘戈青叛变后，拉拢了一批意志薄弱的中共学生党员，陈华感到这帮人可资利用，便多次将他们召到虹口公园的一个亭子里，在夜幕的掩护下，煽动他们投靠国民党。而且留下9个“中坚”分子，让他们住在自己在上海的花园洋房里，供吃供穿，一连好几个月，接受戴笠的“考验”。考验完毕，戴笠对这9个叛徒相

当满意，编派到杭州和南京的特务训练班受训，受训结束，陈华又按照戴笠的吩咐专程赴南京带领他们在中山陵宣誓效忠国民党，以后这9人成为军统中的骨干分子，号称“戴老板的九个火车头”。9人为感激陈华举荐，亲昵地称呼她为“杨家姆妈”。从此，陈华在军统中开始小有名气起来，戴笠亦对陈华另眼相看。为表彰陈华“举荐有功”，特地将她请到南京自己的寓所鸡鹅巷53号，还请自己母亲亲自下厨做了几样家乡菜招待陈华，就在这段时间，戴笠向陈华表示，“我一生一世就只爱你一个”。当时的戴笠权势日盛，虽生性贪色，仍有许多女人以得到他青睐为荣。岂料陈华拒绝了他的求爱。是欲擒故纵，还是真心不愿，只有陈华自己明白，外人便不得而知了。反正当时无论戴笠怎样恳求，陈华硬没有松口。后来，戴笠将陈华玩到手后，半开玩笑地对她说：“我一生一世，就只碰过你的钉子。”然而，正是陈华的与众不同，吸引住了戴笠，使得戴笠能够与她保持超过他的任何情妇的长期亲密关系。那段时间，两人在南京戴笠为陈华安排的别墅内常常耳鬓厮磨，互诉衷肠，引为知己。

1935年春，戴笠、陈华和陈华的闺中密友老牌电影明星许莺莺在陈华的豪华卧室内，仿效“桃园三结义”，写下兰谱，结为兄妹，并拍照合影留念。陈华逐渐成为戴笠“事业”的助手。这年陈华29岁，体态丰满，别有一番少妇丰韵。

就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国民党内部英美派和亲日派矛盾日趋激烈。7月，亲日派头目汪精卫和孙科，为避开蒋介石的监督，自沪飞抵青岛“养病”，以便与日本暗送秋波。8月7日汪精卫通电南京政府，请辞去所担任的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务，以要挟陈华（左）和戴笠早年情妇罗二小姐蒋，蒋汪矛盾冲突尖锐，剑拔弩张。蒋介石为缓和与汪的白热化关系，急欲打探汪精卫的底细及打算。号称“蒋委员长忠实走狗”的戴笠秉承蒋介石旨意，派陈华赴青岛设法了解汪精卫的情况。

陈华为遮



人耳目,宣称在上海呆腻了,要到海滨城市青岛去避暑,一行浩浩荡荡住进德国人在青岛创办的一所高级疗养院内。她们的住所与汪精卫的宅院仅隔一个菜市场。但是汪精卫等人在青岛深居简出,加之卫队防守严密,外人很难接近。陈华便对这个菜市场打开了主意。汪宅内经常进进出出、与外界接触最多的是天天光顾菜市场的大司务和配菜女佣。他们均是广东人。陈华由于曾长居广东,会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于是陈华换上佣人的衣服,事先买通卖菜的小贩,了解汪府买菜的时间、经常光顾的摊头,讲定只要她们来买菜,就价钱减半。这样一来二去,陈华和汪府的佣人攀上老乡,无话不谈。陈华从大司务那里探听到汪精卫有意回归中央,向蒋介石妥协,便密电戴笠。8月17日,蒋介石派张群带着亲笔信赴青岛“慰留”汪精卫,汪精卫顺水推舟,应允返京复职。陈华随即返沪寓所。蒋汪矛盾暂时缓和,蒋介石终于渡过一次严重的政局危机。由于戴笠及时提供情报有功,蒋介石大加赞赏。戴笠特地从南京到上海向陈华当面道谢。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诚在临潼华清池下令扣留蒋介石,举国哗然。陈华审时度势,认为这是戴笠效忠的好机会,便力劝戴笠与宋美龄、宋子文等同赴西安,以表其对蒋的“忠勇”。戴笠此行得蒋赏识,被蒋视为心腹人物。从此如青云直上,更加飞黄腾达起来。事变后不久,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宏恩医院动手术,其间陈华天天去医院探望,还将自己厨师做的菜肴亲自送去给戴笠换口味。



曾有人说戴笠是蒋介石身旁的一支利刀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8月,上海沦陷。陈华在戴笠的安排下,移居香港,住进弥道银洋台的一幢豪华花园洋房内。一年后,国民政府内迁重庆。戴笠随同蒋介石来到重庆,赴渝前,戴笠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组织建立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军统)。赴渝后,戴笠专心经营军统,特务组织日益扩大。在此期间,陈华与他相隔千里,但戴仍念念不忘这位红颜知己,两人频频函电联络。他还曾电邀陈华赴渝相聚3次。只要陈华一来,那位当时与他打得火热的电影明星便在他的安排下从官邸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陈华被奉为曾家岩戴公馆的座上客,戴笠忙着她大摆宴席,接风洗尘,并全程陪同游览重庆市郊风景名胜,殷勤非常。当时戴笠和孔祥熙为争权夺利,一度关系紧张,孔祥熙为培植与之抗衡的实力,拉拢陈华的挂名丈夫杨虎在他的重庆官邸范庄悄悄办起特务训练班,准备相机取戴而代之。戴笠探知这一消息后,深为不安,授意陈华以杨太太的名义进入范庄,面见杨虎,谎称戴笠已对其举动了如指掌,并制定了防范措施,陈华向杨虎晓以利害得失,杨虎觉得不是戴之对手,偷偷解散训练班了事,戴笠自然又对陈华感激不尽,恋恋不舍地将她送回香港。

由于陈华与戴笠的特殊关系,引起日本谍报机关的注意。香港沦陷后,她便以“戴笠情妇、蓝衣社核心人物”之名被日军逮捕,辗转香港、广州、上海,受尽凌辱与折磨,终于死里逃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戴笠到上海探望一别四年的陈华,这时正值陈华养女结婚,戴笠特意订做一对金笔,上刻“必(笔)定如意”四字,以示贺喜,来博得陈华的欢心。一年来,两人时有相聚。由于陈华为戴笠扩充势力立下“功劳”,又为了戴笠吃尽了日本人的苦头,戴笠曾不止一次地对陈华说:“陈华,我的天下,有一半是你替我打出来的。”

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座机在江苏南京江宁县板桥镇岱山坠毁,戴笠身亡。戴笠死后,陈华失去靠山,交际应酬场上很少露面。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府撤台,陈华迁居台湾,深居简出,从热闹场合销身匿迹。1949年后,其前夫杨虎寓居北京,后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

随着岁月的流逝,昔日的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荡然无存。晚年的陈华,孑然一身,寄居在台北一所养老院里,80高龄的老人,每每回忆起那些与戴笠的恩恩怨怨,总是淡淡一笑,呢喃自语道:“人总是有一死的,人死了,就让一切的一切都成为过去吧。”

(责任编辑 海 鸣)

话说孙权的妹妹

安徽马鞍山 李光斗

说起孙权妹妹,《三国演义》称她为孙夫人。在戏剧舞台上给她取名孙尚香。其实她的真正大名,从《三国志·吴书·孙坚传》中便可查出,叫孙仁。她是孙坚正房夫人吴氏所生的女儿。吴氏夫人一共生了四男一女。四个男孩,都是当时有为的人物。特别是长子孙策、二子孙权,在东汉末期群雄割据的争战中,创建了江东帝业。而唯一的女儿孙仁,由于出自将门,也非等闲之辈。《三国志》虽未给她专门立传,但从《清正传》和《赵云传》中,仍可透视到她并非一般的千金小姐,而是敢于卷进历史潮流,去拼搏的一位杰出女性。

她自幼聪敏好学,习文练武,更兼性格刚强猛勇,故史书上颂扬她有“诸兄之风”。但由于历史环境的局限,使她不能如同诸兄一样,在疆场上一展巾帼才智,而是踏上了和亲的另一征途。就在孙权与刘备进行的一场政治联姻中,孙仁确也发挥了她胸中的智能,将号称枭雄的刘备紧紧地制约住。从而使孙、刘两家军事联盟,曾一度得到巩固,达到了一致对付势力强大的北方曹操,为后来形成三国鼎立的政局,奠定了基础。

建安十四年(209年),孙、刘联军在已经获得赤壁大战胜利后,孙权由于畏惧曹军的卷土重来,又顾虑占有荆州四郡领地的刘备放弃军事联盟,增加威胁力量。因此为了稳住刘备,使其不产生异志。

孙权便对刘备作了两件当时有益巩固自己江东基业的大事。一是妥协地应刘备的要求,将荆州东吴占有的其余郡地暂且“借”给他。二是效法两汉和亲,安定边疆的策略。主动将妹妹孙仁,远嫁给刘备为妻。

孙仁是孙坚唯一的幼女。孙坚阵亡于初平三年(192年),到公元209年,孙仁出嫁时,相距17年,因此推测孙仁当新娘,芳年当在18岁。而这位豪情满怀的二九丽妹,怎能甘愿屈身嫁给岁近半百的老头刘备呢。其原因自然有遵守封建礼教的一方面,那就是承受了孙权这位长兄如父之命。但根本原因,是她有志于保卫父兄用生命换来的江东基业,去执行孙权交给她牵制刘备的任务,以达到牢牢地巩固联盟的政治目的。这一点,从她结婚后,在刘备新建的荆州首府公安(湖北公安),与刘备相处近三年时期内的所作所为,可以证实。她是胜任地牵制住了刘备。

孙仁与刘备结婚,前往荆州的并非单人匹马,而是带了一大批官员和士兵组成的护卫队伍。光她贴身的武装女卫士就有一百多人。而这些手执刀剑的女卫士,成天侍立在她的左右,弄得戎马一生的刘备,每天都是胆战心惊地踏进府院大门。诸葛亮对刘备当时的心情,曾作过评述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疆,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这就是说,刘备除了畏惧曹操强大势力的入侵、孙权的威逼,还成天担心身傍的夫人搞政变。

那么孙仁是否能搞一场政变,确也不能排除。因为《三国志·蜀书·赵云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先主入益州,云领留营司马。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孙)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这全可看出,她带去的众多东吴官兵在她的纵使下,作出了许多不利于荆州安定的事。这才出现了诸葛亮的分析和刘备的深虑,并及时采取了防范措施,让精明能干的赵云掌管内务。

刘备亲率军前往益州,孙仁一时失去了牵制的作用。孙权便策划派大批战船赴荆州接孙仁回东吴。其用意,当可看出是牵制刘备的另一方案:取回夫人作为人质。这一计谋,聪敏的孙仁看出了不可能奏效,她心里明白,刘备和她并无真诚的夫妻感情。她绝不能起到以人质牵制刘备的作用。于是想到一位全可当作人质的对象,就是刘备当时唯一的四岁儿子阿斗。若果能将阿斗带回东吴,就能迫使刘备为赎回自己的事业继承人而作出多方面的让步。并且她自己也有被刘备迎回,起到继续牵制的作用。这样一来,对东吴政权和本身都更有益。

但当她得意地携带阿斗上船、扬帆返东吴时,被早已防范的赵云察觉,率水军截江阻拦,并在张飞协助下将阿斗夺回。照当时的情景,双方都是武装接触。孙仁当不愿轻易放弃已载入船中的人质阿斗。而赵云、张飞又急于救回小主人。自然会出现双方据理力争以至发展到武装冲突的地步。孙仁虽武功也不凡那能敌得过赵云、张飞两员当代名将?!便以失掉阿斗,这位小人质而结束孙、刘两家不愉快的兵戎相见。从此也结束了孙权对刘备的牵制。而胸怀巾帼壮志的孙仁,更是遗憾地从历经三年的政治舞台上跌下来,销声匿迹了。

应当说,年仅21岁的少妇孙仁,返回娘家东吴后,虽说牵制刘备的策略宣告失败,但是她的巾帼壮志是不可能一下就消失的。他还盼(下转36页)

「文化大革命」中的改名风潮

白丁

南京是一座有 2460 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它的许多路名、街巷名、坊里名已相沿几百年甚至千余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座古都城市的历史面貌和风土人情，有的还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例如长干里、金陵岗展示了南京的古老文化；午朝门、御道街留下了京都遗迹；莫愁湖、桃叶渡牵连着动人传说；商埠街、大马路则记载了近代中国人民遭受列强凌辱和对外开放的历史。这些有着丰富文化内涵而又流传久远的地名，是南京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就本世纪六十年代爆发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的区名、路名和相当一部分街道名以及商店名、工厂名、学校名都遭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冲击。一些沿用已久的名称甚至百年老店的商号，被当成封、资、修的象征而加以清除。为此，曾一度使邮递员感到不便，失散多年的亲人骨肉团聚增加困难，“老南京”一时成了陌路人。经历过这场风波的人，至今记忆犹新。

这场风潮的起源，是 1966 年 8 月 18 日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受到的一次接见，第二天北京的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就走上街头“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几天内，在王府井大街和其他一些街道上，各种标语贴满墙壁，路名牌和商店的招牌全部被砸，并且换上了新的名字。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道”，外国使领馆区的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被改名为“反帝路”和“反修路”。这样一来，市内叫“东方红”的大街不下 5 条，叫“红旗”的店铺不下 50 家。连百年老店荣宝斋、全聚德也被分别改名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和“北京烤鸭店”。8 月 22 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率先播送了“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消息。当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登载了这条消息和《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工农兵要坚决支持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把这场风潮推向全国并升温达到沸点。

南京的改名风潮，比起北京来毫不逊色。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区名、路名、街道名、公园名都已面目全非，许多商店、工厂、医院、学校、影院、剧场都纷

纷换上了富有“革命性”的新名。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修筑的中山路，被改名为“人民路”，中山南路和中山北路，自然就改成了“人民南路”、“人民北路”，而中山东路却改名为“东方红路”。太平路改为“反帝路”，中央路改为“大庆路”，莫愁路改为“四新路”，小营路改为“长征北路”，御道街改为“工农兵路”，后宰门大街改为“东风路”。贯穿于南京主干道上的新街口、鼓楼、山西路、热河路 4 个街心花园，也被分别改名为“东方红广场”、“人民广场”、“红卫兵广场”、“解放广场”。连 1955 年 8 月经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命名的 6 个城区，也全部换上了新奇的名称：

秦淮区——“遵义区”；白下区——“朝阳区”；

建邺区——“红卫区”；鼓楼区——“延安区”；

下关区——“东方红区”；玄武区——“要武区”。

其中最别出心裁的要数玄武区改要武区。虽一字之差却耐人寻味。出处是根据《人民日报》对接见红卫兵的一篇通讯报道，文中写到当国家领导人问身边的女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回答是：“叫宋彬彬”，这位领导人随即笑着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这位中学生随即就宣布改名宋要武，于是乎因玄武湖、玄武门等名胜古迹在辖区内而命名的南京玄武区，也因这段趣闻而被改成要武区达 7 年之久。1967 年 3 月，市军管会决定正式承认这 6 个城区更改的新名称。在改名风潮中，玄武湖、莫愁湖被冠以“人民公园”与“四新公园”。大华、胜利、和平、下关、明星等影剧院分别被“东方红”、“人民”、“战斗”、“渡江”、“红星”所取代。美国人马林创办的鼓楼医院被改成“反帝医院”。百年老店盛锡福改为“人民帽店”，张小泉改为“南京刀剪店”，三六九、马祥兴分别改为“工农兵饭店”和“回族饭店”。一条街道，往往同叫红旗、人民或工农兵之名的商店有十余家。许多工厂也纷纷用人民、曙光、战斗等字眼取代原来的厂名，连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中国”、“江南”两水泥厂，都被分别改为“东方红水泥厂”和“红旗水泥厂”。改名风潮也波及到学校，不少中学改称××军校或××战校，其中最耸人听闻的是南京某附中，竟挂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备战军校”的牌子，此举令路人惊叹不已。也许是改名者自感火药味太浓，后又改为“鲁迅中学”。这场改名风潮来势凶猛，以后逐渐冷淡，直至 1973 年 11 月，市革委会下文将已更改的区名、路名、公园名恢复为原来的名称。

太平天国国医李俊良

许自强

太平天国于1853年2月在南京建都,称为天京。东王杨秀清总理朝政,建立各种制度,卫生机构分朝内、军中和居民三部分。

国医衙是太平天国的中央卫生领导机构,与历代的太医院相似,分设大方脉、小方脉、内科、外科、眼科、妇科和小儿等科,既是医疗单位,又是卫生行政总枢纽。设在评事街富户胡姓宅内,《首都志》也有记载。

太平军中有拯危衙、内医衙、掌医衙、功臣衙和能人馆,并有专人负责各科医疗护理和疗养工作,分工明确,互不推诿,并为天京居民提供医药,每年春季还为百姓施种牛痘,预防天花。

1851年,永安(今广西蒙山县)一带时疫流行,太平军不少官兵得了疫症,病情蔓延,并且病死者时有发生。天王洪秀全本人也未幸免,病势日益严重,当时在太平军中有一个叫李俊良的中军长,因擅长医道,平时军中有人生病,都请他诊治。这时有人推荐李俊良为洪秀全治病,李俊良在药物缺乏的条件下很快将天王的病治愈,于是洪秀全就决定李俊良负责在全军中为官兵治病,这样疫情很快得到控制。李俊良就此封为国医。

李俊良,生年不详。原名俊昌,参加太平军后,因避北王韦昌辉讳而改名。广西桂平县人。早年在家经营药铺,擅长脉案,还是一个殷实商人。

李俊良受了洪秀全上帝会的宣传影响,一心向往太平军,放弃了自己的药铺生涯,毅然投身在太平天国,原先是任中军长,后改任军师、国医。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李俊良擢升检点,不久加丞相衔,总管天国医务工作,是太平天国设置朝内医官之始。

有一年春天,天京流行红眼病,老百姓有成千上万的人害眼病,就连天王也染上了眼病,北王韦昌辉下了一道诫諭:“凡是能为天王治好眼疾者,将有赏银一千两。”诫諭四处张贴,没一两天,有个名叫张铎的前来报名应征。此人四十多岁,身穿布袍,举止文雅,

一副书生打扮。据他自我介绍,曾拜过名医为师,当过郎中,尤精眼科。韦昌辉见张铎确实精通医术,便把他引荐到王府中,替天王医治眼病。天王洪秀全为人谨慎,本不想要张铎治病,因为眼病凶猛很难忍受。便降旨召张铎进王府。天王问他所用何药,他说用什么安徽霍山的金石斛,南海的珍珠,甘肃山羊的肝等等,还要用一种特制的膏药敷贴在眼上,不消五天,药到病除。张铎正待拿出膏药时,侍卫前来禀告,圣医官李俊良在江西前线奉翼王石达开之命,星夜兼程赶回天京,给天王和军民们治疗眼病。现在王府外候旨。张铎听见后,心慌意乱。原来张铎本姓伍,名叫庆瑞,是清朝湖北巡抚伍长华的侄子。太平军攻下南京城后,伍长华一家被杀害,伍家在白下路的住宅改作北王府。伍庆瑞躲在清凉山下的一个当郎中的亲戚家中,伺机报仇。这次他改名换姓乘机钻进王府想谋害洪秀全。李俊良进了王府,探询天王病情,看了张铎开的医方,很为怀疑,细察张铎的膏药后对他说:“你竟敢用这剧毒药来害天王吗?”张铎再三强辩,李俊良指出,这膏药中有鬼头藤根研成的粉,闻上去是香味芬芳,如果这种膏药敷上眼,不消两三天,就要失明。张铎连忙磕头求饶。天王见状大怒,下令把张铎拖出王府,处以极刑。洪秀全疑心北王韦昌辉存心不良,下诏谴责,令他闭门思过。李俊良救天王有功,又替天王和王后等治好眼病,被天王晋爵为补天侯,位列名将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之上。

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天京发生变乱,韦昌辉杀死东王杨秀清,并搜捕“东党”,进行大屠杀。李俊良与扶天侯傅学贤等扎兵于峨嵋至虎贲仓一带,对韦昌辉进行坚决斗争。后在激烈的巷战中牺牲,终年仅三十多岁。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以幼主名义颁诏,复李俊昌原名,以其“有殉难之忠”,追封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杰天义。

(责任编辑 宁宁)

高淳炆器

走出国门争风流

魏希德整理

高淳炆器自1980年春季广交会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以来,现已远销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高淳炆器生产最大的厂家——高淳陶瓷厂的炆器系列产品有75%以上已进入美国超级市场,去年该厂向美国市场出口炆器西餐具、厨房杂件等成套产品近百万套,可创汇800多万美元,成为全国日用陶瓷行业对美国出口量最大的厂家。

炆器,是一种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陶瓷产品,既具有陶器的韧性和瓷器的刚性;又具有较高的耐磨、耐冲击的机械强度和良好的抗冷热急变性能;其原料所含的铅、铬等有毒杂质尤低。因而,炆器在经济、实用、美观方面不仅可以和其他陶器、瓷器相媲美;又由于自身的特点在机械化洗涤、高温消毒和微波炉加热等方面优于其陶器和瓷器,而受到国内外用户的青睐。

高淳民间早有利用红粘土烧制陶器的历史。高淳境内红粘土蕴藏量较为丰富,分布于秀山、凤凰山、龟山、土基山、十里长山;尤以秀山最丰。据初步勘探,秀山红粘土页岩与砂岩相互成层,矿体共达11层,可见厚度为700米~800米,储量约1500万吨,远景储量为4025万吨。

现今,高淳从事炆器生产的骨干企业有三家:一是建于1958年的高淳陶瓷厂,主要产品有成套、系列炆器餐、茶具;二是在高淳陶瓷厂紫砂车间基础上,于1983年扩建成的高淳紫砂厂,主要产品有工艺美术陶器、紫砂杯胆、磁化水杯等;三是在高淳紫砂厂的辅佐下,于1990年建成的“高淳日用瓷厂”,主要产品有啤酒杯、音乐茶杯等。

高淳炆器何以能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里走出国门,获得跳跃式的发展?主要经验是面向国际市场,依靠科技进步,扩大出口创汇。

1958年10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高淳县为充分开发利用秀山的红粘土资源,在秀山麓的秀山村办起了高淳陶瓷厂,农民出身的张铭金也来到厂里

当了一名制坯工,他熟知该厂的兴衰史,是炆器生产的主要创业者。当时,高淳陶瓷厂的占地面积仅78747平方米,厂房面积23573平方米,工人100多名,主要生产日用陶器、卫生陶器和耐火砖等粗陶产品,仅在本县和苏南地区销售,生产工艺是:使用畜力粉碎,手工成型,太阳干燥,土轮窑烧制,到1978年还是个产值不足百万元,利税不上五万元的陶瓷行业的“无名小卒”,在素称“陶器之国”的国度里更是默默无闻。而今已发展成高淳县唯一的国营中型工业企业,现有职工1500人,固定资产1600万元,1992年上半年,全厂完成工业产值2453万元,实现利润420万元,分别比1991年同期增长79%和162%;上缴税金106万元,出口创汇450万美元,分别比1991年同期增长110%和111%,各项经济指标名列全国日用陶瓷生产厂家的首位。

纵观高淳陶瓷厂的生产发展史,三十四个春秋成于一举:1979年,该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精神的鼓舞下,大胆采用日本70年代的炆器生产工艺,成功地研制出国内外市场上的畅销产品——炆器餐、茶具。因产品天然色泽如油茶玉色,釉面晶莹似一泓清泉,故以地近秀山的玉泉古寺命名其为“玉泉”炆器,由于产品造型独特,花面新颖,含有害杂质极低,价廉物美,经久耐用,1980年春在广交会上“亮相”后,即被国内外商户争相订购。到1984年底,高淳陶瓷厂的炆器产品品种已发展为成套餐具、茶具(咖啡具)、宾饭用瓷、陈设瓷(花瓶、花插、挂盘、奔马、猛虎、雄狮、飞鹏、游鱼等)等4大类、20多个品种、几十种花色,荣获南京市“四新”产品和江苏省优质产品奖。1981年至1985年,玉泉牌炆器共出口24861.2万件,创汇300万美元;内销850万件,多为国内宾饭、餐厅、招待所选购。1987年,为进一步争得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和满足国际市场愈来愈广泛的需要,玉泉牌炆器外销产品又以开发“91120”餐具为“龙头”发展到7个系列、40多个品种、200多种花面,在1987年

纪念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和西征 140 周年 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今年是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和西征 140 周年。由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暨南京市社联、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市文化局等共同发起的“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于五月二十六日在当年太平天国东王府——瞻园召开。来自全国十五个省市的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学者六十余人出席了研讨会。著名太平天国史学家、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名誉主席罗尔纲先生向大会发来了贺信。会议由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团成员沈嘉荣研究员主持,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团成员茅家琦教授致开幕词,江苏省委常委胡福明、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赵光德、省政协副主席卜承祖、省社科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贾轶等先后讲了话。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就太平天国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相互关系等学术问题展开研讨和交流,并对当年的重要遗址、遗迹进行考察。

(太博文)

读了江苏吴人钮琇(玉樵)的《觚剩》,看他所“剩”有关“金陵墨池”的故事,颇具情趣。故事讲的是明代夔州(今四川奉节)进士李长祥(研斋),明亡后寓居金陵,娶金陵才女姚淑为继室。姚淑善书画,尤工兰竹,有“钟山秀才”之称。她作画,画笔墨色浓淡,令身边婢女“以口受笔退其墨”,故而这位婢女被秦淮人称作“墨池”。这“墨池”恰也天资聪慧,亦能书画。男主人李长祥特赠她以“别有香口在,莫畏胭脂黑”的诗句,一时,这位“金陵墨池”誉满江南,传为文坛佳话。

古谓“墨池”本有三处:一是东汉甘肃敦煌酒泉张芝(伯英)洗砚的“酒泉墨池”,二是晋代王羲之在浙江会稽写兰亭帖(序)的“山阴墨池”,三是王羲之早年在江西临川学书洗砚的“临川墨池”。

以这胭脂香口的“金陵墨池”与之相提并论,不禁横生妙趣。翰墨香风千古流传,令人品味不尽!

钟山才女与「金陵墨池」

安徽都君萍

春季广交会上 5 天内就和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户签订成交合同 800 份。这一年,全厂共出口炆器 1000 万件,创汇 100 多万美元,跃居江苏省陶瓷行业出口创汇之首。1991 年,为使玉泉牌炆器产品出口创汇跨上新的台阶,该厂又投资 650 多万元,建成商档炆器生产线。这条生产线于当年 6 月投产后,扩大生产能力 50%,新增产量 1000 多万件,出口量增长到 2700 多万件,出口创汇突破 500 万美元,超额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第一次登上了全国 100 多家日用炆器生产厂家出口创汇的冠军宝座。玉泉牌炆器也先后被国家经贸部、轻工部和旅游总局评为优秀产品。

dfz.nanjing.gov.cn

南京市下关区市政工程管理所



所长金华(左三)向中层干部颁发聘书



地址:建宁路 182 号

电话:811682; 邮码:210015



施工机械



新建大桥南路



大桥南路下水道施工



机械施工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cn



局长黄星仁在现场办公



地址：兴皋巷三号

电话：307163

邮码：210008



培训企业人员学习工商法规



工商局检查中队执行任务



南京市税务局鼓楼区分局



局长、党总支书记陈义海在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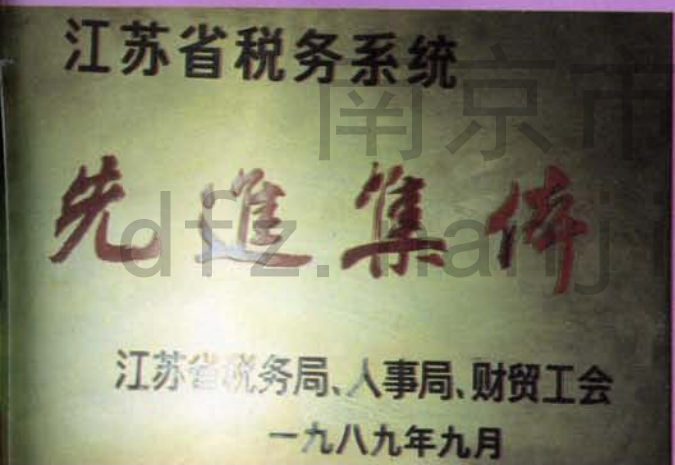


分局专管员深入到所辖企业开展“支、帮、促”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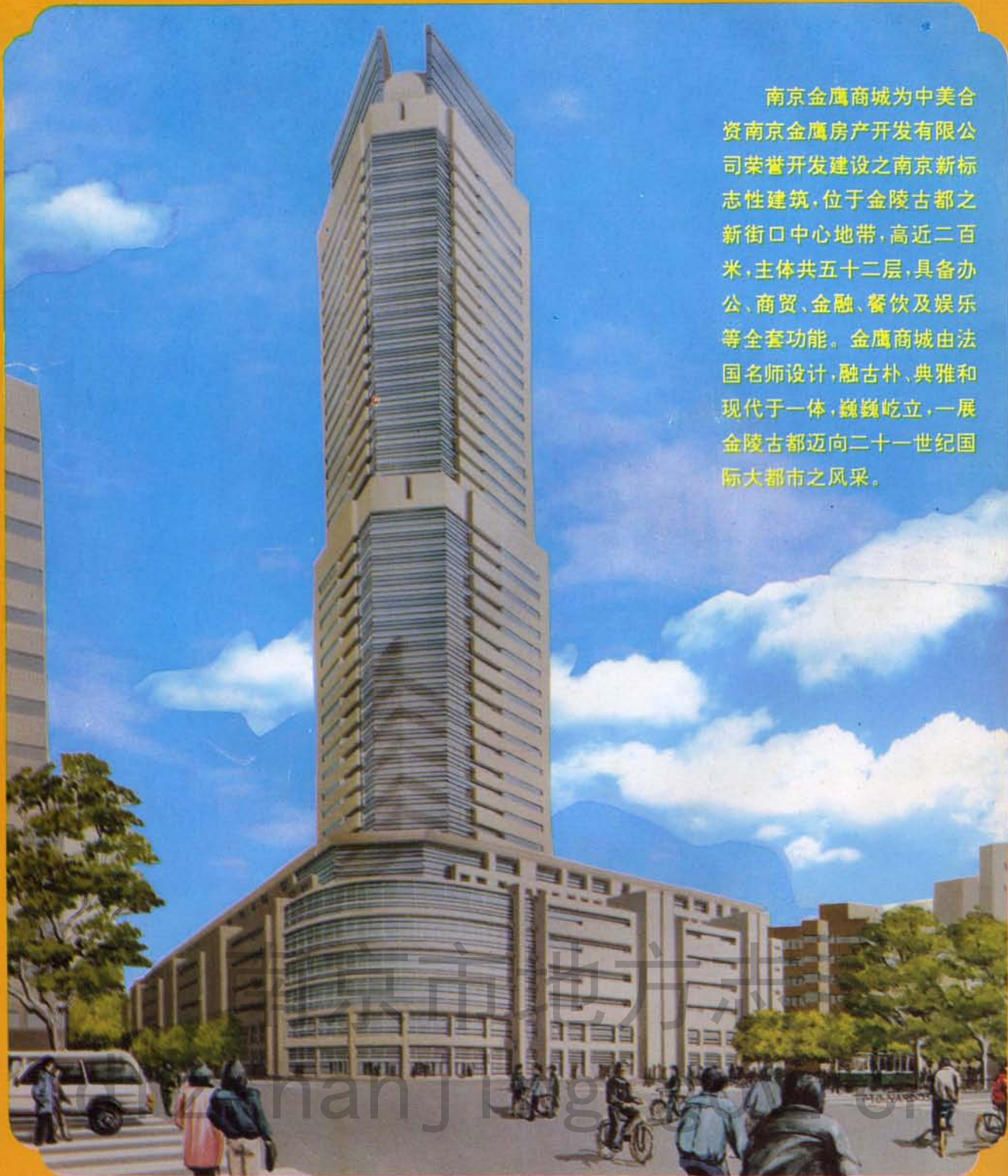


连续三年被市税务局评为“先进集体”

地址：中山北路 107 号 电话：306071；邮码：210009



南京金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金鹰商城为中美合资南京金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荣誉开发建设之南京新标志性建筑,位于金陵古都之新街口中心地带,高近二百米,主体共五十二层,具备办公、商贸、金融、餐饮及娱乐等全套功能。金鹰商城由法国名师设计,融古朴、典雅和现代于一体,巍巍屹立,一展金陵古都迈向二十一世纪国际大都市之风采。